

ANHAI  
GANGSHI  
YANJIU



安海港史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5.75

K295.75

2  
2

# 安海港史研究

《安海港史研究》編輯組

15.11.13

福建教育出版社



**B** 566079

# 安海港史研究

《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惠安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字数：194千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7—5334—0295—2/K·11 定价：2.65元

# 序 言

傅衣凌

由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建省史志协会、晋江地区社科联、晋江县人民政府和安海镇政府五个单位联合主办的“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85年6月11日在晋江县安海镇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省内外的教授、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近百多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57篇。

安海港是一个闽南古港，在福建历史上和今后开放建设中，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历史上的“湾海港”，包括了今天的安海、东石、石井、水头和附近地区。安海镇和东石镇、石井镇、水头镇以及附近地区，互为犄角，形成一个很有特色的地区，它不仅是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港口，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物古迹的文化中心，到今天还保留着很多重要的文物古迹。明代安平商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在国内外经济贸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今日在安海地区还保存了摩尼教草庵、五里桥、龙山寺等著名古迹，对研究古代的商贸、交通、中外关系、闽台关系、华侨史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安海在历史上不仅经济发达，还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区，历代人才辈出，如明代著名文学家王慎中，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因此，安海在我国文化史上也是一个重要地区。不久前，安海整理出版了《安海志》，在我省整理方志工作中，走在了前面。

探讨安海港的历史发展，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现实

意义。当前，国务院已正式宣布闽南的泉州、厦门、漳州三角区为经济开发区，安海是这个三角地带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的五十多篇论文中，除了有关安海港的历史、经济、文化、华侨、中外关系、考古、少数民族的内容外，还有联系当前安海港发展规划和前景的论文，充分体现了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的正确方向。我们应该坚持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今后的史学研究工作中去。

“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委托陈国强、郑梦莹、陈元照同志组成编辑小组，将会议论文选编为本书。本书能够出版，应该感谢五个主办单位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负责同志的大力支持，以及同志们的辛勤努力。相信本书除了反映会议的主要成果外，还会扩大这次会议的影响。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继续召开第二次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并出版第二本论文集，使安海港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至于本书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 目 录

序言	傅衣凌 ( 1 )
关于安海港史研究与海港开发	
——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张 立 ( 1 )
安海港历史发展概述	郑梦星 ( 4 )
安海港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	沈玉水 ( 20 )
从历史上闽海通贸看安海港的重要性	陈元煦 ( 34 )
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韩振华 ( 42 )
安海在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吴 泰 ( 46 )
安海史若干问题小议	陈泗东 ( 59 )
明代的安海港	陈自强 ( 73 )
明代泉州安平商人论略	
——读《景璧集》、《镜山全集》等书后札记	傅衣凌 ( 81 )
明代的安平海商	林仁川 ( 94 )
明代安海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蔡尔鸿 ( 108 )
郑芝龙父子与安海港的盛衰	黄天柱 廖渊泉 ( 119 )
安海港与郑芝龙集团	陈支平 ( 130 )
安海港的兴衰与华侨的关系	林金枝 ( 139 )
安海华侨的特点	李天锡 ( 152 )
从安海港兴盛史展望安海开发前景	陈树田 郑广南 ( 162 )
安海港在闽南金三角中的历史地位	庄为玳 ( 173 )
安海丁姓回族探源	陈国强 ( 182 )

安海港与古陶瓷外销·····	叶文程	( 189 )
安平桥与海外交通的关系·····	李意标 黄国盪	( 200 )
论安海教案·····	徐恭生	( 207 )
辛亥革命在安海·····	张家瑜	( 216 )
安平施钰与《石房樵唱》·····	吴幼雄	( 226 )
光前裕后的安海港·····	许在全	( 236 )
略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庄景辉	( 239 )
编后语·····		( 260 )

# 关于安海港史研究与海港开发

## ——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张 立

福建省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我省史志学界又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它不仅将促进学术界对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把研究的成果，提供给党政有关部门，作为海港开发建设的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

安海港是我省著名的海外交通古港，两宋以来，它就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相当发达的海外贸易港口，明代以还，更是闽南地区“外引内联”的重要基地。近百年来，随着厦门开放城市的发展，安海又成为厦门连结内陆运输的重要中转港口，因而称盛一时。当前，我省是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省分，特别是中央决定以厦门经济特区为中心，增辟闽南三角地区十一个县市，作为经济开放区，把我省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安海地处闽南三角地带的中心，如何使安海这个具有光辉历史的古港，重新焕发青春，使之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这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研究安海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我认为对港史的学术研究，要与当前的海港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循着海港历史发展的轨则，探索它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兴衰变化的基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评估海港开发的作用，为海港的开发建设提供正确的历史论证，使我们的学术研



究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对地方港史的研究，我认为不要只着眼于海港自身的历史发展，更要从横向方面去探索她与其他港口、市镇以及腹地经济区域之间的相互辅成的历史关系。就安海港湾来说，她自身就包括有晋江的安海、东石和南安的水头、石井等四个乡镇。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就不能局限于一个港口、一个市镇，而要把所属的四个乡镇都纳入我们研究的范畴。安海港自古以来是泉州的属港。明代又是漳州月港（海澄）的姐妹港，当时就开辟了一条直航月港的内港渡，每日都有渡船穿梭往来于安海、月港之间；近代的安海港是厦门连结内陆的主要中转港，每日对渡的小轮船络绎不绝。可以说，几百年来的安海港，实际上已经在现在所指的闽南三角地带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研究泉、漳、厦与安海的历史关系，从而正确地评估安海港在这个金三角地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此外，诸如历来港口通航所及的港市区域，内陆延伸所到的经济腹地，以至安平商人足迹遍及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应该纳入我们研究安海港史的内容。因此，我认为研究安海港史限于一地的史志资料是不够的，应与其他有关地区，特别是漳、泉、厦等地方史志结合起来，全面探讨研究，才能得出更为正确的论证。

研究安海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要与我省当前的海港开发建设联系起来。我省有着绵长的海岸线，其中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港湾和港口。这些港口，既有独自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作用，在港口之间又有彼此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关系。在开发建设中，其间就存在一个合理布局的问题。当前，我省就有三个对外开放的大港口，这就是厦门的东渡港、福州的马尾港，以及正在开发中的湄洲湾。这些大港口，担负着直接对外贸易和科技引进的主要任务。然而，大港口的开发，绝不能排除或低估其

他中小型地方港口的作用。以厦门为例，一艘载重五万吨级的外国货轮开进厦门港口停泊，要把五万吨进出口的物资往来疏运，就得动用数万辆的载重汽车或几千节的火车车皮往来运载。而这些庞大的车队出入厦门，都要通过一道狭窄的集美海堤，这种口大喉细的现实情况，必将使往来疏运的大量进出口物资产生梗阻的现象。因此，要解决这个口大喉细的矛盾，就要发挥厦门海上运输的优势，开发厦门附近的卫星港口，采用水陆分理疏运的办法，藉以减轻陆上运输的压力。安海港近百年来一直是厦门连结内陆的重要卫星港口，恢复与发展安海港历史上作为厦门卫星港的重大作用，将是厦门口岸发展对外航运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措施，也将是开发建设闽南三角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兴革，自然条件的变迁，当前的安海港，除了作为厦门卫星港的作用之外，能不能恢复她在历史上直接通航海外的盛景呢？从历史看现在，她的开发前景又是如何呢？所有这些问题，希望我们在研究安海港史的同时，运用正确的历史观点，联系当前的实际，提出各自不同看法，通过研究、探索以至争论，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来。

安海除了港口自身的历史优势之外，还有许多优越的条件，如：安海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古镇，历来文教昌明，人才辈出；安平商人，能贸善贾，积累了许多外引内联的丰富经验；安海华侨，足迹遍及南洋群岛以至欧美各地，他们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历来对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都有重大的贡献。所有这些都与安海港的发展史，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也是我们研究安海港史不可偏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将更有利于发扬安海各个方面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开发建设新的安海港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安海港史的研究，这次的学术讨论会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今后还要继续深入下去。愿与会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珍惜这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深入全面地研究安海港史，打下良好的基础。

## 安海港历史发展概述

郑 梦 星

安海港是闽南海外交通的古港，历来隶属于泉州港，是泉州诸港中开发最早，持盛最久的重要港口。晋唐初兴，曾一度是泉州港中的主港。宋元时代，泉州刺桐（后渚）港上升为“梯航万国”的“世界第一大商港”，安海港也相因见盛于一时。明代“禁海”，泉州港由此衰頹不振，而安海港却因转为民间自由贸易港而著称。清代厦门开埠后，安海港降为厦门联结内陆的中转港口，从而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

### 一 晋唐时期海港的形成与发展

安海港的始兴年代，史籍文献没有确切的记载。厦门大学庄为玠教授在《略论安海港史的兴衰问题》<sup>①</sup>文中指出：“安海港是泉州最古的港口”，“南港（安海港）的开发远远早于北港（后渚港）”。此外，他还认为南梁时代的“梁安港指的是今泉州的安海港”，并指出当时在南安丰州延福寺译经的印度僧人拘那罗

①1983年福建史学会厦门分会讨论会论文（油印本）。

陀，就是从梁安（安海）港坐大船回国的。他认定“在唐开元六年建城迁治以前，所谓泉州港，实际上是围头湾内的安海港”。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海港自身的特点和地方有关史料中找到一些有力的佐证。

首先，海港对外交通的开发，是与海港自身的优越条件分不开的。安海港是紧靠外海的内港，一出海门，就是我国古代通往东南亚以至印度洋各国的主航道，不仅出海航程近，而且港内江海流平，湾深港阔，是闽南沿海一个近海的天然避风良港。此外，与泉州湾内诸港相比，安海港还有另一优势。原来，南来海船进入泉州湾过围头沃以东就进入横风逆流的险段，在这里，波涛汹涌，暗礁参差，时有触礁翻船的危险。据说这就是围头本称“危头”的来源。倘若南来的海船不入泉州湾而走安海，只要从围头转帆向西北，即可抵达安海港，既安全又方便。于是，安海港也就成为船家乐于“避危就安”的去处。

安海虽缺乏内河航运，但却有四通八达的坦荡大道，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泉州迁治以前的晋唐年代，这里有直达古郡丰州的大道，全程六十余华里，车马一天可以往返。迁治后，又有直通泉州郡城的车马大路，相距五十余里，往来也很方便。

据史籍记载，我国于东汉时就与南海诸国以至印度以西的罗马帝国有海上往来的关系。①三国孙吴就曾派人航海到南海的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中部）等地。②这些往来南海的船只偶

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

②《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吴国黄龙年间（229~231年），孙权曾派朱应与康泰航海至林邑、扶南等地。

而从围头就近趋入安海港避风停泊，自是意中事。《西山杂志》<sup>①</sup>曾谓：东汉时，吴国孙权派陈时往交州，“时遇台风，避泊龙江<sup>②</sup>海滩”。

唐代，泉州已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中外商人云集为市，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安海地方的海商、船主也势必要因之而起，参与航海贸易的活动。《西山杂志》对此曾有许多记载，如“唐开元八年（720年），林銮舟至渤泥、台湾，引入蛮舟，恐被礁石，故造七星塔”，<sup>③</sup>“唐乾元间（758~759年），参军署在安海榷税”。此外，还有唐天宝间王尧从渤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船；唐乾符间，林灵造海船百艘，航海经商而致富百万等记述。这些记述，表明了唐代安海港口船舶往来频繁，安海港内必将受其影响，并因而出现从事外贸活动的海商与船主的必然性，故此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 二 宋元全兴时期的安海港

宋元是泉州（刺桐）港海外交通发展的极盛时代，以至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商港”。<sup>④</sup>此时的安海港也相因见盛，跨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 （一）港口市镇的发展与繁荣

宋初，安海已形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港口市镇，称为安海市，并有东、西新旧两个集市的并存。<sup>⑤</sup>东、西两市的产生，有

①《西山杂志》作者为清代东石人蔡永兼。

②龙江为安海港内东石海面的别称。

③从围头至安海的七座航标塔，还有遗迹可寻。

④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

⑤《读史方輿纪要》第二册。

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以前的古代安海，“东西无埭，海水东入内市，……直至甘棠桥。西入于西安、曾埭而及大盈桥。商舡亦至是乡，与居民互市，其屋宇鳞鳞相次，北接曹店，南接内市，故二乡有店、市之名”。〔这里所说的曹店、内市都在东港，内市在港的东岸，宋初安连济初徙安海时，即在此建置府第。北宋吕惠卿曾在此建一座一里多长的跨海石桥，称为内市桥，与当时的安海西市通连起来。内市是当时海船进港集泊的地方，后人曾在此发现古码头及妈祖宫等遗址。与内市对称的还有外市，沿内市向海入港处，有一古代避风的湾沃，称为后埭沃，后人在这里平整土地，曾发现有一条东西向的一里多长的古街遗址，这就是古时的东外市，在这一带挖地，也常发现有自外地运来的压船青石块、船缆、船篷等遗物。东港西岸的曹店，是宋代安海西新市的起点，位于现在安海龙山寺后东北几百米处。这里附近有一古地名称为“打（读pà）篷埔”，地下亦经常发现有船篷、船缆、船桅残段等遗物。曹店的“曹”与“造”或“艘”同音，很可能为古时造船的遗址。后来，东旧市由于南宋在东港口建造东洋桥以及后来的建埭，就日渐衰颓以至废灭了。而西新市也日渐向南近海发展，成为一大港口市镇。镇“于宋全盛时，直街曲巷，无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②上述古代安海镇市从内向外的展，正是循着港口自内向外发展规律的自然趋向。

## （二）遣吏榷税立津卡

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后，州官随即遣榷

①《安海志》卷二《山川》。

②《安海志》卷三《封域·镇市》。

税吏到安海建津榷税，号曰“石井津”。<sup>①</sup>建炎四年（1130年），州官又请旨在安海建镇，称为“石井镇”，并委官监镇，派朱熹的父亲朱松为首任的监镇官。<sup>②</sup>综观有宋一代，泉州所属的三湾十一港中（包括后渚港），遣吏榷税以至建镇委官的，唯独只有安海。

### （三）民间海商的活跃

随着海外交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时泉州一带开始出现了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海商，如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夷坚志》（丁本）中记载：“泉州杨客，为海贾十年，致赀二万万。”此时在安海也有不少从事外贸活动而发家的大海商，如东石的陈日照字景初，宋时“航海贩茶至安南，在安南颇有权势”；又“南宋邱发跟从林氏航海起家，祖孙三代均称百万”；宋绍兴间“许纯轩、许汉青都是航海起家，赀百万”。<sup>③</sup>此外，更有不少“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sup>④</sup>的贩海商人，足迹遍及南海诸国。

### （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工程浩大的公共建筑

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由于社会财源富足，就在地方上兴建不少工程浩大的公共建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五里的安平桥和三里的东洋桥以及石井书院。

安平桥建成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全长八百一十丈，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称，桥全部为花岗岩条石叠架而成，两侧有石栏杆，上有桥亭五座，非常壮观。桥建成后又以桥为中心，建造了瑞光塔（白塔）、白塔寺、妈祖宫、水心亭、超然亭

①②《安海志》卷一《沿革》。

③④蔡春草等编：《东石乡上史料选辑》油印本。

等一系列建筑群，糜费两万余缗，大都为商民捐资共建。<sup>①</sup>

安平桥建成后第二年，又在东港建一座东洋桥，全长六百六十丈，同样是条石梁架结构。建成后又于桥头建龙兴塔（东塔）、东塔寺，并迁建昭惠庙、慈济宫于桥侧。<sup>②</sup>两桥之建，使安海有“双桥跨海，两塔凌霄”的胜景奇观。

嘉定四年（1211年），又在安海建了一座规模相当于府县学的石井书院。据宋留元刚《石井书院记》碑文中所载，建院的“公私经费，合四百万”，其中“太守邵武邹公应龙……捐公帑四十万以倡。漕泊二使者，郡之二车，乡之秀民，咸以资助”。<sup>③</sup>文中所谓乡之秀民的资助，大多数应是从事外贸活动的殷实商户。

元代是泉州港海外交通臻于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元初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来华贸易的优惠条件，又颁布了一整套有利于民间商人自由经营的外贸政策，因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然而，到了元末，由于泉州的战乱，使外商相率回国，海舶断绝往来，对外贸易和海外交通，也就迅速衰落下来。

据《安海志·大事记》载称：“元至正十一年（应是二十一年），……时泉州为回回那兀纳所据。但出城南至海滨一带，又皆三峰陈酋所有”。可见泉州的叛乱，只限于泉州郡城及其以北至省城一带，出城南至安海一带，却成为地方武装所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坐镇安海的地方官监镇，也因之废置。然而，因战乱不入泉州的海舶，却有一些转口于战乱不及的安海港。而素以贸海为生的安海商人，利用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摆脱官管的桎梏，进行自由贸易活动，从而为明代禁海中的安平商人，开创贩海贸私的经验。

①②《安海志》卷十四《桥渡》。

③《安海志》卷六《学校》。



### 三 明代禁海中的自由贸易港

明初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明代中叶，厉行“禁海”政策，严格控制私商的对外贸易活动，以至规定寸板不准下海。然而，“禁之愈严，滋之益甚”，“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又有犯者”。<sup>①</sup>似此不仅禁之不绝，反而激起沿海私商和豪强势族更加强烈的反抗，而使这场反海禁的斗争持续了达二百余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安海港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发展成为闽南民间私贸活动的重要基地。主要因素，有下面的几个方面：

（一）得之“地利”。首先是：安海离郡治偏远，官制有所不及。正如黄堪《海患呈》中所谓“况县治去远，刁豪便于为奸。政教末流，愚民易于梗化”。<sup>②</sup>

其次是海港内外多深湾僻沃，利于贸私海舶的荫蔽活动，而且紧靠外海，便于出海贩洋。胡宗宪在《筹海图篇》中指出：“泉州安海，向虽通蕃，犹有避忌。迩来番舶联翩而至，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倚”。黄堪《海患呈》中记载：这一年（壬子）的三月，有日本夷船数十艘，由漳州人引水，径来安海港口的白沙沃停泊，于是“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互）市。本处（安海）无知小民，亦乘风窃出酒肉柴米（以应），络绎海门，遂成市

①邱浚：《大学衍文补》。

②《安海志》卷十二《海港》附文。

肆”。<sup>①</sup>这就是使安海港得以“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倚”的有利条件。

(二)安海有许多好贸善贾的安平商人，他们都具有贩海贸洋的丰富经验。

明代的安平商人，不仅要“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域之墟”，<sup>②</sup>又要“贾行遍郡国”，长途贩运于大江南北之间。他们在国内的贸易活动为“富者挟财本，置绵葛（地产）、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蓄货）等物，以往两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地变卖，仍置其地所出之丝绵、锦绮、毡布、靴袜等物（出口商品）以归”。<sup>③</sup>他们就是这样把开展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紧密联系起来。

明代安平商人的“贩海通蕃”活动，一种是奔逐于夷船经常集泊的沿海各地，就地贩运，近之如安海港外的白沙、围头、浯屿，远之如广东的南沃、汕头以至香山沃（沃门），这些远贸省外的商人，大多常住下来，长期与外商交往。如李寓西“已徙南沃与夷人市，能夷言”。<sup>④</sup>又如郑芝龙的母舅黄程的“行贾香山沃”。

贩海的另一种形式是远涉重洋，直接出国经商，并因长住而成为早期的华侨。如安海有关族谱记载：“颜嗣祥，字子瑞，生成化丁亥年（1467年）……。正德辛巳年（1521年）七月廿六日卒于暹罗”。又“陈朝汉，名荣祖，……生成化庚寅（1470年）……。卒嘉靖庚子年（1540年）二月廿七日，歿真腊（今柬埔寨）”。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附文。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③《安海志》卷十一《物类》。

④李光缙：《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

国”。<sup>①</sup>于此可见，早在15世纪中叶，安海即有人到南洋等地经商，而其中最多的还是去吕宋，“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路通，浮大海争利，十家而九”。<sup>②</sup>

在明代安平商人中，有如郑芝龙拥有庞大武装船队的大海商，但就安海本镇来说，却大都是独力经营的“散商”。他们的贩海贸私，在官禁中是违法的活动，但在商业竞争场中，却大都是持重守信的正当商人。如颜守吾，“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遇为明达，常舍竟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sup>③</sup>又如曾友泉，“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资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sup>④</sup>虽然，他们之间不乏富商巨贾，但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能贸善贾而取得的。执义、取仁、崇信的优良商业作风和识时、明智、任勇的自我奋斗精神，是明代安平商人性格的另一特点。

明代，闽南有两个主要的民间自由贸易港口，即泉州的安海港与漳州的月港。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采纳金都御史涂泽民“开洋”的建议，取消“海禁”，“准贩东洋”，并在月港设立“洋市”，使月港成为法定的对外贸易的开放港口。安海与月港之间，历来贸易往来十分密切，月港“开洋”后，两港商贾交往更加频繁。万历间，“漳邑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sup>⑤</sup>安平月港之间，相去六十多海浬，往

①洪少禄：《从族谱中获得安海居民侨外史料之探讨》。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二烈传》。

③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七十《支里君墓志铭》。

④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八《祭曾友泉文》。

⑤《安海志》卷十四《桥渡》。

来渡船，要经过同安刘瓦店，绕过集美海峡，从厦门嵩屿进入九龙江口以达月港。这是安平商人适时而趋，利用月港“开洋”的合法地位，作为他们发展国内外贸易的转输港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于安海“承平久而生聚繁”，因而公议“安海置邑如海澄诚便”。<sup>①</sup>后来因议割晋、南、同三邑地“建安平县不果，乃移泉州府通判驻镇焉”，<sup>②</sup>并请旨发给“驻镇安海”的官印，以示专守。

天启、崇祯年间，正当月港因荷兰人的侵扰，以及明朝的再度禁海而迅速衰落下来的时候，安海港却在郑芝龙的经营下，出现了空前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受招抚后，就在安平镇的桥西铺营建一座极尽豪华的府第，使府与城连成一体，并开挖西河沟，可通小船，直入城中，与其卧室相连。故有“龙筑城，开府其间（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sup>③</sup>之说。安海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对外贸易的海上基地。

当时，郑芝龙在海上拥有船舰千余艘的武装船队，在陆上，他又“增置庄仓五百余所”，有田园数万顷，遍及闽粤两省。<sup>④</sup>

郑芝龙以安海港为基地，极力发展海上贸易。从1641年到1646年的几年间，由安海航向国内沿海各港口以至台湾、澳门和日本、吕宋等东南亚各地的郑氏商船，穿梭往来，络绎不绝。此外，有些安平商人也借仗郑氏的令旗，积极参与贩海贸洋活动，使安海港的海上外贸活动，臻于空前极盛的时期。安平镇也因之

①《泉州府志》卷十二《安海建署记》。

②《安海志》卷一《沿革》。

③林时对，《荷瓶丛谈》下册卷四。

④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中。

“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sup>①</sup>

后来，郑成功起义抗清。此后10年间，安海一直是郑成功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对外贸易基地。据有关外文资料记载，从1654年11月至1655年9月，就有41艘属于国姓爷的商船，从安海开至日本的长崎。还有1655年3月，从安海开往台湾、巴达维亚、东京、暹罗、广南、马尼拉等地商船二十多艘。<sup>②</sup>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清的最后一次和议谈判在安海报恩寺举行。谈判破裂后，郑氏“遂飞檄与兄（郑）泰，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堕其城镇”。<sup>③</sup>此后，即全师撤守金、厦。第二年（1656年）4月，清兵突进安平，进行惨酷的“毁镇”，把安海镇市及其附廓村舍烧为灰烬，夷为废墟，安海港由是废弃闭绝将近三十年。

#### 四 清代以来海港的兴衰变化

安海港从1656年的“废镇”和1661年的“迁界”后，长期的废弃，以致航道淤塞，港埭溃决，泊岸塌陷，码头圯废。直到1684年“甲子复界”后，经过一番疏浚整治，才逐渐恢复过来。

“复界”后，驻军都督施秉按明代旧街格局，草建简易民房数百间，“以赁民居，收四季税”。<sup>④</sup>后来由民赎回，重新改

①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②岩生成一：关于《近世日支贸易额的考察》，《史学杂志》第六十二篇第十一号。

③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八。

④《安海志》卷一《源流考》。

清朝于沿海“复界”后，又宣布开放“海禁”，安海港也随之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据《晋江县志》记载：“康熙年间，外洋大船时泊于此（安海），靖海侯施琅……奏设户部税馆在安海榷税”。<sup>①</sup>当时户部税馆设在泉州，由巡抚指派道员专管海关税务。泉州税馆在闽南沿海共辖十个税口馆，安海港则设立安海、东石两个口馆。<sup>②</sup>

清初设立海关榷税，规定“凡商船越省贸易及贩运外洋者，出入官司征税”，<sup>③</sup>清初虽名曰开放海禁，却是开而不放。对出海船舶，仍有许多严格的禁限，如《大清律例》第二二五章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这一禁律，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才正式废止。<sup>④</sup>至于东渡台湾，更是多次严申禁令，不许沿海居民越海私渡。然而，富有贩海贸私经验的安平商人仍有许多人犯禁私渡南洋和台湾等地。据安海一些族谱资料统计，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就有颜、陈、柯、曾、黄等族姓出洋谋生，总人数达81人，其中颜姓最多占34人。出国去处以印尼为主，其间也有去暹罗、吕宋以及东渡日本的。<sup>⑤</sup>至于私渡去台湾的人数就更多了。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以后，去台之风更盛，出现了竞渡台湾的高潮。从安海、东石、灵水一带颜、黄、蔡、吴诸家族谱发现，其间有许多父子兄弟相从，或至举族亲邻相率成批去台的记载。与此同

①乾隆《晋江县志》卷十。

②③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二，《榷税》。

④朱维干：《福建史稿》第二十八章第一节《清初海禁》。

⑤据洪少禄《从安平诸氏族谱看明清侨外情况》一文中汇计。

时，经蚶江转口往来于台湾与安海之间的商船，更是络绎不绝，每日进港的台船，都在一、二十艘之间，停泊于水心亭和五港码头一带。

乾嘉年间，安海港的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开始走上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当时，往来安海之间的商船，有北上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等地的北舫；有南下漳州、南沃以至广州等地的“广扒”；还有东渡台湾的横洋船，此外也有直接开往南洋群岛的贩洋船。这些来自国内外的船舶，每天进港的少则二、三十艘，多到五、六十艘。

随着安海港航运事业的发展，安海港内的东石镇，出现了许多船行和大船主。如嘉庆间的大船主周仰，即拥有大船百余艘，家资号称百万。又如东石《逊祥周府君墓志铭》记载：“（逊祥）君诞生时，家道日隆，及长，佐诸兄理家政，置商船百余艘。道光初，省会大饥，君闻，遣数船入运台（湾）米至省，……省赖以安”。周氏还在东石建有造船厂，船厂遗址至今还在。还有东石玉井蔡章凉的源利船行，也拥有商船百余艘。此外还有中小船行十余家。①安海有句俗谚称“安海好商行，东石好船行”，正是在“好商行”和“好船行”的紧密配合下，促进了清代中叶安海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由此可见，安海港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清初即已迅速恢复和发展，及至清代中叶，已进至盛极时期。其盛况不仅不亚于前代，甚至有超越前代的趋势。

清代安海港从海外交通大港，降为地方性港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战后，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自由港口，殖民主义者把厦

①有关东石船行资料，均参照《东石地方史料选辑》油印本。

门作为他们倾销剩余产品和掠夺地方资源的侵略基地，安海距厦门37海里，水陆交通十分方便，于是就成为殖民者伸向内陆倾销、掠夺的跳板，安海港也就降为厦门联结内陆的附属港口。当时，安厦之间船舶穿梭往来不绝，大批舶来品源源涌进安海市场，镇市上出现了各类洋货充斥，买办商行竞立，四处舟车辐辏，五路商贾云集的畸形的繁华景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安、厦之间开始航行小轮船，每日有四艘对开往来。从厦门转口的出入国华侨，也以安海为中转站，往来商旅，日均五百人以上，安海码头更是风樯林立，商货山积，单是温州流寓安海码头搬运脚夫，就将近一千人，码头附近的旅店栈间就有三十余家。为适应海上交通日益发展的需要，1915年，由爱国华侨陈清机倡办的福建第一条侨办的汽车公路——泉安汽车公路通车了。以后几年间，又开辟了以安海为中心的八条公路线，从安海伸向四面八方，将安海港与其经济腹地更加紧密联系起来。

安海在作为厦门中转港口的同时，对国内外其他港口的通航交往，仍然没有中断过。国内航运，以贩运糖、茶、桂圆等货，北上温州、宁波、天津等地，换载棉花、大豆归。国外航运，仍以远航南洋群岛为主。如东石玉记船行，曾于1893年到1918年间，多次组织船队远航南洋实叻等地经商，安海土特产“灵水菜脯”（萝卜干）就是玉记行于1893年运往实叻发售，而后闻名南洋各地，成为安海传统出口的土特产品的。<sup>①</sup>

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与海外华侨往来的频繁，安海成为传播现代文明和引进国外科技文化的窗口。如1915年创办汽车公司；1918年办电灯公司；1919年整治旧街建新街；1929年建安海桥西

①《东石乡土史料选辑》油印本。



垦植公司，引进日本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良种树苗、鸡、兔等。<sup>①</sup>特别是纺织工业，更有较大的发展。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安海东石就先后办起四家纺织厂，其中有与福州陈为宜合办的，引进上海提花织布新技术的民星电机织布厂；安海华侨颜奎与永春华侨张孙琛合资创办的利群电机织布厂等。据说，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四家电机织布厂，安海东石就占了三家。<sup>②</sup>

此一时期，安海的兴办新学，创建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也跟着蓬勃发展起来。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海普宿倪人俊就在安海创办育婴院。<sup>③</sup>安海的兴办新学，始于光绪五年（1878年）创办的铸英小学，接着又于1907年创办养正小学，从此后到1932年，安海镇内先后共创办了十一所小学、三所女学，一所中学和一所女子中学。此外还有三十年代初创办的民众医院和新式戏院等等。清末民初，安海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既是安海港海上交通发达与社会经济繁荣的反映；也是爱国华侨热爱家乡，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的成果。

抗日战争中，安海港再度陷入瘫痪状态。但是，抗战一胜利，就又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抗战中福建沿海公路受到严重的破坏，胜利后一时难以恢复，陆路交通梗阻，因而使安海港成为厦门光复后通向内陆的主要港口。据当地老人忆述，抗战胜利后的安海码头，每天往来客商的流量，都在七百人次以上，有时多达一千多人。走安厦之间的客货小轮船就有中兴、凯旋、飞龙、飞凤等十三、四艘。此外还有来自漳州、福州、温州、宁波、上海以至台湾的商船，每日集泊安海诸码头的各地船只不下

①陈德贤，《爱国华侨陈清机事略》，晋江地区《华侨史》第三辑。

②《东石乡土史料选辑》油印本。

③《安海志》卷七《广益》。

四、五十艘，有时多达六、七十艘。海上运输的膨胀，迫切要求汽车公路的恢复，于是闽南旅居南洋各地的侨团，纷纷来电要求当局尽快设法恢复公路交通，因而使安海至泉州的公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恢复通车。泉安汽车公司刚复办时，负债累累，开办一年后，不仅还清债务，年终分红，其中一位副董事长就分到一万多元的美金。<sup>①</sup>可见，战后安海水陆交通运输恢复和发展的高速成效。

史学界有些同志认为：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安海港，进入清代以后，即已衰蹶不振。这一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如上所述，清代以来，安海港虽遭受到清初“毁镇、迁界”的废弃，又经历了八年抗战的闭绝，但一当时局好转，就又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鸦片战争前的“乾嘉盛世”，安海港的对外交通贸易实际上已恢复到前代历史的盛貌。虽然当时厦门已逐渐发展成为对外交通贸易的大港，但正如宋元时代与泉州大港的同盛并存一样，安海港仍不失为海外交通的要港。鸦片战争后，安海港逐渐降为地方性的港口，但不论是作为厦门大港的中转港口，或是自我开展中短程的国内航运，都能发挥其重要作用，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

<sup>①</sup>林华居等，《安海乡土史话》油印本。

# 安海港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

沈 玉 水

安海港是古泉州港的重要支港。在历史上，安海港善于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多次衰而复振，而以明代为全盛时期。本文试就管见所及，对安海港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作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 一 安海港的历史特点

安海港地处围头湾内，港口有白沙、石井二澳夹峙成海门，入海门则面阔水深，岸弯流平，无风涛之险，有避风之坞，向来为航海者所乐趋。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安海港兴起的自然条件。安海港史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下面分三个历史阶段加以说明：

### （一）安海港是古泉州港的重要支港

对于安海港兴起于何时，学术界说法不一。我认为，安海港的兴起时期，可以上推至唐代。在唐开元六年（718年）泉州迁治之前，安海比后渚离州治（指丰州）虽较远；但安海至丰州这条古驿道基本上还是平坦的。当时外国海商来华是先经占城至广州，然后沿海岸线北上至泉州、扬州的。<sup>①</sup>海舶从广州至泉

<sup>①</sup>伊本·考尔大贝：《道程及郡国志》载：“中国贸易港自南向北，顺序记之：曰交州，曰广州，曰泉州，曰扬州”。

州，应是先至南面的安海港而后至北而的后渚港的。特别是围头地势突出在航道上，围头湾内更是风浪平静；而围头到后渚这段海面，则常有横风、逆流，这种自然条件，有助于引导海舶先入安海港。可以认为，在泉州迁治之前，安海比后渚更有可能先成为古泉州港的重要港口。庄为玘教授根据泉州地区印度教遗迹的分布情况，指出印度教是由南港传入泉州的。他认为开元迁治之前的泉州港，应是指围头湾内的安海港。<sup>①</sup>

诚然，在泉州迁治之后，后渚港紧邻州城，于是泉州港的贸易活动中心便逐渐转移到北港来；但这只能说是重心的转移，而不是安海港的衰落，实际上唐宋时期的安海港，一直是泉州通贸海外的重要港口。

宋代的安海港较之唐代又有发展。宋朝特在安海设石井津以榷税，可见客舟至安海互市的为数甚多。到了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安海因东、西两市竞利相戕，榷税吏无力制止，州官乃请准设石井镇，以掌火禁兼酒税之类，这是安海建制之始。方玺任安海镇官时，曾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倡筑安海土城，是为安海建城之始。又宋代安海已设巡检司，以掌巡逻汛察之事，惟员数无考。<sup>②</sup>另据《安平志》记述宋时安海盛况称：东西二市有“店肆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最能说明宋代安海港繁荣的史实是，安海的“双桥跨海”、“双塔凌霄”等古建筑。安海的双桥、双塔都建于绍兴年间，其中安平桥（即西桥）扼泉、漳、南、同交通之要冲，南北官道所从出，方便了商旅货运，更促进了安海港的繁荣。双

①庄为玘：《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②《安海志》卷一《沿革》；卷二十二《职官》。

桥、双塔的建成，是南宋安海文明昌盛的标志。此外，宋代安海还建有昭惠庙和天妃庙，前者建于政和四年（1114年），祀航海之神崇应善利广福显济真君；后者建于绍兴年间，祀航海女神天妃。①安海以一个镇，建有两座祀奉海神的庙宇，这在其他地方是极少见的，它充分表明宋代安海港的繁荣。

唐宋时期的安海港，是随着泉州古港的日益繁荣而兴起和发展的。到了元代，由于元王朝大力经营后渚港，而素主市舶的蒲寿庚又是以后渚港为外贸大本营的，中外海舶多聚于泉州湾内，于是元代的后渚港空前繁盛，而安海港则一度呈中衰现象。

元代安海港的中衰有以下三个事实：（一）东、西两埭的围垦影响了海舶的内航与停泊。安海东、西埭的修筑，虽可以“增加农产，以阜物用”；但对海运事业却起了阻塞作用。所以《安海志·封域》有“东西两海湾筑为埭田，客舟不通，镇监遂废”的记述；（二）石井镇廨的罢废。宋代在安海设石井镇以监东、西二市，而元至正间，由于“客舟不通，税无从出，镇监遂废”。②这“税无从出”，表明了元代安海商业出现了萧条局面；（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马可·波罗奉令伴送阔阔真公主往嫁波斯时，庞大的船队（有十四艘船和六百人）是从后渚港放洋的。这件事反映了元代后渚港的地位，远比安海港为重要。

应该指出，元代安海港虽然出现中衰现象；但很快又复苏了。进入明代更向繁盛阶段发展，曾一度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

---

①《安海志》卷十四《桥渡》，卷十五《塔坊》，卷二十《庙堂》。

②《安海志》卷五《公署》，卷二十二《职官》。

## （二）明代安海港的全盛

泉州港从唐代起一直是官商贸易为主的港口。在此期间民间商人的海外贸易也有所发展，并出现一些有影响的海商。进入元代，元王朝又实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sup>①</sup>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泉州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就更多了，甚至有泉州商人奉使火鲁没思（波斯）<sup>②</sup>的史实。到了元末，泉州发生连年战乱，后渚港的海外贸易大受影响。这时的安海港则少受战乱的波及，而民间商人海外贸易却越来越多，于是，明代的安海港便向全盛阶段发展了。

明初，由于明王朝一再实行“禁海”，官商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明初虽在泉州设来远驿，却被限定为仅“通琉球”。<sup>③</sup>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sup>④</sup>以海为生的福建沿海商民，在我国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和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明代，势必要冲破“禁海”的束缚而贩海贸外，于是民间商人的“走私”贸易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势下，原先由官商控制的、高度集中管理的后渚港，不宜于“走私”贸易，于是民间商人便转移到官方势力薄弱或达不到的地方去活动。这样一来，后渚港以外的其他大小港口，都成为民间商人走私活动的地方，而以安海港为最活跃。当时漳泉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安海商人也

①《元史·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实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的政策。

②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60页。

③《明史·食货志·市舶》中载永乐三年（1405年）诏设三驿馆：“福建之泉州曰来远，通琉球；浙江之宁波曰安远，通日本；广东之广州曰怀远，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

常常利用往高州、福州及苏、杭等买卖的文引，将货物运往交趾、日本、吕宋等地去贩卖。<sup>①</sup>明人李光缙在《景璧集》中多处提到安平商人的泛海贸外，如“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域之墟”，正是由于安平商人善于行贾，加以“安海距郡之统制偏远，扬帆一出海门，便为外海，最利于海上贸私。能贸善贾之安平商人，每奔逐于贸私蕃船窃踞之岛澳，以获暴利”。<sup>②</sup>因此当后渚港由盛转衰之际，安海港却从元代的一度中衰而迅速转入全盛的阶段。

明代安海港的全盛，还与当时国际间海上通商形势的变化有关。宋元时期来华贸易的外商以阿拉伯人为主，他们以三佛齐为中转站，控制东西方海上贸易达八百年之久。15世纪，欧洲开始出现殖民主义国家，它们冲破阿拉伯人的控制，相继向东方扩张。与此同时，日本的走私商人也竞相到我国沿海买卖。这些贸易走私的东西方海商，为避官府的禁制，常在沿海港澳进行强贸以至掠夺，安海附近的围头、石井、白沙等澳，都曾为夷人的船队所窃踞。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间，有日本船十数只在围头、白沙等澳湾停泊贩卖，竟使沙滩变成市肆。<sup>③</sup>其走私贸易之盛，可以想见。

明代中后期泉州民间商人最著名的有李旦、黄程、郑芝龙、李寓西等人，其中后三者都是安海人。黄程是郑芝龙的舅父，在广东香山澳为海商，也经营对日贸易，郑芝龙就是为黄程贩货而到

---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沈秩：《上南抚台暨巡海公祖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

②《安海志》卷十二《海港·港交》。

③《安海志》卷十二；黄堪：《海患呈》。

日本的。郑芝龙是操纵泉州“走私”贸易的大海商，曾拥有近千艘海船，称霸海上，“独有南洋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sup>①</sup>李寓西“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致饶，为中贾。吕宋澳开，……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人效之，为上贾”。<sup>②</sup>此外，还有陈斗岩、曾友泉等人，也是著名的安平商人。关于安平商人的能贸善贾，明人何乔远有很中肯的评价，他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贾夷，差强资用”；“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第徽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sup>③</sup>对此，《安海志·商贾》还指出，“然徽州人之贾，仅历江湖以遍全国；而安平人之贾，却浮沧海远及诸夷，此又为徽州人所不能比拟者”。正是由于安平人善于行贾贸外，所以安海港和浙江的双屿港及漳州的月港，发展成为明代我国东南沿海的三大外贸港。当郑芝龙受抚之后，建第于安平，亭榭楼台，甲于泉郡；市镇繁华，商贾丛集，不亚于省城，更是盛极一时！

明代安海港的全盛，还表现在天顺、成化、万历年间三次重修安平桥之举，使“桥亭次第一新”；“屹中流而竖柱，……履平地以济川”，方便了商旅。正是由于安海港的全盛，所以在万历年间，曾有析晋、南、同三邑地以置安平县之请，此事虽未获批准，但明王朝特在安平镇设分府，建驻镇馆和积谷馆等，可见当时安海港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指出，在明中叶以后，由于漳州的月港地处一隅，官方

---

①邵廷采：《东南纪事》卷十一。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

③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五《风俗》；《镜山全集》卷四十八，《寿颜母序》。



势力难以控制；而且一出海门便为外海，更利于民间商人的“走私”活动。漳泉二郡的私商，转赴月港交易的甚多。但是，安平商人则始终以安海港为主要集散转运的港口。终明之世，安海港一直是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大港之一。

### （三）清代以后安海港的新变化

明末清初，控制闽南地区——特别是泉州的海外贸易大权者，主要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郑芝龙独霸南洋之利，前文已有提及，下面着重讲讲郑成功在外贸方面的主要活动。郑成功继承其父当年贸外旧规，编组东西洋船队，与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都有商务往来。郑成功设有“五常商行”于厦门及附近诸港澳以贸外；为了采集各地外销商品，又设“五行商行”于京都、苏、杭、津、鲁等地。“五商十行”的经营为郑氏的抗清运动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的安海港是郑成功贸易活动的主要港口。后来由于战乱，特别是清王朝实行“迁界”时，安海地区被夷为平地，安海港因而一度闭绝达二十多年之久。<sup>①</sup>

清王朝平台之后，左都督施秉按明代旧规重整安海街市，经过镇民的多年努力，市镇渐复旧观，安海港又蹶而复振了。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因外洋大船时泊安海港，清王朝又在安海设户部税馆（在朝天宫东）以榷税，名曰鸿江澳。足见安海港又转向繁荣了。清代以后，安海港一再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安海市场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安海港在开洋之后又渐趋繁盛，尤其在厦门被迫辟为商埠之后，由于安海距厦门航程近，航道安全，内地水陆联运方便，安海成为厦门的重要转口

---

<sup>①</sup>《安海志》卷十二《海港·港交》。

港，出现了洋货充斥市场的畸形繁荣。当时的洋货除乾味、食品、大米、布匹外，还有各种日用品（如火柴、煤油、腊烛、肥皂等），“米店里出现了暹罗米、仰光米、安南米，番糖推倒蔗坊，洋面消灭磨房，苏广杂货半为舶来品……”。到了清末，安海开始出现“行郊”：有以所售商品为名的如杉行、布郊等；有以贸易地区为名的如福郊、北郊等。后来又有“香港郊”，主要经营乾味，规模较大的有三益、晋安、顺发等号，是买办性质的商行。又有二盘商（俗称铺家）二十多家，零售商（俗称小八炒）十多家。①应该指出，各种行郊的设立，是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市商畸形发展的产物；而香港郊则是买办资本的一部分。

（二）近代交通事业的创办。海外贸易主要靠船，造船业的发展为海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安海附近的东石、石井自古就有造船工场，东石全盛时有玉记、义春等船行十多家，其中玉记船行有大帆船14艘，船队曾远航实叻。②据东石乡老人称，附近的埕边村，有人专以造船为生，且世袭为业。光绪年间，安海与厦门间开始川走小火轮，初时为外商经营的“施夕戈”号和“新马”号，后来又增加了民营的后海、江宁、飞英、飞凤等十多艘。每日有四艘小火轮对开安、厦间，往来商旅、华侨每天都有五百左右人。③小火轮的川走促使安海港出现新的繁荣，所以《同安县志·城市志》载：“小火轮交通较为便捷，安溪、南安、永春各商户，遂向晋江之安海交易，安海之商业繁盛，而同安之

①郑士美：《辛亥革命前后安海社会见闻杂录》，《晋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②蔡惠仁、蔡福藩：《东石玉记行航运贸易简史》，《晋江文史资料》第二辑。

③《安海志》卷十二《海港·船交》。

商务日就凋零”了。

陆路交通方面，除原有众多的肩挑骡运之外，到了民国初年，又有汽车路的开筑，最主要的是1919年开筑的泉安汽车路（由安海至泉州城南顺济桥，以后又进入市区），全长28公里，是全省第一条民办汽车路。随后又相继开筑了一些支路通石狮、永宁、衙口、深沪、围头等地。小火轮和汽车的运用，使安海出现了客运拥挤、货物山积的盛况，成为闽南一大吐纳港。此外，安海香港郊在香港和日本神户设有联号、办户等分支机构，并最早用电报通行情，商品信息大为灵通。近代交通工具的开创和运用，促使安海港在近代的再度繁盛。

（三）安海人相继移居台湾。福建与台湾自古就有往来，史籍早有记载。崇祯间熊文灿抚闽时，曾遣饥民数万人，随给银米耕牛，迁台垦殖，事载《赐姓始末》。这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大移民。当郑芝龙开辟台湾时，有晋、南贫民三千人迁台。郑成功驱荷复台时，安海人随军渡海的很多。其中有东石富商蔡源利和蔡秉禄，捐粮三百石作军饷，并随军入台定居，成为开发嘉义县布袋镇的先驱。台湾在郑氏时期的大陆移民达十万人。到了清末光绪年间，增至三百二十多万人，其中安海人当占一定比例。在台湾各地先后建立的龙山寺达四百多座，可见清代以后安海居民迁台之多。<sup>①</sup>又如东石蔡氏移民在嘉义县一带聚族而居，繁衍子孙，至今仍以“莆阳衍派”、“玉井世家”相传。

（四）安海华侨在家乡兴办实业。明清以来安海人侨居南洋的很多。辛亥革命前，安海乡侨或投身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或在家乡兴办实业，以求救国裕民。辛亥革命后，安海乡侨独资

---

<sup>①</sup>李建成：《晋江县与台湾亲缘关系初探》，《晋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或合资兴办的实业陆续出现，如陈清机，先后筹资兴办泉安汽车路、安海桥西垦殖公司，发起创办“安南永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后因发生“闽变”而中止），与蔡德远父子合资承顶了安海和泉州的电力公司，参与创办养正中学。<sup>①</sup>陈清机是一位有代表性的爱国爱乡华侨。又如安海人颜鸾，将自己早年办的有木机器400台的东安布厂，招股改建为利群电机染织厂，初期有织布电机30台，后发展至74台，在厂工人达250人，日产棉布近60匹，成为东石电机织布的先声，<sup>②</sup>为近代晋江县纺织业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五）1919年安海曾一度设县。民国初年，安海成为靖国军统治下晋、南、同的经济文化中心；1919年4月5日在安海设“晋南同政务处”作为领导中枢。同年10月12日改组政务处，设置安海县，以林学增为县长，县署设于奎光阁。安海县的辖区北至泉州城南顺济桥，南至南安水头返头乡，东至海，西至南安溪尾双溪口。1920年1月21日，又与南安县重新划分辖区，即官桥以北归南安县，官桥及其以南的大盈、莲河等地归安海县。1920年8月底，靖国军撤离闽南，进驻安海县的粤军，于4月6日委任姚承魁为安海县知事。至同年9月第十混成旅第二团台永生部入驻晋江县，粤军退出安海之后，由旅部派晋江县佐张桑进驻安海。于是安海县废，仍隶属于晋江县。<sup>③</sup>近代安海置县，时间虽极短，但这是安海港史上值得一提的一件大事。

①周基亮：《爱国华侨陈清机先生》，《泉州工商史料》第二辑。

②丁苏州、陈天界：《东石纺织业发展梗概》，《晋江文史资料》第二辑。

③洪少禄：《军阀统治时期的安海》，《晋江文史资料》第二辑。

总之，安海港是古泉州港的重要支港。虽然，泉州古港的兴衰变化，对于安海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安海港发展变化的过程，却具有不同于泉州港史的历史特点。唐宋时期，安海港随着泉州港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而日臻繁荣；元代，泉州港进入极盛阶段时，安海港却出现了中衰现象；明代，泉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大港的地位日益下降时，安海港反而发展到全盛阶段；到了清代以后，泉州港衰落了，安海港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出现新的变化和繁荣。因此我们研究安海港史，必须根据它的历史特点，了解它的盛衰变化的过程，以便从中找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 二 安海港的历史作用

一千多年来，作为古泉州港重要支港的安海港，曾经几度蹶而复振。清代以后直至近代，在整个泉州古港衰落不振的情况下，安海港仍然是泉州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为泉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我们在探讨安海港的历史作用这一问题时，必须抓住这个特点。

安海港的历史作用，首先是它充分发挥了古泉州港重要支港的促进作用。作为支港而言，安海港比后渚港兴起得比较早。虽然在宋末元初一度中衰，但明代又因私商贸外的频繁而发展到极盛阶段。进入清代，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繁荣，从而促进泉州地区社会经济的新发展。这个支港的促进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明代安海港的全盛发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是安海港的又一历史作用。明代安平商人的商务活动，对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有积极的影响；这正如傅衣凌教授所指出的：“安平一镇在明代经济史上，实居于特殊地位。”<sup>①</sup>明代安海港的繁荣，使闽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安海志·物类》记闽南各地货物多运到安海，大宗贩运海内外；安海人将安溪、永春、德化等地的布帛广销海内外，也促进了安海纺织业的发展。明人何乔远《秋日安平八咏》中有“巷女能成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的描述。安海港的全盛，还促进了闽南人的相继出国，这是明代安海港的又一影响。

应该肯定，安海港在历史上是建立了重要功绩的，主要表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一）促进古泉州港的发展。安海港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古泉州港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重要支港。唐、宋、明时期，它为古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起着促进作用。明代曾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到了清代以后，安海港又以新的特点新的变化，发展成为闽南地区进出口贸易中心。可以认为，安海港以其各方面的力量，加速了古泉州港繁盛的步伐；然而它自身又具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当古泉州港转向衰落阶段，安海港却臻于全盛时期。清代以后又发展成为闽南地区的主要出入港口。

（二）加速了安海市镇的建设步伐。宋代安海的设津、置镇，显示了安海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建桥、造塔，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明代安海港的全盛，除了促使安平桥的三次重修之外，还有弘治间重修石井书院以兴教化；嘉靖间建安平石城和二敌楼以防倭；万历间设驻镇馆以立分府；又如修堤岸、寺庙，设

<sup>①</sup>傅衣凌，《安海志·序言》。

安平等五铺，都各自为安平古镇展现新姿；而直通南北的通街和东门、西门等街，也都是店肆罗列，而以直街为最盛。明末郑芝龙的置第安平，使安海“市镇之繁荣，贸易之丛集，乃不亚于省城”。<sup>①</sup>清初施秉按旧规重建了安海街市；康熙间设户部税馆（鸿江澳）以榷税，移古陵寨把总驻安海以加强汛防。清末以后，安海在地方建设（如街市、交通等）、兴办实业（如农垦、纺织等）、商业经营（如设行郊、香港郊等）以及服务行业（如客栈、搬运）等方面的发展，在本省都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些也为1919年安海曾一度设县，创造了条件。

（三）密切了泉、台关系。如前所述，安海与台湾之间，不仅有人员的往来，而且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播，更有频繁的商务活动。无论是地缘、血缘、经济、文化以至宗教（台湾各地有龙山寺四百多座）等方面，关系都是很密切的。

（四）促进了泉州华侨的出国。泉州华侨出国史可上推至唐代，天宝十二年（753年）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就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晚唐又有泉州僧人智宣，旅居印度达二十多年。宋元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泉州人出国的日多，史籍上常有记载，如《宋史·高丽传》记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或滞留之终身；《宋会要辑稿》中鄂邻逃居占城；《夷坚志》中的王元懋留居占城十年等等。明代泉州人出国的更多，《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东西洋考》等书记南洋各地居民时，多有“漳、泉人流居于此”的记述；从《东西洋考》所载，可知明中叶以后泉州出国的人数，远比明初为多。这正是明代安海港全盛的积极影响。明代安海人出国的很多，据《景璧

<sup>①</sup>《安海志》卷十二《海港·港交》。

集》记载：万历癸卯年（1603年）吕宋夷变时，安海出现了“安平巷哭”，“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其几人称寡”的悲惨情景。清代泉州人更大批出国，并一再形成出国的高潮。到了近代，安海港更成为泉属各县华侨出入国境的主要港口，安海及其附近地区，也逐渐成为福建最富庶的侨区之一。

（五）加强了中外友好关系。如旅居印尼的安海华侨，“或为居积转输之商贾；或为种椒植麻之农夫；或为潜海猎珠之渔民；或为淘金采锡之矿工。百业齐举，为印尼之垦殖开发，立汗马之功”。<sup>①</sup>又如安海华侨龚补伯，在乾隆年间充当苏禄国使臣来华通好。再如清初安海雕像名匠范道生，为日本各地黄檗宗寺塑造了大量佛像，对日本的造像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黄檗宗名僧喝浪，是安海金墩黄钟珂之子，他善于绘画，所绘的《芦叶达摩图》，被认为是黄檗文化的珍品，收入《黄檗美术》专集中。到了近代，旅日安海华侨陈清机等，转而从日本引入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畜良种，在安海办垦殖场，聘请日本技工筹备开发安溪等地的矿产（后以发生“闽变”而未果），为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写下了新的一页。

纵观安海港的历史，它因整个古泉州港之盛而盛，却不因古泉州港之衰而衰。到了近代，安海港更发展成为闽南地区进出口贸易中心，对闽南地区的开发，发挥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今，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引下，计划实施中的安海经济开发区，必将成为厦门经济特区重要的一翼。通过外引内联，注意发挥地方上资源丰富、华侨众多的优势，安海港一定会在新的形势下，焕发它的青春，增添新的光彩，这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侨外》。



# 从历史上闽海通贸看安海港的重要性

陈元煦

一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

①一千多年来，安海人民就利用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对外贸易，使安海港自唐开始至宋元时期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海外贸易港。

闽海通贸，盛唐始辟“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古港，宋元时期誉称为“世界第一商港”，13世纪末滞留在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泉州古港比亚历山大港更繁盛。14世纪中叶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巴都他（Ibn-Battutah）说泉州古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安海港系泉州四大古港之一，属泉郡之大镇，当水陆交通之要冲，实为通贸海外之良港。

因安海港所处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海外便利，所以自盛唐之后，随着海路之畅通，包括安海在内的泉郡各港对外贸易日益昌隆发展，世界各地商人相继来此行贾。如唐天宝时人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云：

---

①《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84页。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①

这首诗充分说明了当时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泉州来自国外的商人、使节和传教士甚多，因此才有“市井十洲人”的咏赞。因安海港为泉之属港，故亦相因见盛。

宋时泉州各港与国外往来的有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到了元代则发展至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足见泉州各港在当时海外贸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人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中说：“泉，七闽之都会，番货运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取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②所谓“号为天下最”，正是说明了泉州各港在当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

据元代官方文献《通制条格》记载，由泉州各港启航到各地经商的海船，远至“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③“回回田地里”指的是阿拉伯世界，包括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非洲东北部广大地区；“忻都田地里”指的是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就是当时所谓“西洋”。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载泉州各地舶商活动，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夫东南诸夸，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④高句丽指朝鲜半岛，阇婆即

①《钦定全唐诗》卷七。

②《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③《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

④高启，《青邱诗集》卷十。

爪哇岛，罗斛即泰国南部。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东起朝鲜半岛，中及东南诸国（当时称这些国家为“东洋”），西抵印度洋、波斯湾，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与包括安海在内的泉州发生海上贸易关系。①

## 二

自唐宋以来，封建王朝为了发展海上交通贸易，十分重视造船业的发展。所谓“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②便是当时泉州造船业发达的真实写照。福建创造的一种著名“福船”，与明朝时代的沙船、乌船、广船并称为我国四大船型。《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六云：“海舟以福建为上”，可见对福建造船业评价相当高。因此到北宋宣和间朝廷遣使去高丽，不在北方雇船，而向福建雇船。到元代，朝廷为远征日本，屡谕福建泉州等地造船。至元十六年造战船六百艘，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③因此，《太平寰宇记》也把海舶列为泉州土产之一。连南夫《修城记》记载：“泉州有万乘貔貅，千艘犀象”，也说明泉州所造海舶数量之多，这为保证航海经商提供了足够的交通工具。因此，安海经商者，大类徽州，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据《安海志》记载：“安平商人，素以尚贾善贸闻于世。行贾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贸海则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货殖则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明何乔远尝以徽州商人

---

①吴泰、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泉州港的兴衰》。

②谢履：《泉南歌》。

③《元史》卷十二。

喻之，曰：“徽州以一郡，安平以一镇，其贾行遍天下者，安平人却与徽州人相类。然徽州人之贾，仅历江湖以遍全国，而安平人之贾，却浮沧海远及诸夷，此又为徽州人所不能比拟者。盖安平人之经商行贾，莫不以海港通贸为依凭”。自唐开元年间开始，就有安海东石澳林銓及其裔孙，为航海世家，拥有航海大船百余艘，他曾于公元七二〇年就首航渤泥；以其利溥，沿海很多畚民也跟随他到渤泥、琉球、三佛齐、占城等地进行贸易，并引来外国舶商来东石澳以至安海经商。

到了宋元时期，随着泉州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造船业的兴盛，泉州港海外交通达到最繁荣的阶段，当时由泉州启航到世界各地通贸的，主要有到占城；到三佛齐、阁婆、渤泥；到印度的故临，转赴波斯湾；到亚丁湾和东非沿岸的弼琶啰（今东非索马里）、层拔（今东非桑给巴尔海岸一带）等地；到高丽等六条航线。安海是泉州的属港，它也随着泉州海上交通贸易的繁荣而繁荣起来。这个时期，安海贸易兴盛的情况，正如《安海志》所描述的那样：宋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风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镇市店肆罗列，百货杂陈，举凡越裳翡翠，南海明珠，无所不有，丝绵锦绮，毡毛靴袜，无所不备。镇市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而到泉州极盛的元时，“安海港镇，贾胡互市，车马辐辏，自镇至郡城，商旅络绎。沿途馆舍驿铺竞立，专为客商往来驻夜息足而设，如内市、古陵、五店市、新店等地均是。近郊，则有马坪、吕林专营驴马贩运之村庄”。这个时期的安海，客商如流，店铺林立，洋货充斥，堪称繁华之市镇。

至明清时期，安海的海上交通贸易虽受到明代禁海和清初辛丑迁界的影响，但在一定时期内，市镇之繁荣仍不减当年。如明代末年，安海出现很多巨商大贾，像陈斗岩、李寓西、曾友泉

等，均曾于垂髫之年，即附商贾贾于闽粤之间。安平之农、儒、童、妇，几乎都卷入商贾的行列。既有稚年能贾和壮岁事贾者；也有从儒入贾，儒贾兼之者；还有妇人女子能贾者，如一位郑氏妇女，随夫到广东经商，因夫客死，遗下两个小孩，郑氏即接替丈夫的事业，自己干起来，抚养孩子成人，方回到安海。明李光缙《景璧集》云，安海人外出经商，“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sup>①</sup>何乔远《镜山全集》也说安平商贾“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别，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sup>②</sup>可见明代安平经商事贾的风气还是相当盛行的。

入清以后，顺治十八年，迁沿海30里之内的居民于内地，界外悉墟其地，安海的寺观、宫室、官廨、民居，扫数焚毁。当时截界令一下，沿海居民几陷入死亡的境地，郭凤喙的《截界行》有极悲痛的描述：

昨夜府帖下，附海尽弃迁；  
官军来驱逐，长吏命难延。  
限期出乡井，眼见毁屋椽；  
亲属骇相对，号泣但呼天。

.....

暮投树下宿，朝坐草头餐；  
回首望故乡，惨淡无人烟。  
壮者身何托？老幼难相全；

---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②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四十八《寿颜母序》。

饥寒更转徙，他邦谁肯怜。①

当时安海的情况是，海港沦于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复界后，情况迅速发生了改变，那时背井离乡的安海人民又陆续返回家园，重建家业，经过雍正一朝，到乾嘉年间，安海的商业贸易又渐趋兴盛，这时市镇上纺织作坊、家俱木工场、木偶戏班、磨面作坊、豆腐房、药铺、木材行、染布坊等，到处林立。至清末，安海商贾经营的项目，分工更细，有的是以经营的物类成立行铺，有的是以销售的地区成立所谓“郊”的组织，如福郊、厦郊、漳郊、北郊等等。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成立的行铺、行郊等组织，都说明了复界以后，安海又很快地出现了市镇繁荣的景象。

### 三

随着安海贸易之繁盛，安海港又是以多种多样物资集散地而闻名。在闽海通贸中实际起着—个沟通信息的作用。它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城乡人民之货需，由世界各国运进多种多样的物资，经由安海销往通都大邑，直至穷乡僻壤。同时，商贾又深入内地收购当地土特产，经由安海集散，通贸世界各国。如安平商人常从海外运回珠贝、犀象、乳香、翡翠、胡椒诸蕃货，销售至两京、吴、越、齐、蜀等地，或者从世界各国搜罗牛、马诸筋；批运安海，再由安海港郊商人设工场加工，运销全国各地，或者从海外贩进干果杂货运入安溪、永春、德化等县，采购苧麻、木棉，或运至河南太仓、温台等地贩回棉花，以供安海妇女织缕成

---

①郑王臣，《莆风清籁集》。

布，年产数千匹，海运交趾、吕宋等国货利。安海商人在行贾两京、吴、越、齐蜀等地时，转贩当地的丝绸、锦缎、药材，远贸琉球、占城、麻逸、渤泥等国，以博厚利。

此外，安平商人还在城乡各地购回米、糶、北镇布、青山布、磁器等，以及柑市之柑桔、大宅之茶叶，均供安海商贾之需用，有的还供作安海港口之外运。这种为适应内外商贾之货需，销售舶来品，转换土货，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不仅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手工业的发展，明代何乔远《咏安平》的诗句就是明证。其诗云：

灵岩山下万人家，古塔东西日影斜；  
巷女能成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山镇田稀多贾海，小村市闹亦成墟；  
只惊五斗碱仍浊，不怕三餐饭少鱼。<sup>①</sup>

#### 四

回顾安海在历史上对发展海上交通贸易所处的地位和促进国内城乡经济的繁荣，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瞻望安海未来发展的前景，确有许多为其他市镇所未曾具有的优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

首先，安海依山傍水，途通海达，历史上就是泉南的一大都会。自唐以后，安海商人就陆续远航至东、西洋各国通贸。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谈及两浙海商对外贸易时称：“若欲船泛

---

①《安海志》卷三十六《诗咏》。

外国买卖，则是（自）泉州便可出洋”。安海是泉州的属港，也可换句话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自）安海便可出洋”，实为通贸海外之良港。在国内也可以上接泉郡、下达漳、粤；北航福州、温州、杭州、上海等地，南通金、厦、台、澎之舶，水路交通堪称便利。当此举国正在贯彻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之时，安海凭藉自己的优越地理条件，在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列为开放区后，安海完全有条件逐步建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在我省四化建设中它必将起到一个重要的“窗口”作用。

其次，安平濒海，原是一个地少人稠之区，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安海人民素以尚贾善贸闻于世。据记载，历史上安海有十分之七的人从事经商行贾的活动，连童、妇亦皆能贾。可见安海人民具有较高的经商素质，在我国大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时候，需要较多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安海地少人多，大部分人可以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扬长避短，发扬当地人民尚贾能贾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商业活动，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安海港通洋贸外，安海人民泛海市夷，有着悠久的历史，因经商而流寓海外的，或因其他原因而飘流异国的，为数甚多。从安平抽集十一家族谱统计，明清两代侨居地就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安南、柬埔寨、缅甸、婆罗洲、日本等国，安平华侨之足迹几乎遍及南洋各埠头。海外之华侨素具爱国爱乡之深厚感情，历万里尤常怀摇篮血迹之地，虽百年而不忘根植故壤之乡。华侨中巨商大贾，或拥有巨资者为数不少，安海完全有条件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关于引进侨资的优惠政策，凭藉安海与华侨有着祖根和亲缘的关系，鼓励华侨参与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这方面安海人民可以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 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韩 振 华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云：“景德元年（1004年）（越南）土人黎威杀（丁）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黎威当即黎桓之误。黎桓死年，有误，但其他记述，尚为可信。越南黎朝黎桓第五子黎龙延杀其兄龙钺而自立为国王，并任李公蕴为“左亲卫殿前指挥使”，赐姓黎。1009年李公蕴被推自立，自称留后，遣使入贡于宋朝，宋真宗封他为交趾郡王，继而又于天禧元年（1017年）封他为南平王，赐赉有差。

安南王李公蕴是闽人，沈括所云，当有所据，但究竟是福建何地之人，此即未详。最近查阅嘉庆年间晋江东石人蔡永兼辑录的《西山杂志·李家港》，却对李公蕴及其先世的情况，有了颇为详赡记载。《西山杂志》说李公蕴的父亲，是五代时人，名叫李松，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南唐议伐闽，侍中李松不可也，松（居）吾山（即安海梧山）之左。航海南来，避难于此（晋江县安海梧山之左的李家港）。其子李淳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罗湾（今泰国）诸国，安南、交趾尤熟（熟识）。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少子李公蕴（原抄本作李公素，误，今改），

北宋时，被推荐建立安南九世王朝。李家港为李山平之舟泊处也”。李公蕴是跟他哥哥李淳安即李山平航海到安南经商，后来住在安南，并任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有如御林军），继而自立为安南国王，建立越南李朝。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云：“李氏有国，自公蕴至昊昂，凡八传二百余年而国亡”。《元史》卷488《交趾传》亦说李公蕴的“李氏传八世，至昊昂”而亡。这与《西山杂志》所说的李公蕴“建立安南九世王朝”，是一致的，自李公蕴（一世），八传至昊昂，即九世矣。

《西山杂志》关于李公蕴这一家靠航海经商为生，也有一些零碎的记载，如：《西山杂志·下庄》条云：“宋太平兴国，大房（地名）李氏航海。海滨贮货之所，别上、下二庄。上庄，大房；近海曰下庄。后，颜氏入居之，又称下村焉”。又《西山杂志·大房》条云：“大房口蓬山之称也，其非大宋之强房也”。

“宋时迁居溪边五李社，历世单丁，明德公至繁衍，而五李俱航海安海而家之大房。”

## 二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云：“陈日照者，本福建长乐人，姓名为谢升卿，少有大志，不屑为举子业，间为歌诗，有云：‘池鱼便作鸱鸢化，燕雀安知鸿鹄心’，类多不羁语。好与博徒、豪侠游。屡窃其家所有，以资妄用，遂失爱于父。其叔乃特异之，每加回护。会兄家有姻集，罗列器皿颇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于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颁未满，殴之，中其要害，舟遽离岸。谢立津头以俟，闻人言舟子殁，因变姓名逃去。至衡（湖南衡州），为人所捕，适主者亦闽人，遂阴

纵之。至永州，久而无御，接受生徒自给。永守林岳，亦同里，颇善里人，居无何，有邕州永年寨巡检过永，一见奇之，遂挟以南。寨，居邕、直间，与交趾邻近。境有弃地数百里，每博易，则其国贵人，皆出为市。国相乃王之婿，有女，亦从而来，见谢美少年，悦之，因请从归，令试举人，谢居首选，因纳为婿。其王无子，以国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之属婿，以此得国焉。自后，屡遣人至闽，访其家，家以为事不可料，不与之通，意以岁久，难以访问返命焉。其事得之陈合惟善金枢云”。

周密根据陈惟善所述，说安南王陈日照是福建长乐人，又说陈日照未出国之前，曾在衡州犯罪，为同乡里人林岳所救，林岳，据《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一）古迹》云：“瑞莲堂，在（泉州）州学之讲堂之右”，“乾道七年（1167年）林教授岳，建斯堂，额曰瑞莲”。这样看来，有可能陈日照与林岳的确是同乡里之谊，亦即同为晋江人，所以日后林岳为永州守，才会看在同为晋江人的乡里情谊上，善待同乡里的晋江人陈日照。因此，说陈日照是长乐人，迨有未是。这个问题，最近翻阅《西山杂志》幸得解决。《西山杂志·陈厝坑》条云：“陈厝，在仁和里（即安海）之东，俗曰陈厝坑。唐、宋之邱家，湾海出航，舟可至也。陈厝之来，起于三国，垂及东晋，相传避五胡而来者，为泉州开族之鼻祖。五代之陈洪进平海节度使，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归附宋，三年，建陈埭。北宋陈博，隐居华山，其子陈业安，于太平兴国六年，任泉州推官，业安子东明，皇祐时（1049~1053年）任泉州之榷市司，为茶茶令，宗族植茶于大宅（地名）。茶之涤暑沁心，运销广南、交州。（陈）东明曾孙陈日照，字阳光，其世代居湾海，自行交州经商，深得交人之心望。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日照以安南入贡，端平丙申三年（1236年）复入贡。于是，册封陈日照为安南国王”。可见陈日

照是福建晋江湾海（安海）人，陈日照一家，一向经商广南、交趾，在当地有一定名望。陈日照少年时，放荡不羁，有偷窃不法行为，以后变姓名——可能改名谢升卿，逃亡他省。几经波折，最后，在广西永州被同乡里（晋江县人）的永州守林岳因“颇善里人”而逗留在永州，之后，乃由永州到邕州，终于流入安南，并于日后为安南王。至于陈日照如何成为安南王，说者多矣，可参阅《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佚名《越史略》卷三、《大越史记全书》卷七，和黎正甫《安南国王陈日照考》（文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六期），兹不赘述。

据说，安南王李公蕴的老家——安海李氏一家，和安南王陈日照的老家——安海陈氏一家，他们一以晒盐，一以织布而闻名于安南，《西山杂志·纱岗》条亦有记述，说：“陈厝盖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苳（Kapok）。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自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纱岗）。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李厝有唐埭，铺之瓦埕，作坎垆，以晒盐，销之交（交趾），交人曰李氏之盐。有衣有盐，是故李氏、陈氏，能得交人之心望焉。纱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苳潭也，海潮入焉”。

总之，宋代前后二位安南王——李公蕴和陈日照，都是福建晋江安海人，李公蕴创建了安南李氏王朝，陈日照创建安南陈氏王朝，而且安海李公蕴的李氏一家和安海陈日照的陈氏一家，都是贸易于安南的著名海商，但是，他们两人都不是由直接经营海外贸易然后爬上越南封建政权的最高宝座，而是几乎都是先为越南华人，然后做了越南官，最后才登上王位。无论中国海商资本也好，海外华侨资本也好，在那个时代，都没法于利用他们的

商业资本而介入政治，甚而左右政治，只有他们作为当地人的一份子，他们才能按照当地的政界梯阶，逐级爬上，爬得多高，那就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附记：本文所引用《西山杂志》一书，乃据庄为玘教授的摘抄本，特此致谢。我盼望不久的将来，《西山杂志》不会再是传抄本，而是能够根据各家的传抄本集成为一本较为准确或较为接近原来手稿本的刊本《西山杂志》。）

## 安海在宋元时期泉州港 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吴 泰

### 一

位处福建东南海滨的泉州港，自南朝以后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入宋以后更发展成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sup>①</sup>的繁华港口。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宋朝政府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泉州港成了宋朝正式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在南宋时期，因为宋廷南迁等原因，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更迅速发展。南宋初年的李文敏赋诗称赞泉州港是“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谢履的诗中有“岸隔诸蕃国，

---

<sup>①</sup>《宋史》卷三三〇《杜纯传》。

江通万粤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等句。<sup>①</sup>南宋中期的王十朋在出任知泉州时，也称赞泉州“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王十朋还有“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sup>②</sup>描绘南宋时泉州港中外海商每年出港及返航的繁忙情景。从现存史料看，东到日本、高丽，南到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等南海诸国，都有泉州海商的足迹。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商人都把泉州港作为他们来华贸易的立足点和常驻地，一些外国政府的贸易使臣也从泉州登岸。据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陆守《修城记》说，泉州“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赵彦卫《云麓漫钞》也记载说，在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以前的南宋前期，到泉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分别来自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岛）、占城（越南南方）、高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以后，泉州港的地位就赶上广州。到了元代，泉州在当时中国诸海外贸易港中的地位，更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海外贸易港。

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作为当时泉州所属地域的安海港及安海市，海外贸易活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记载说：

“安海镇，府南二十里，古名弯海。宋初始改为安，曰安海市。西曰新市，东曰旧市。海舶至，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建炎四年，置石井镇。……元置石井镇巡司于此”。

清乾隆年间修撰的《晋江县志》，有关“安海城”的记述，

---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福建路泉州》。

②《梅溪王先生文集》卷二一《泉州到任谢表》；卷一九《提舶生日》。

基本上同此。

“弯海”是根据这一海域形状取名的，据“弯”改成“安”，既反映了出海经商的人希望航行平安的心理，也说明这个海城是船舶避风最安全的地方。这两层意思，都说明停泊在这个海湾中的海船，已经相当多。因此，“安海”在宋代改名本身，就是这个港澳海外贸易发展的很好说明。

《读史方輿纪要》和《晋江县志》的记述都清楚表明，在宋代，位于安海港顶端的有东西两市，分别称为“旧市”和“新市”。“新市”显然是宋代新出现的交易市场。安海既然有“新市”出现，就说明安海市原有的“市”已经容纳不了到这里贸易的众多商旅，已经不能适应商品交易发展的需要。所以，“新市”的出现也是宋代安海市迅速发展的证据。

由“市”演变成“镇”，则是商品交易进一步活跃的反映。南宋人陈郁说：“城邑交易之地，通天下以市言。至村落则不然，约日以合，一哄而退，曰墟，以虚之日多，会之日少故”。<sup>①</sup>“墟”就是城邑以外的村落的定期集市，有的地方称为“草市”。安海之有城，是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事情。当时因“海寇奄至，镇官方某筑土城垒石为门备之”，<sup>②</sup>从此安海才成为一座城邑，其中的“市”，才成为“城邑交易之地”。在这以前的“安海市”，显然只是村落的墟市。宋代的墟市发展成镇市，一般都是商业发展、定期集市已不能满足商业贸易需要的结果。史称“宋制，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sup>③</sup>墟市和草市不设行政官员，一升为镇，就要为朝廷的吏部差派监镇官。

---

①《藏一话腴》甲集，卷上。

②《晋江县志》卷二。

③《事物考》卷一。

在建炎四年（1130年）以前，安海只是个墟市，平时显然也没有专门的收税官吏。只有“海舶至”，泉州才“遣吏榷税于此”。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把安海市升为“镇”置石井镇，派官阶为从九品下阶的迪功郎担任监镇官，从此有了专门负责一镇课税的官员。这是安海商品活动发展的一个标志。

宋代安海商业活动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安平桥和东洋桥的修建。南宋时期，在泉州地区掀起了修桥热潮，而这里许多桥的修建都是有商业活动的意义的。王十朋《石笋桥》诗有“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騾牛。论功不减商舟楫，遣利宜书汉平淮。莫将风月比扬州，二十四桥真蠢蠢”等句，<sup>①</sup>描绘泉州石笋桥对商业活动的巨大价值，说明这里的桥不同于扬州的二十四桥，并不只有玩赏的意义。横跨海湾两岸，连接晋江、南安两县，长达八百余丈的安平桥建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据《清源旧志》记载，在安平桥建成以前，这里“方舟而济者日千万计”，船渡往来十分繁忙。在安海港东岸的东洋桥长四百三十二丈，也建成于绍兴年间。显然，安平桥和东洋桥的建成，是适应安海湾两岸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需要的。

安海市在宋代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明显打上了海外贸易发展的印记。据唐代王建《汴路即事》诗：“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sup>②</sup>宋代的安海，既有东西两个墟市，又有专征海舶税的“石井津”。可见，在唐宋时期，草市、墟市和“津”二者地位相当，但又有区别的，前者为一般土特产商品的交易之所，后者为对海商征税之所。宋代的安海由“市”升为“镇”，不直接沿

<sup>①</sup>《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一九。

<sup>②</sup>《全唐诗》卷二九九。



用原“市”的名称，而是沿用原征海舶税所设置的“石井津”的名称，建“石井镇”。这充分说明，宋代安海的商业繁荣，居主导地位的是海外贸易的繁荣。安海的建“镇”，是安海港海外贸易发展的直接结果。

宋代安海市的繁荣和安海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同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南宋初的建炎四年（1130年），因为金朝大将兀术率兵渡过长江侵入江南地区，原先海外贸易比较发达的两浙路诸港大都遭受战火的严重破坏，海外贸易不能正常进行。泉州港因为处在当时宋金战场的大后方，海外贸易在这一年获得很大发展，单乳香一项，就抽买到“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sup>①</sup>而宋廷却正好在建炎四年建石井镇于安海之滨。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1131~1162年），泉州港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从地位远逊于广州港发展成地位同广州港相当，<sup>②</sup>都出现“物货浩瀚”<sup>③</sup>的海外贸易繁荣景象。而同安海港海外贸易发展直接关连的安平桥、东洋桥又正好在这时期建成。到了元代，泉州港更发展成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而元朝政府却把设在南安县的石井巡司“移置于晋江安海市”，<sup>④</sup>加强对安海市的守备，这说明，元代的安海市比在宋代更受政府的重视。这三件事显然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安海港的海外贸易同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有力见证。

---

①《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香》。

②吴泰与陈高华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四章第四节。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三二八。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

## 二

安海市所在的晋江县，在宋代为泉州的属县，安海港所在的海域，就是泉州的海域。因此，安海港在宋代是泉州港的组成部分。既然它海外贸易同泉州港同步发展，这就说明，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同安海港海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关连的，安海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那么，安海港在宋代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中到底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南宋人谢履《泉南歌》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南面面对浩瀚无穷的大海，“州南”海域及沿岸的港澳在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是没有异义的。安海港是泉州“州南”的港湾。为了弄清安海港在泉州湾宋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必须先弄清它在泉州“州南”诸港中的地位。

在宋代，泉州州治以南的晋江、南安、同安三县，都是泉州的属县。这三个县的港澳，都是泉州“州南”的港澳。

晋江县的港澳，除了安海港外，还有围头港。真德秀说：“围头去州一百二十余里，正阡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围头“视诸湾澳为大，往来舟船可以久泊”，“寻常客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稍泊，盖其澳深阔（疑是“阔”之讹）可以避风一也；海中水咸不可饮食，必须于此上山取水二也”。南宋时围头这个地方已经“酒食店肆色色有之”。这样的繁荣景象，显然主要是海舶在这里停泊与贸易的结果。

同安县的港澳，主要有嘉禾屿（今厦门岛）、浯州屿（今金门岛）诸澳。据清代庄光前《同邑海防论》云：“同为海滨之区，其形势居要冲者有三，由内港石浔而南为嘉禾屿，今所谓厦门是也。稍东为浯州屿，今所谓金门是也。其间列岛棋布星罗”。此外还有“孤悬海中，抗扼海边南境”的浯屿。这些岛屿“据海疆扼要，北连二浙，南接百粤，东望澎湖、台湾，外通九夷八蛮，风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来”。<sup>①</sup>庄光前说的虽然是清代的情况，但是，金门、厦门二岛及其所属岛屿在商舶往来方面的利便，却是早就存在的。宋人真德秀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就说过：“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屿首为控扼之所，围头次之。烈屿既有土豪乡兵可恃，围头合行措置。今欲创立小寨，……上可接永宁，下可接烈屿，外可照应料罗、吴屿等处，内可控捍石井一带港口，实为冲要”。并且把“料罗、吴屿”称为泉州的“通道门户”。<sup>②</sup>据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厦门志》说：“真德秀移宝林兵戍围头，照应吴屿、料罗等处。可见，真德秀奏疏中所说的“吴屿”，就是庄光前及《厦门志》中所说的浯屿。料罗即料罗湾，是金门岛南面的海湾。“烈屿”在《中国历史地图》中标明是小金门岛。由真德秀的奏疏可知，清人庄光前所说的当时同安县金门岛所属的岛屿和港湾，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是官府为保护自南洋海道来泉州贸易的海舶安全所注意的地方。浯州屿的港湾对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显然也是很重要的。

嘉禾屿（厦门岛）港澳的情况，据《厦门志》引清初孙云鸿《嘉禾海道说》云：“厦门在宋为嘉禾屿，屹然海中，周五十余

---

①《同安县志》卷二五。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八。

里，……港汊孔多，喷余波以四达，斯大小帆檣之集辘，远近贸易之都会也”。厦门港在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这种盛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厦门志》记载说，嘉禾屿所属的鼓浪屿，有个叫瑞晓庵的地方，这里“负山临海，舟可直抵其下，……后有金带水”，是南宋灭亡后被张世杰等拥立的帝昀投金带的地方，这里“多浮石，有泉名拂净，泉甘，海舶汲焉”。<sup>①</sup>帝昀是在从泉州撤往潮州途中经过鼓浪屿。据此可以知道，嘉禾屿与鼓浪屿在宋代是从泉州到广州的海道所需经过的地方。在宋代，既有许多“闽浙舟楫入广”，<sup>②</sup>在元祐二年设泉州市舶司以前，北宋政府还规定泉州海商出海及返港都要先到广州。由广州港到泉州及两浙诸港贸易的船舶肯定也不少，而且，同泉州毗邻的漳州在宋代海外贸易也颇兴盛，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漳州土产中，同海外贸易有关的就有甲香、海舶、香药等品种。《宋史·地理志》也说漳州“贡甲香”。嘉禾屿(厦门岛)为漳州治所出海所必经的地方。出入漳州九龙江口附近港澳的海舶也必须经过嘉禾屿。还有，真德秀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曾说“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sup>③</sup>嘉禾屿同浯州屿一样，位于泉州与漳州两州的海界之间，在“泉漳一带”通行的“番舶”，当然也要经过嘉禾、浯州二屿。这种种记载表明，嘉禾屿在宋代也肯定有海外贸易活动，也是泉州港所属的海外贸易港口之一。明清时期厦门港海外贸易的兴盛，显然是在宋代的基

---

①《厦门志》卷二。

②《读史方輿纪要》卷一〇一。

③《真文忠公文集》卷八。

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宋初建成的安平桥，自南宋以后一直是同安沿海及厦门到泉州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安平桥的修建，看来不仅是安海港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很可能还有适应泉州市舶司加强对嘉禾屿海外贸易的管理以及从嘉禾屿一带港口运送船舶到泉州在交通上的需要。

南安的海域较小，据清代顺治十四年编纂的《南安县志》卷一《形胜图说》云：“南安……极南一带巨入晋、同之界，孤悬海冲，是曰石井”。南安的港主要是石井。但这个“石井”并不是《读史方輿纪要》中记载宋代泉州遣吏征收海船税的“石井津”及建炎四年（1130年）设置“石井镇”的地方。如上所述，宋代的“石井津”和建炎四年设置的“石井镇”都在今晋江县的安海镇。在宋代，不仅晋江滨海地方有“石井镇”，在南安县称为“石井”的地方也不仅一处。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说：“石井墟，在县西南下坊村，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置，北距州城六十里，南去石井镇十五里”。这是以“石井”取名的机构不一定在“石井镇”的有力证据。而且，石井巡司设于绍兴十四年，在宋朝置“石井镇”的十五年之后，它同石井镇的设置也明显是两回事。清顺治年间所编撰的《南安县志》卷五《台砦》条云：“石井四澳砂碛四露之地，本无藏积可以窥伺，然海寇欲犯安平，石井即其南岸首登之地，旧设巡司于此”。这则记载说明，南宋所以在距今南安石井镇十五里的地方设石井巡司，并不是出于保护石井当地海外贸易的考虑，而是为了保护因海外贸易发展而显得富庶的安海（安平）。《南安县志》还明确说，“孤悬海冲”的“石井，向多渔船”。可见，南安的石井在历史上主要是一个渔港，而不是海外贸易的港口。真德秀在《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中，只说在“湿膾贼徒”“侵犯郡境”时，“本州亟牒左翼军遣发官兵及劝谕晋江、同安管下诸澳

民船，与官军会合前去收捕”。<sup>①</sup>而不曾提到“劝谕”南安管下港澳的民船，这显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当时南安石井一带港澳海外贸易不甚发展，这里的“民船”对官府捕捉“海盗”能起的作用微不足道的缘故。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宋代泉州“州南”港澳，除安海港外，还有晋江县的围头澳，同安的嘉禾屿和浯州屿及嘉禾屿以北的内港石浔。这些港澳在宋代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产生一定的作用。我们不能把谢履《泉南歌》中所说的“州南”，仅仅理解为指出安海港的一个港澳。但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在这几个有海外贸易活动的港澳中，只有安海港设立专征海舶税的“津”。宋朝政府还把安海由墟市升格为“镇”，设监镇官，还修建城池以防“海盗”劫掠。可见，宋朝政府对安海港海外贸易的重视，超出了对其他港澳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安海港海外贸易发展和重要性超过其他港澳的一个自然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宋代泉州“州南”临海的各个港澳中，围头澳、浯州屿、料罗湾、嘉禾屿等港湾的海外贸易对泉州港来说虽然都占一定的位置，但是，安海港在其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入元以后，没有任何材料说明这种位置有所变化。

### 三

在宋代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活动中，“泉南”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宋元之际的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下《佛莲家赞》篇中

<sup>①</sup>《真文忠公文集》卷八。

说：“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殁，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货，见在珍珠一百二十石，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首告隐寄债负等”。癸巳年应是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其时距南宋灭亡仅十多年，这个蒲寿庚家族的女婿有如此庞大的船队和家货，显然是从宋末就以“泉南”的基地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了。《元史》卷二一〇《外夷传》在记载自泉州到爪哇的航路时也说：“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而在安海附近的“南天寺”旁，南宋人王十朋书写的“泉南佛国”四个大字，迄今铭刻在一片花岗岩上。安海属于“泉南”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泉南”就是指安海港一带，那么，安海港在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中所占的位置，就要作更加充分的估价了。

然而，问题却是：安海港属于“泉南”，“泉南”却不仅是指安海一带地方。

在“南天寺”题刻“泉南佛国”四个大字的王十朋，在《州治即事》诗中有“泉南古州宅，草木有遗芳”之句。这说明，在王十朋那里，不仅安海一带是“泉南”，州治所在的泉州城，也是“泉南”。真德秀《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说：“窃见左翼一军，屯驻泉南，垂七十载”。据真德秀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说：“今来左翼水军三寨，曰宝林，曰法石，曰永宁。……今来左翼军创置围头新寨，添展法石、永宁两寨”。<sup>①</sup>宝林寨在泉州城南，法石却在泉州城东。永宁和围头都在晋江县。由此可见，“泉南”也不是专指泉州城及其以南的地方。南宋中期的叶适在《上宁宗皇帝劄子》中说：“臣切以泉素有乐郡

---

<sup>①</sup>《真文忠公文集》卷八。

之名，与他州异。盖土供皆滚平常赋。……比因更易频仍，……乐郡之名自此不可复得”。①叶适这个骈子的内容，说的都是泉州一州的事，显然，“泉南”就是泉州一州的另一种称谓。从真德秀所说的“泉虽闽镇，古号乐郊”，②以及刘克庄所说的泉州“素号闽之乐土”，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泉南”和泉州实是一个地方的两种称谓。因泉州附近的“泉山”（即“清源山”）而取名，州治又正在泉山之南。看来泉州之被称为“泉州”就是由此而来。在“泉南”范围内的港澳，不仅有安海、围头等“州南”的港澳，还有泉州城所在的泉州湾诸港澳。

从现存的文献看，宋元时期泉州港所包括的主要港口，不属于“州南”范围的只有泉州湾一处。为了判断安海港在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就有必要再把它同泉州湾的港澳比较一下。

作为一个海舶出入及停泊的港湾，泉州湾有许多安海港所不能比拟的地方。

首先，泉州湾扼晋江下游，又有洛阳江注入于此，水道深阔，港湾曲折，在泉州湾中的后渚、石湖、蚶江等港澳，都是可供海舶停泊和靠岸的天然港湾。流入泉州湾的晋江和洛阳江下游，也有一些可供海舶行驶的江道及停泊的港澳。这些自然条件，安海湾都不如泉州湾优越。

第二，在宋代，政府为了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及发展海外贸易，每年都要由地方官主持，举行宴请招待蕃商及祈风祭海的隆重仪式。泉州港举行祈风和犒设蕃商仪式的地方是泉州城西郊、

---

①《水心先生文集》卷一。

②《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七，《知泉州谢表》。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八，《胡侏仍旧直秘阁知泉州》。



可由晋江溯流而至的九日山。而“宋郡守祭海之所”，则是泉州湾北岸法石圣殿村的真武庙。在安海港的附近，则既没有官府举行任何同海外贸易有关的仪式的履载，也没有任何这类活动的遗迹存在。这种情况之产生，除了有泉州湾就在州治附近，而安海偏在一隅，郡守老爷们乃不愿辛苦跋涉这一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泉州湾是蕃商和海舶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祈风、祭海仪式，比在其他地方更有代表性，也更有意义的缘故。

第三，从文献记载看，宋元时期的泉州曾有许多海外客商，尤其是阿拉伯、印度等地区的海商在这里长期居住，有的甚至同当地居民通婚，成了长期居住泉州的侨民。宋代的情况是“蕃商杂处民间”，<sup>①</sup>元代则是“缠头赤足半蕃商”，<sup>②</sup>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现在的遗迹看，这些来泉州长期居住的蕃商，主要是住在泉州城及其郊区。至今遗留在泉州及泉州湾附近的阿拉伯人墓葬及波罗门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遗址及遗迹，就是当时海外客商集中居住在泉州城及泉州湾附近地区的有力证据。而到目前为止，在安海港周围都没有海外蕃客居住的遗迹出现。

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清楚说明，在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的中心在泉州湾。安海港尽管在“州南”诸港澳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但比起泉州湾来却大为逊色。安海港只是宋元时期泉州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附属港口。我们对宋元时期安海港在泉州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不能作过高估计。

---

①楼钥：《攻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状》。

②宗瀚：《金室全集》卷四，《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

# 安海史若干问题小议

陈 泗 东

安海是泉州的一个古港，早在北宋初年已成市集，明代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要港之一。安海又是一个文化古镇，历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我对于安海的经济、文化，缺乏深刻的研究：现在只把安海历史上的几点零星史实，提出一些议论，就教于诸君。

## 一 石井镇和安海城

研究安海的设置，有个说不太清楚的问题，即是安海古名石井镇，而现在南安又有个石井乡，是郑成功的老家，到底二个石井谁先谁后，关系如何呢？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必须先区分自然地名和行政地名，并把历代有关的原始史料进行列比，问题不难说明。

查南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卷一百三十载：“二朱先生祠在石井镇”。南宋的著作《方輿胜览》卷十二亦说：“二朱先生祠在石井镇，傅伯成记。”这个“二朱先生祠”就是朱松、朱熹父子的祠堂，傅伯成是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为朱熹的学生。安海有这个祠宗，可见南宋初安海的名称是石井镇，这两条资料是宋代的记载，可以作证。

《明一统志》卷七十五说：“安平桥在晋江县西南石井镇”。又说“朱松，监泉州石井镇，抱负经济，耻于自售。后胡世将抚谕东南，见松奇之，以闻于朝，召试馆职”。明《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杂志说：“石井镇在晋江县东南六十里修仁里安海市。客舟自海至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建炎四年（1130年）请于朝，乞差官监临，置迪功郎一员充监税”。又同书卷四规制志说：“安平镇城在晋江八都，地濒海，烟火接集”。因此，明代安海仍称石井镇，其城叫安平镇城。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八（注意此书安海人黄虞稷参与编写）才出现了南安石井和晋江安海的区别，“石井镇在南安县南七十五里，滨海。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置巡司在下枋村，去石井十五里，元移于晋江安海市。明正统后又自澳头移司于此，本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裁”。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五《都里》载：“（晋江县）八都，统图四。其地为安海……等二十一乡，在城西南五十里。宋为仁孝里，统于开建乡”，“（南安县）四十三都，统图一。其地为……石井等六乡，在县西南八十里。宋为崇教里，统于太平乡”。因此，清朝已记清南安石井和晋江安海，两地不混为一谈了。

南安石井是个自然地名，晋江石井镇自古就是安海的行政地名，在明代中叶之前，石井专指安海，另南安石井村只是一个小的自然地名，不为人知。到明正统（1436~1449年）间，移澳头巡司于南安石井村，加上郑成功是南安石井村人，郑氏声名大振，根据地又是安海，致不少人误认石井津、石井镇等是在南安今石井村了。

关于安海的建城问题，也需作一番议论。南宋初置石井津于安海，设立税务机构，此地本无城堡。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海寇突至，镇官才临时筑土城，土城不久就塌倒了。明嘉靖三十

七年（1558年）倭寇侵扰，知县卢仲佃才奉令筑石城。因《万历泉州府志》等书读者罕见，故把此书的资料照抄于下，以供参考。

“安平镇城在晋江八都，地濒海，烟火辏集，旧无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入寇，知县卢仲佃始议筑城。及半，贼猝至，民不能守，燔掠而去。镇人同府柯实卿拆东安桥石筑之，城乃完。周围一千二十七丈有奇，厚如之。分为四门，各有楼，列窝舍，设水关八。隆庆元年（1567年）郡守万隆于城东北增建敌楼二。先是岁遣千户一员或县佐一员，与民防守，仍拨民兵二十名。后兵益增多，民亦苦兵。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有议割晋、南、同三邑地置安平县，事下有司议，竟沮。乃徙本府督粮馆分镇安平，曰驻镇馆。隅正堂、后廨、仪门、吏房如例”。<sup>①</sup>

“安海城在晋江县西南六十里。古名湾海，宋初改名安海市。东曰旧市，西曰新市。海舶至州，遣吏榷税于此，曰石井津。建炎四年（1130年）置石井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海寇奄至，镇官自镇西偏循东北，筑土城，垒石为门备之，后圯。元置石井镇巡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徙司于同安之陈坑镇，仍为商民辏集处。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乱，甃石拓城，周一千二十七丈。门四，水关大小八。设官军戍守，亦曰安平镇。三十八年（1559年）、四十三年（1564年）倭寇屡来攻，皆不能陷。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移府通判驻此，后复旧。本朝雍正七年（1729年）以地为滨海扼要，移府通判驻焉”。<sup>②</sup>

安海明代因倭乱筑石城的时间，据《万历泉州府志》、《乾

---

①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上）。

②《大清一统志》卷二二八。

隆泉州府志》、《大清一统志》诸书皆作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今新编《安海志》据清人柯琮璜说作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相差一年，应以《万历泉州府志》为是。又明代议设安平县，据《万历泉州府志》及柯琮璜《安海源流考》均说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而《安海志》卷一沿革作万历三十四年，亦误。

## 二 “二朱过化”对安海文化的作用

在安海文化发展史上有个很有趣的事，当12世纪的南宋初，理学家朱熹三代都和安海发生过关系。朱熹之父朱松及子朱在都任过安海镇的小官，朱熹本人任过同安县主簿，往来安海。朱在文名不著，安海人不大提他，而特别突出朱松和朱熹，称为“二朱过化”。二朱过化不是后代提出的，朱熹的学生傅伯成，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泉州人，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简），就为安海建了“二朱先生祠”并写了碑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文选楼影宋抄本》说：“二朱先生祠在石井镇，傅伯成记。绍兴初，故吏部郎韦斋朱公松为（监）镇，士向慕之。故侍讲朱公熹后二十余年来官同安，间至镇，与镇之长上访父时事。嘉定中，镇官游绎于镇西为书院，绘二先生像而祠焉”。南宋《方輿胜览》卷十二，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二朱对安海的“过化”，南宋时已尽人皆知。从安海文化发展史来说，二朱无疑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可是，人们不应错觉以为安海的文化全是二朱倡导出来的。

经济发展之后，必然带来了文化发展，这是历史规律。我们可以与宋建炎四年（1130年）安海成立石井镇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安海复界作为划时代的二个标志，以观察安海文化的

兴衰。建炎以前是安海文化的孕育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设置了石井津，加上二朱过化的促进，安海文化蓬勃发展。经过明清换代，清郑交战，安海经济衰落了。康熙复界之后，虽有所振作，却已大不如前。我试从这三个时期安海文化的情况作一点小议。

安海的开发，早在唐代以前就开始了。（一）据说“唐开元八年（720年），林銮舟至勃泥、台湾，引入蛮船，恐被礁石，故造七星石塔”。<sup>①</sup>（二）据传“安海龙山寺在八都安平，古称普现殿。……隋皇泰间（618~619年）建”。（按《安海志》卷十六引这段话系出自《县志》，今查《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原文为“龙山寺在安海，相传始于隋朝”。）（三）灵源寺“在五都，唐时道士蔡明济居之。……有灵源，宋林知读书处”。<sup>②</sup>（四）“安连济……宋开宝中（963~975年）徙居本土西安聚奎坊，兴筑古陵桥岸，填地却潮以备农耕，济民粒食，是以乡人易湾海为安海”。<sup>③</sup>（五）据王安石所撰高惠连（973~1041年）墓志云，父宣奉与伯父朝奉始居安平，高氏一族早于北宋初年即定居安海。这一族在建炎以前，据《安海志·选举》统计中了二十名进士，这是安海文化已有基础的标志。以上各条史料，证明安海在建炎以前，也即在“二朱过化”之前，已经出现了经济、文化、宗教、古建筑等方面的人物及事迹了。又如高惠连，不但文化程度为进士出身，且任泉州本籍的太守，最后官居尚书。他的大女儿高良嫁给吕惠卿，吕是北宋宰相王安石的著名助手，可见安海绅士于北宋初在朝的势力。

①蔡兼，《西山杂志》手稿本。

②乾隆《泉州府志》卷六。

③《安海志》卷廿五《鳌海安氏族谱》。

建炎以后，安海建立石井镇，派官驻守。朱熹的父亲朱松是首任镇监。其后朱熹过往安海，访父遗事。二朱均为宋代理学名家，对安海文化之促进，厥功甚大。南宋嘉定间安海建“二朱先生祠”，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古迹。在朱熹之后，安海文化迅速发展，历宋、明等朝代，约近五百年，表现如下三个方面：

（一）倡导教育，学术研究之风大起。二朱先生祠又名鳌头精舍，以后成为石井书院，如州县学之制。一个小镇建立一所具有州县学规模的书院，实属少见，其学风之盛可知。儒学《五经》中以《易》最难，是儒家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泉州人研究《易》的风气在朱熹而后，一向极盛，明成化间蔡清精于《易》，清雍正间皇帝把他入祀孔子庙庭。泉州人有易学著作者计八十九个，而据王四达同志就《福建通志·艺文志》统计明代得六十九人，占77%以上。安海儒生多学《易》，万历间解元进士黄志清就著有《易说》。今据《安海志》卷二十三统计，自明景泰元年（1450年）至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274年间，安海共中115个举人，内中注明学《易》者59人，占67.9%。譬如王慎中，人们只知他是明代和唐顺之齐名的大文学家，却不知他同时还是一个“易学家”，他是蔡清的得意门生易时中的学生。蔡清曾称赞易时中说：“晚年得此士，吾《易》不孤矣”。而“慎中受学于易时中，一见避席曰，不当在第子之列也。”<sup>①</sup>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明抄本《虚斋看河图洛书说》一卷，署名“晋江蔡清著，后学同邑王慎中正、门生易时中刊”，证实慎中对易学之深研。

至于安海直接受朱熹教化的人，有史实可查者为高禾（高惠连的裔孙）。《乾隆晋江县志》卷九载：“高禾，字永叔。伯父

---

<sup>①</sup>乾隆《晋江县志》卷九。

俾先第，父侂与叔似复联第，宋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米倅临漳，朱文公时馆府第，禾执子侄门弟子礼，卑以恭，文公深器之”。这一段话《安海志》未引及，可供增补。安海先辈重视教育建立书院，重视理论研究，研《易》成风，这些传统，今天必须发扬。

（二）安海人藏书甚富，尤以黄居中、黄虞稷的“千顷堂”，是我国明末清初有名的私人图书馆。

安海金墩黄氏一族，明代科名甚盛。自黄铸中了嘉靖丁未（1547年）进士之后，黄伯善、黄宪清、黄汝良、黄居中等相继登科，特别是汝良于万历丙戌（1586年）中会试第二名，官至礼部尚书。《乾隆晋江县志》卷九称：“汝良历仕几五十年，职列清班，凡关宗社大计，知无不言。忠君爱国之诚，始终不替”，评价很高。这一族所以有贤人，当然原因诸多，但家藏万卷书，提供子孙有博览群书的机会，我想应该是很起作用的。

我先引一段史料概述明代泉州的藏书情况，据明末藏书家丁雄飞说：“十三岁随先君（其父丁明登，江宁府江浦县人，进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任泉州府通判）宦温陵，固文藪也。虽闭署中，先君子日搜典籍，余得肆意披阅，灯烬鸡鸣，率以为常。凡手录者、童子录者，虽未等身，然已盈箬。十九岁自温陵返，……今复得黄子俞邵，海鹤先生次郎也。先生文坛伊吕，藏书甲金陵”。<sup>①</sup>南京人到泉州这个“文章渊藪”来抄书，可推想当时泉州民间藏书之富。

金墩黄氏世代积书，到黄居中（号海鹤）手里，《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二称他“迁南京国子监丞，遂家金陵。后迁黄平知

<sup>①</sup>丁雄飞：《古欢社约》，《檀几丛书》二集卷三十一。



州，博通经籍，工书法，为诗秀骨玲珑，老气无敌，藏书至六万余卷”。其子黄虞稷“字俞邵，上元人，本籍晋江，七岁能诗，以诸生举鸿博，遭母丧不与试。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修《明史》，又修《一统志》，皆与姜宸英同。家富藏书，著《千顷堂书目》，为《明史》艺文志所本”。<sup>①</sup>虞稷承其父遗书，再加扩展，藏书至八万余卷，与丁雄飞等结“古欢社”校刻诸书。他是大学问家又兼大藏书家，《千顷堂书目》一书在我国目录学上很有地位。《辞源》子 379 页称：“千顷堂，明季福建晋江县黄居中藏书堂名。居中侨寓金陵，锐志藏书，子虞稷克承其志，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本之”。又新编《辞海》“十部”《千顷堂书目》条说：“清初黄虞稷撰，三十二卷。收录明代著作较全，著者多注简历，为考查明代典籍的重要目史，《明史·艺文志》即以此为根据。每类末附宋辽金元人著作，以补前史之缺。”新编《安海志》卷廿七附乡贤著作目录中漏列这本鼎鼎大名的《千顷堂书目》及黄居中的《千顷堂集》、《洗心文集·诗集》等书，应该补入，以光乡间文化。

重视知识必须重视书籍，安海的古人已明此理。现在我们建设四化，开发安海经济，万勿忽视这个问题。目前泉州因钱废书，因钱废文，一下子经济富裕了，“满门终安豪富，寂寞吾里，曾无闻人”<sup>②</sup>的情况，希望不要存在。

（三）安海的人才辈出，南宋至明末，安海人才很多，《安海志》已备述，我只归纳出几点看法。

首先，谈安海人才的延续性：从举人的科目看，起自嘉靖廿八年（1549年）至明朝覆亡的一百年间，安海的举人除脱掉四科

<sup>①</sup>《清史稿》卷四十四。

<sup>②</sup>林蕴：《泉山铭》。

无人外，其他都连科中举，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这一科安海更中了五名，这和清末道光元年（1821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前的八十多年间，安海只中了四个举人的衰落情况相比，简直不可想象。世科也是人才延续性的表现，高俸一家在南宋世科仍很盛，明代黄铸、黄伯善、王慎中等家更盛，黄汝良、王慎中还是全国性的大人物。

其次，谈安海人才的广泛性：文有王慎中，武有郑成功。鼎甲有南宋榜眼石起宗，会魁有明代黄汝良，解元有黄志清、蔡高标、郑怀咳，名师有明代理学家蔡清的业师庄概，学者有黄虞稷，明代安平华侨有李寓西、陈斗岩，富商有曾友泉等。从事商业活动能卓有所成的，也是人才，李光缙称曾友泉“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强能有所守”。<sup>①</sup>这种才能正是今天我们建设四化所需要的。建议《安海志》的人物传可增《名侨》与《货殖》二编，以资发扬。

大凡一个人文鼎盛的地方，有著名的好人，也必有出名的坏蛋，这点过去方志常忽而不谈，历代泉州出了大量好人，也有不少坏人，忠奸对比，是非分明，对人们才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作用。安海人在明代也是忠奸并有的，黄汝良“忠君爱国之诚始终不替”，而灵水人吴淳夫则是魏忠贤手下的“五虎”之一，拜魏为义子。趋承拍马，陷害好人，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二《垂诫》称他：“万历丙午（1606年）举人，庚戌（1610年）进士，授余姚知县。天启初历官陕西佾事，以京察罢。五年（1625年）夤缘起武库郎中，调职方。与倪文焕……并由崔呈秀进为忠贤义子。……冒功擢右都御史。……

<sup>①</sup>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八《祭曾友泉文》。

岁中六迁，骤至极品，庄烈帝即位罢归。寻为言者所劾，逮治论死”。查淳夫出身灵水世家，其叔吴从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官至浙江参政。《泉州府志》称他“其居乡不念旧憾，中怀耿介，不稍诡随，人敬惮之”。从宪是个忠厚长者，不料淳夫竟成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的坏蛋。安海还有郑芝龙，此人也是朝秦暮楚，以致杀身灭家。但其子郑成功却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人才有忠有奸，主要是本人的志向素养，乡间出了坏人，垂戒后世，可起教育作用，也不全是坏事。人文不盛之地，大好人出不了，大坏人也出不了。

第三谈安海人的阅历：一个人如果株守家园，没有周游四方，眼光短浅，难成为人才。安海是海滨港口，商业贸易遍及国内外。读书人既发迹，游宦各地，如黄居中更移家南京。商人“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sup>①</sup>“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蓄，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sup>②</sup>这种阅历是安海出人才的原因之一。郑成功假如少年时没有到南京入太学，以后恐亦不一定成为文武双全的英雄。其他大商人也必须有点文化，不凭愚昧发财。

所以，南宋至清初是安海文化的高峰时代，“二朱过化”起了重大作用。清初以后，安海受兵灾破坏，受禁海限制，经济衰落。鸦片战争后，厦门兴起，安海只成为厦门的附属港，于是文化就大不如前了。但是安海人有进取心，有眼光，至今仍然如

---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四。

②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十二。

此。北宋高惠连虽不是一位好官，可是他在一千年前能择地安海，聚族而居，至今子孙鼎盛，不能不说他在这一点上是有阅历有远见的。

巨型建筑林立也是安海文化的特点，以安平桥的建造为例，这一座跨海大石桥是安海宋代经济文化科技发达的集中表现，据赵令衿《石井镇安平桥记》说，这个桥“即石于山，依村于麓，费缗钱二万有奇，而公私无扰”。长桥五里的造价巨大，筹资却“公私无扰”，其调集得宜，地方富庶，可想而知。对于“五里桥”我没有新见解。只是最近修桥挖出一个刻有“浯州屿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的石栏，我才领悟当时筹资出钱的人还包包括如“浯州屿颜达”这样非安海人，而筹资方式是分间劝募，有钱人可独造一间（两墩之间一段谓之一间），也可合造一间。

### 三 再谈安平商人

前年拜读傅衣凌先生《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后，我写了一篇《谈李光缙的重商倾向》，表达一些我对安平商人的粗浅看法。现在再对这问题补充几点意见。

欧洲在十五六世纪时，重商主义抬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我国在明代，论商贾皆称徽州，及至泉州何乔远提出“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sup>①</sup>把安平商人和徽商并论。徽州商人和安平商人虽同样是明代商人，徽商名气甚著，安平则鲜为人知，我认为，安平商人有其明显不同之特点：

<sup>①</sup>《镜山全集》卷四十八。

(一) 徽商的商业活动范围以国内为主，安平的商业活动则以外贸为主。这是两者的重大差别。

(二) 徽州的商业资本，与封建的关系密切，有相当一部分转为高利贷剥削，如开设典铺，或转为置田地，收地租。安平的商业资本，虽也不能摆脱和封建的关系，但“泉州山多田地瘠”，安平地少，转为置田买租的前景不大，且面临大海，历史上泉州是国际贸易港口，“每岁造舟通异域”，向外贸发展前景广阔。

(三) 安平商人资本积累的最终目的，在于进行海外贸易成为海商大贾，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资用”。<sup>①</sup>“始窥邑市，岁沽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继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珠玑、犀角、珊瑚、丝枲、果布之贾，转毂以千万数，赢得十之”。<sup>②</sup>“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sup>③</sup>“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sup>④</sup>先在本地做小生意，然后在国内做较大的生意，最后进行海外巨额贸易，经历小贾、中贾、大贾三个阶段，大商人都是外贸商人。

(四) 徽商与华侨毫无关系，安平商人则是华侨的前身，但他和清代以后的华侨也不同，明代安平商人是带了一定数额的资金或货物出国经商，后代的华侨则是空手出国，不带资本，靠劳力而成家。明代安平商人出国目的不是侨居，而是“冲风突浪，

①《闻书》卷四十五《风俗》。

②④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卷二。

③《镜山全集》卷五十二。

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去海外争利的。

（五）安平商人善于运用智力经商。安海不光是个商业市镇，同样也是文化市镇。不少儒士从商，如“赠光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赠公观万货，目量手程，无尺寸爽，货所入所多鲜鲜，不具酤簿，久皆心识，灼数如列眉。……遂称大贾，卒以致饶”。<sup>①</sup>又如曾友泉“乃其倾赏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sup>②</sup>李光缙还称赞安平商人李寓西说：“贾先敏也，知福智也”。<sup>③</sup>又以安平商人的活动概括出“大都贾之为道，其贯货郡国，可以览胜；其争时斗智，可以获赢；其什卑佰憚千役万仆，可以倾闾里；其本末文武智勇仁强，可以吐发胸中之奇。以故士君子不居朝，必游市肆”。把安平商人的运用智力经商，给予极高的评价。“争时斗智”至今还是决定能否致富的关键。

（六）安平妇女经商是封建社会中的独特现象。李光缙曾提到二个经商致富的安平妇女，一姓沈，李为其作寿序，引古证今，以古代的四川采矿致富的寡妇清和卓文君卖酒的典故，来颂扬这位经商发财的安平女商人。李说：“卓氏行迁，夫妻推辇；巴蜀妇清，擅科丹穴，岂不亦女中名流”。<sup>④</sup>一姓郑，李亦为其作寿序说：“吾平居尝怪太史公不列贞妇传，而但附巴蜀妇清于《货殖传》中。……一妇人能用财致富，遂有以名闻”。<sup>⑤</sup>

安平人的文风很盛，已见上节叙述，有文化的商人能“争时斗智”，很不简单，因为“安平人喜贾，少事诗书，挟重货浮海

---

①②③④⑤李光缙：《景骥集》卷十四、卷十八、卷二、卷四。

島外为业，巨姓子弟不免焉”。<sup>①</sup>智力经商至今仍有重大的启迪意义。妇女经商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迹象，学者不可不注意。

明代安平港是个与漳州月港齐名的私商外贸港口，“漳、泉滨海居民，鲜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渔乃其生业。往往多至越贩诸番，市易诸夷”。<sup>②</sup>安平商人冲破封建政府的禁海，发展海外贸易，取得很大的成果。然而清代以后，徽州商人继续著名，而安平商人则突然消声无迹，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徽商经营的范围主要在国内，明朝换代，影响不大。徽商依附封建主义的程度比安平商人大，改朝换代仍是地主阶级统治，徽商靠山不变。而安平商人的商业活动以外贸为主，以私商为主，依附通海大姓，如安平明代私商的代表人物郑芝龙一家，就是由经济力量发展为政治力量。经历过明清鼎革，郑家的政治力量被清除，安平又频经战乱、迁界，商人的资本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第二，清王朝的闭关自守与禁海，较明代更严厉更残酷，安平商人被强制停止海上活动。正在此时，西方殖民者占据了东南亚海上贸易，安平商人既无祖国的支持，又无与殖民者竞争的能力了。

第三，清朝政府对“通番”严厉禁止，安平商人海上贸易被视为政治上的“造反”，再加上“重农抑商”的政策复活，安平商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缺乏出路了。

今天我们开放闽南金三角，安海港对厦门的辅翼作用应该重视，古为今鉴，但愿朝野有识诸公注意及之。

---

①《景璧集》卷十四《柯烈妇传》。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报取回吕宋囚商疏》。

我对安海史若干问题的小议，涉及设置、文化及经济三个方面，卑之无甚高论。书生之见，聊当野人献曝而已，幸大雅鉴谅。

## 明代的安海港

陈 自 强

宋元时期，安海港作为泉州港（后渚港）的主要辅助港而闻名。明代，泉州港已经衰落，而它却继续兴盛，作为独立的港口活跃于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历史舞台。

明代之安海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民间商人的“非法”贸易港，后期是郑芝龙海商集团所控制的官商贸易港。下面，就这两个阶段的情况略加探索。

### 一

从洪武年间直至隆庆间漳州月港的开设“洋市”之前，明政府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政策。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西欧航海势力的东来和以欧、亚、美为主体的国际航运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民间海外贸易还是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性潮流。虽然这是一种秘密的“非法”的海外贸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闽南地区，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达，特别是沿海人民自唐宋以来就有着“以海为产，以舟为田”的社会风俗，有着开展海外交通贸易的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因



此，闽南是当代民间秘密贸易最盛的地区之一。这在明代有关的文献中屡有提及。如：“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sup>①</sup>“漳泉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之条，尚犹相结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sup>②</sup>“迩来漳泉等处奸民，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日引月滋”。<sup>③</sup>“漳泉各澳之民，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势豪散姓人家，又从而把持之，以故羽翼众多，番船联络……”。<sup>④</sup>由此可见，漳泉民间海外贸易之盛。曾以“刺桐港”之称名扬中外的泉州港，已经不能适应“非法”海外贸易的特殊需要。反海禁的民间贸易必须选择官府控制力薄弱的港口作为其通商口岸。泉州港本是官定港口，且离府城很近，官府控制严厉，又没有什么岛屿、港湾作为走私船舶理想的停靠点，自然不适于海商的私贸活动。然而比起泉州港来，安海港却有三点有利走私贸易的地理因素：一是距郡之统制偏远，官府控制力相对薄弱。这一点，黄堪《海患呈》说得很清楚：“县治去远，刁豪便于为奸；政教末流，愚民易于梗化”；<sup>⑤</sup>二是安海港在围头湾内，利于商舶避风；而出海门，就是外海，利于海上贸私；三是离“番人之巢穴”的浯屿（金门）很近，便于私商与外商贸贩。这种地理因素比起泉州港更能适应当时民间海外交通贸易的需要，因此，安海港兴而未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也，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豪窝家之利，凡一乡防御之法。

①《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五十四。

②③④《明经世文编》卷二八〇、卷二八三。

⑤《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且不得施”。①“福宁州之桐山，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海沧，诏安之梅岭，皆沿海而居，负海而固，繁聚反侧，沦染骄咨，缓之则宁家，急之则下海，尾大不掉之势也”。②“泉州安海，向虽通番，犹有忌意，迩年番舶联翩而至，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倚”。③“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成奸盗渊藪……”。④据这些记载，不难想象当年安海港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安平商民，以地方豪右为后盾，以宗族为基础，结帮集伙，“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⑤迳往交趾、暹罗、吕宋、爪哇、日本等地，“虽文身赤发之国”也至。除安平商舶泛海贸易外，也常有外国商船到安海港附近海面停泊游戈，贩卖货物。胡宗宪曾称：“围头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风之门户也”。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船三十多艘到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商民云集于市”。⑥安海一带商贩竞相前往接济、贸易，络绎不绝，海滩成了市肆。

由于沿海商民的顽强斗争，也由于朝贡贸易的衰落和海禁弊病的日益显露，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局部开放海禁，于漳州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洋。此后，我国私商的海外交通贸易更加发展。“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⑦安海港欣欣向荣。但因为它非属开放港口，

①④《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二八三。

②朱纨：《暨余杂集》。

③《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⑤《暨余杂集》卷五。

⑥《安海志》卷十二黄堪：《海患呈》。

⑦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

因此，这时期安海港的海外贸易仍然带有走私的性质。

## 二

在反海禁的斗争中，东南沿海相继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海商武装集团。其中，除王直这类引倭入犯者外，多数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些海商武装集团中，势力之强盛，事业之兴隆，对我国海外交通贸易贡献之巨大，当首推明末的郑芝龙集团。

郑芝龙发迹之初，不过拥有船舶数十只，而到天启六年（1626年）已拥有120只，第二年激增到700多只，到崇祯元年（1628年）受抚之际，竟达1000多只，其崛起相当迅猛。受抚之后，郑氏由一个民间商人一变而成为官商。凭借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其海外贸易事业更加发达。他“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sup>①</sup>把安平港经营成为他的政治、军事大本营和海上交通贸易的基地。从此，安海港由一个“非法”的海外贸易港变为事实上合法的海外贸易港，一个官商港口。

郑芝龙海商武装集团的崛起和安海港成为郑氏的官商港口，这对当时我国海外交通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郑芝龙在受抚前，曾与荷兰有过商务关系。但在受抚后，他能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反击荷兰侵略者，两次取得重大胜利，迫使荷兰侵略者“不敢入闽境”。同一时期，他还消灭了与荷兰勾结的刘香等海上武装集团，“海氛顿熄”。这样，东南沿海的海外交通贸易又重新活跃起来了。郑芝龙的这一功绩应给予肯定。

---

<sup>①</sup>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郑氏规定：海船不得其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一税三千金”。这当然是一种海上霸主行径。但是，得其令旗者，却能在郑氏武装力量的庇护下，保证商旅之安全。因此，许多海商还是纷纷从安海港出洋。若以“每一舶税三千，岁入千万计”的记载来估算，每年从安平港扬帆的船舶（包括国内海运）约有三、四千艘之多，堪称“大江南北渡千帆”！这表明，在漳州月港衰落之后，在厦门港崛起之前，安海港成为了我国东南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港口，走向了它的全盛时代（1628年～1655年）。

凭借“海上之主”的地位，郑芝龙及其家族以安海港为基地，大力开展海外贸易。郑氏船舶常年川航日本、巴达维亚和东南亚各地；或以台湾、澳门为仲介，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人交易；日本又是郑氏最主要的贸易对象。郑氏开辟了由安平直抵日本长崎岛的航线，每年都有满载货物的郑氏船队由安平开往长崎。仅1641年夏季，就有22艘郑氏商船由安平直抵日本长崎，占此年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

经郑芝龙的经营，安平市镇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1640年，澳门贸易异常不振，“芝龙乃将广东、澳门之织工一百五十家族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业”。<sup>①</sup>这从侧面反映出安平的蒸蒸日上。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至福州降清。此后，安海港成为郑成功据海抗清的基地之一。郑成功在政治上与其父截然对立，在经济上则继承其父的事业。据日本长崎的荷兰商馆日记1649年7月17日条记：这天有一艘郑成功的商船“自安海入港……”，

---

<sup>①</sup>杨绪贤：《郑芝龙与荷兰之关系》，《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集》。

近日中属于同一船主的船只有三、四艘尚要到这里来”。<sup>①</sup> 顺治八年二月，郑成功攻克漳浦，声威大振，但器械未备，粮饷不足，参军冯澄世建议：可购日本物产，“以济吾用”，并贩于吕宋、暹罗、交趾等国，“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郑成功接受了这个建议，“令兄泰造大舡，洪相佐之”，更积极开展“海外贸易”。<sup>②</sup> 据外国文献记载，自1654年11月3日至1655年9月16日止，由各地开往长崎的中国商船计57艘，其中，“安海船四十一艘”，约占71%，“其中大部分系属于国姓爷的”。1655年3月间，“属于国姓爷的船只三十四艘，自中国沿岸开去各地贸易，内开：向巴达维亚去七艘，向东京去三艘，向暹罗去十艘，向广东去四艘，向马尼拉去一艘”。<sup>③</sup> 由此判断，这34艘驶往南洋的郑成功商船，当大多数由安海启航。据有的学者估算，17世纪50年代，郑成功对日本和对南洋的贸易总数每年各约七十多万两白银，即合计一百四十多万两白银。直至1655年，郑成功主要是以安海港为其贸易基地的。因此可以认为，50年代前期，郑氏的海外贸易总额主要属于安海港。若以占百分之六十计算，那么，五十年代前期，安海港的海外贸易总额每年约八十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其他私商在内。

1655年夏天，郑成功拟全师退驻厦门，金门，“将安平家资，尽移金门安顿”；第二年，清军屯驻安平，不久又实行海禁，安海港开始中衰了。

①曹永和：《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之研究》，《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集》。

②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③曹永和：前揭书。中国沿岸至各地贸易的船只数字，系安海至台湾的船只中有人向荷兰人透露的。

### 三

明代安海港之兴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安平商人。关于安平商人，傅衣凌教授曾撰文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这里，只想就安平港与安平商人的关系做点粗浅的探讨。

安平商人有两个基本特点：一多二善。

李光缙说：“安平之俗好行贾”。何乔远也说：“吾郡安平镇之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而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sup>①</sup>甚至巨室子弟，庠生儒者，也纷纷治贾。贾风之盛，堪与新安匹敌。与新安商人相比，安平商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即：新安商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国内，而安平商人的活动范围则主要是“入海而贸夷”。这就为安海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海外贸易的队伍。安平人不仅尚贾，而且善贾。李光缙在《钱峰洪公传》一文中说：“公治贾有三策：无财时作力，少有财时斗智，即饶则争时”。<sup>②</sup>在《处士陈斗岩公传》中也说陈斗岩“其初斗智，最后争时”。<sup>③</sup>“作力”、“斗智”、“争时”，是安平商人治贾之术。海外贸易活动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若不善贾，何能博取高额利润？若不能博取高额利润，海外贸易何能兴盛？正因为安平商人善于治贾，许多人在海外贸易中由“小贾”而“中贾”而“大贾”，这就极大地激发了更多的人泛海牟利，“浮海岛外为业”，使安海港得以持续繁荣。

海外交通贸易得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安平港腹地的物产不

①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四十八《寿颜母序》。

②③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

甚丰富，远远不能满足海外贸易的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有赖于商人发挥作用。安平商人善于集各地物产于安海港，以转输海外，并善于把“舶来品”销往国内市场，以刺激进口。他们把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把国内商业资本活动与海外贸易活动紧密而有机地沟通在一起，组成了一幅适应安海港海外交通贸易需要的庞大的商业活动网，开辟了众多的流通渠道，触角遍及东南西北，城镇山村，近如本省的同安、南安、惠安、永春、安溪、德化、漳州、长泰，远如两京、吴、越、齐、粤、豫、蜀、陕等地。让我们以《安海志·物类》所载，看看安海港几项主要出口商品之来源。

布帛类：除来自就近的晋江南乡及南安同安等县外，“滄屿布俱货（山东）临清”，“北镇布、青山布，皆出惠安北镇、青山”，“葛布出安溪、漳州、长泰、（河南）湖阳、（广东）高州等处”。安平妇女也善织缕，年产数千匹，然其原料系由安平商人或深入永春、德化等山城购苧，或远至河南、太仓、温州、台州等地购棉。

丝织类：“富家挟财本置棉葛等布，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等货，以往两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处发卖，仍置其地所出如丝棉、棉绮、羶布、靴袜等物”。

磁器：主要“自饶州来”，“白磁出德化”，也有来自漳州月港窑的。

其他物产也“多数由外埠贩运而来，不仅流通于市廛，且与胡贾互市，大宗贩运海内外”。这里就不必一一叙述了。

总之，论安海港不可忘却安平商人的功绩！

# 明代泉州安平商人论略

——读《景璧集》、《镜山全集》等书后札记

## 傅衣凌

40年代末，我为论述明代福建的海商，始知泉州的安平商人，亦是当时东南大贾之一，其势力足与徽州商人相匹敌。拙著《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一书，曾略述其梗概<sup>①</sup>。顾以文献不足，对于泉州安平商人的种种活动，所知甚浅。前岁赴美，读书于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在馆中获见泉人李光缙的《景璧集》和何乔远的《镜山全集》两书，爰节取其有关安平商人的部分记载，稍加排比，以补前著的缺漏。

### 一 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

明人论及当时中国的富商大贾，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称山西，而安平则少有人谈论之者。独何乔远云：

“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

<sup>①</sup>参考拙著：《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福建海商篇》第107～160页。



第徽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识别。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sup>①</sup>

按此节记事极为重要，它与何氏的另一著述：“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歛，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sup>②</sup>互相配合，是第一个提出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并以安平一镇的社会风习、人文职业与徽歛一郡有极相类似之处，为我们编写明代社会经济史提供有用的资料。

## 二 安平商人的活动地区与生业

过去我在论述安平商人时，每仅注意到他们与海上贸易的关系，而忽略其在国内贸易的地位；而《景璧集》与《镜山全集》记述他们的活动地区，不仅有海外市场，而国内市场亦关重要，两者皆有安平商人的踪迹。

“吾温陵里中家絃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sup>③</sup>

①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四十八《寿颜母序》。

②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五《风俗》。

③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柯公安平人也。或曰：非安平人也。安平人好贾，坐者列市肆，行者浮湖海，柯公非也尔。”①

“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畜，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②

上述记事已把安平商人的活动地区全面的揭示出来，其在海外市场中，吕宋贸易实居首位，故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吕宋之役，安平商人死者甚多。今列史料于下：

“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往岁夷酋发难，尽歼贾人，安平无一人得脱。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其几人称寡。”③

“柯烈妇颜姓，……既笄，归柯日蕃，柯与颜并里中著姓。安平人喜贾，少事诗书，挟重资，浮海岛外为业，巨姓子弟不免焉。是以吕宋癸卯九月四日之变，日蕃亦死夷中，……安平巷哭。”④

这一役对于福建海商打击甚大，“泉漳人贩吕宋者数万人，为所杀无遗。”⑤我又见到《海沧石塘谢氏家乘》亦载有漳州商人在这次大屠杀中牺牲⑥。

其实，安平商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仅限于吕宋，日本亦多。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十三《处士柯治宇先生传》。

②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十二《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③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二烈传》。

④同上引，《柯烈妇传》。

⑤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祥异》。

⑥《谢氏家乘》云：谢诚中生女名三娘，许配杨应钧，钧往吕宋，万历癸卯值吕宋之变，身殒异域（卷七）。

兹据李献璋氏的《妈祖研究》(?)曾引《南浦文集·与大明奕吾子书》(广长十六年,1611年)云:

“大明国福建道六泉州府有奕吾者,去岁随商舶来于此地,不幸而罹小疾,……终盖棺矣。有一人称其弟者欲取奕吾货物。旁有一人云:此是他姓人,诈称其弟,未知真贋。先是辛亥岁(十六年)安海人黄龙兴来此地,是我相识也。奕吾真子与黄龙兴俱共同来,令此货物,逐一与之,……其子亦勿疑吾言。伏乞昭察。癸丑(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可见安平商人在日本的活跃。

为什么安平商人在海外市场的活动,以吕宋、日本为较多呢?原来十六、十七世纪前后,中国生丝是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欧亚商人群视为利藪所在。自倭乱之后,中国对日本存有戒心,限制甚严,生丝市场遂移到吕宋岛上。这生丝市场,西班牙语称为 Arciria,华语顺日洞内或垵头。<sup>①</sup>于是安平商人遂通过生丝进行多角的贸易活动,他们从国内的江浙两省大量收购生丝,或自福建,或经广东,然后将它运到吕宋换取白银回国,并对日本进行间接的贸易,<sup>②</sup>故云:

“安平人喜贾,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sup>③</sup>

这样安平商人就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的结合起来,然后开展活动。

是以安平人的经商本领是很高强的,他们多是从小贾,进而为

---

①洞内亦称垵头,见石塘《谢氏家乘》卷八。

②徐光启云:若吕宋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二《海防迁说》)。

③李光缙:《景璧集》卷三《赠隐君擢吾陈先生寿序》。

中贾、大贾。下述三事，足以证明：

“沈孺人早岁归小楼公，是时小楼公方始产，积居转贩为业，始窥邑市，岁酤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孺人问有无焉，继行旁郡国，岁转穀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孺人问多寡焉，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珠玑、犀角、珊瑚、丝帛、果布之贾，转穀以千万数，赢得十之。孺人乃不问有无多寡焉，而一意以节缩佐之，素衣浣濯蓝缕如初。……史有孺人，两君兴于文，遂变史氏贾风。安平不讳贾，孺人不善之。”①

“处士（陈斗岩）甫垂髫，避乱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颜君道谋睹其状貌大奇之，遂许以季女。……多挈金钱财帛以异之，处士藉以运筹鼓策。……处士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或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士收息反倍之。处士行贾，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洋开，鬻财吕宋，转贩所至，人多重之，倚为祭酒。竟以致富，埒于内家，内家用是亦益饶。”②

“府君讳守吾……世居晋江安平镇之西安里，……蚤孤且贫，是以束身从贾，然具有信断而大之，以好行其德，不离于儒术，始客潮，……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遇为明达，常舍竞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之中，而终以大。”③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②同上引，卷十四《处士陈斗岩公传》。

③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七十《支里君墓志铭》。

### 三 安平商人的性格

上文已知明代安平商人在国内和海外的活动，都是十分活跃的。当然，这是和十六、十七世纪前后中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系的。在商人当中已出现一个倾向，具有自由商人的某些特征，他们已从物产的转运与包买，进而直接参加生产事业的活动，如所谓“江西陶人，浙直丝客”等是。安平商人尽管在明代社会里有其地位，可是在清代以后，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显见影响不大，特别是国内市场的活动，几乎消声匿迹，不在中国商业史上继续起着作用。为什么中国的商人资本经常处于中断、夭折的状态呢？为探究安平商人衰落的原因，我认为有必要从商业资本的內部剖析安平商人的性格。李光缙的《景璧集》有其族兄寓西作一寿序，颇能体现安平商人的性格，兹试节引如下：

“余家世治书，不喜贾，有之但坐窥市井，不喜行贾。兄伯自其王父由吾儒林徙安平，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少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羸薄货，用是致贖，时为下贾。已募南沃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致益饶为中贾。吕宋沃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太史公称单氏、宛孔、程郑之属，……通商贾之货，然未有浮海市东南夷者，安在其可凡兄伯也。或曰：若是则安平之市无凡夫矣。”<sup>①</sup>

根据这篇文章进行分析，他的兄弟不是出身于豪门贵族之家，而是以匹夫之身从小贾进而为中贾、上贾，且掌握海上贸易

<sup>①</sup>李光缙：《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

的大权，这和嘉靖时期沿海大姓独占海上贸易是一个大变化。<sup>①</sup>

“余笑曰：未易言也，古今使绝域，穷河源，无如张博望。……何如吾兄弟一匹夫，挟汉薄物，而岁取其王面钱以归也。当是之时，中国之人新与夷交，语言不通，嗜好不同，而译者用事，兄伯身所之夷，与语辄习之。见其国王，王以为异人，是以征贵贱，不复问译，而取信于兄伯，兄伯不之诒也，遂为雁行中祭酒大夫也。凌大海之波，泛条枝之窟，睹扶桑之上下，识鱼龙之变化，而能掉三寸舌，通华夷之情，行忠信于蛮貊，此亦魁然一奇大夫也。何必读书，而安在其凡兄伯为？”<sup>②</sup>

第一，欧洲中古后期的商人，以冒险远征为目的，有开辟新天地的宏愿，安平商人则刚刚相反，而以收为主，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点。

“或曰：贾若是非凡贾者亦多矣。余笑曰：不然，白圭教人为贾，若猛兽鸷鸟之发，非谓其能发也，能收也。安平人任发，兄伯取收，故居然可免其患。其初兄伯之吕宋，皆身自往。自檣使出，海上之税归之中官，兄伯策其必败，遂不复往。不数年，好事者言夷地多金，遣使侦之，夷人疑有它谋，遂屠戮中国贾人以数十万。令兄伯俱去，能独免乎？愚者溺已然，智者识将然。斗智争时先一市人，此余所以不凡吾兄伯也。”<sup>③</sup>

第二，中国商人有与官僚勾结的一面，亦有不勾结的另一面。这个不勾结，固能摆脱封建特权的纠缠，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凭藉，每易起落无常，不似徽、苏、山、陕大贾之以盐筴为本业，有其些政治奥援，故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维持其地位于不坠。

①朱纨的失脚，即被闽浙两省的大姓通番所诬陷而死。

②③李光缙：《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

“或曰：天下瑰才奇货，皆聚京师，若兄伯诚非凡，奈不入长安何？余笑曰：否否！人抱一奇一荚俱可入京师见天子，独贾人不可见天子，桑弘羊、孔仅贾人子也，一人而以心计言利，遂令县官与商贾争货，海内为之骚然，故不可也。往岁诸贾人辄相率至京师，所有翡翠、玉石、珠玑，外得之海上，内输之宫中，至空左藏之金与之市，大司农厌苦矣。兄伯以为开县官黷货之心，而办国家无名之费，非贾人事而不为也。故长安虽丽，未尝一至而问焉，此余所以不凡兄伯也。”<sup>①</sup>

第三，安平商人与乡族势力关系的密切，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性格。

“兄伯为人伉而爽，重信义，不侵然诺，好扶人之急，恤人之穷，居家以孝悌为先，其曾王父与余曾王父共穴而葬，兄伯出橐中金，修茔设蒸，倡诸族人，人以此重。兄伯气岳岳不肯人下，身侈于用度，所致万余金，多费之，不封殖其家资，至今不甚起。子长者修息，少者治书，令无失吾儒林之风云。或闻而谢曰：吾乃今知若兄伯矣。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蚤息断也，晓译奇也，不贪县官利义也，重祖重宗孝也，货殖可传，进于贾矣。”<sup>②</sup>

第五，安平人虽善服贾，据李光缙的话，他们还是农贾兼业，以农为本。就是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绊。

“余曰：唯唯否否，……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夫是道也，息可休宁，静可止遽，此兄伯所为寿也。”<sup>③</sup>

---

①②③同上页②。

他们多是农贾兼业，如曾友泉就是“用本守末”的人。

“友泉公自垂髫时，业已从兄伯贾闽广间，其后转赏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赵，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帛、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赏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sup>①</sup>

或则贾儒兼营，从儒入贾。

“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与江少卿从弟愧泉公共本赏。江公守市门列肆；赠公征贵贱于吴越间，鬻绢丝缙以归。赠公观万货，日量手程，无尺寸爽，货所入所多鲜鲜，不具酤簿，久皆心识，灼数如列眉，年少江公远甚，人倚祭酒，两人遂称大贾，卒以致饶。”<sup>②</sup>

由于这些商业经营和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是以明代泉州地区的土地集中极为激烈，这固和当时仕宦之多有关，<sup>③</sup>但亦反映商业资本的无出路，他们非购买土地，则把白银窖藏起来。近年闽南各地屡有发现窖藏的外国银币，即是此故。当然，上述情况并不代表全部的安平商人，但总可以看出一种倾向。

根据上述各项资料的分析，安平的商人资本，虽人数众多，也有积累，在国内外的商界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并没有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构成为中国封建长期迟滞的一个潜存因素。

---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八《祭曾友泉文》。

②同上引，卷十四《王母慈节史太孺人传》。

③“泉中宦旅繁多，每宦率植产七邑，每邑率以千顷”（支大纶，《支子政余》卷三“议处泉属事宜”）。明代泉州府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故称“七邑”。



安平一镇贾风甚盛，但它的存在，如嘉靖时，安平的筑城，①万历时，安平的设镇，②始终和封建官僚结不解之缘。安平人富有勇敢冒险的精神，能出入生死，往来于万顷波涛之中，却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笼罩着温情脉脉的乡族纽带，不象欧洲中古后期的意大利城市、日本德川时代的堺市商人所拥有那么独立的政治地位，这亦是中国人既早熟又未成熟的一个现象。最后，提到安平商人的衰落，我们还要记起马克思的话，那就是清代的锁国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毫无疑问，17世纪末叶在对华贸易上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由于这些考虑，当时除了经由一个距离北京及产茶区极为遥远的城市——广州之外，外国人被禁止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往来，外国人的商务也被限定与行商交往，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借以避免其余的人民与可憎的异域人发生任何联系。”③

为着对贸易仅限广州一口的缘故，公行制度的建立，垄断了国外商品的收购与贩卖，这就使安平商人在国内市场失却活动的

①安平旧无城，与乡绅柯实卿经营，新筑深沪、乌得二巡司（乾隆《泉州府志》卷三十一《卢仲佃传》）。

②殷光彦……万历三十五年左右迁泉州府通判，值安平新设镇，移驻于斯。是时疆理方殷，庶务草创。……镇去郡稍远，邪侠恶少，博塞呼卢，探丸击剑，恣睢莫何，光彦摘其尤桀黠者重惩之，诸风渐息。镇素负殷富名，奸人虎视，始而鸡狗窃关，继且菑苻思逞，为慎管钥，严街鼓，明保伍，伤游徼，于是夜虎不吠，闾阎安堵”（《泉州府志》卷三十《名宦》）。

③《马克思论中国》第28~29页。

地盘，而仅以移民的方式留居海外各地，成为近代华侨的原始。

（附记：以上所用资料，均承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盖氏先生代为复制，谨此志谢。）

#### 四 《遵岩文集》读后

余读王慎中《遵岩文集》，又见有安平商人资料数则。王慎中为安平人，生于嘉靖、万历期间，略早于李、何而氏。其中《易直王处士墓志铭》及《陈启文墓志铭》两篇，记述两人商贾行状，既体现安平商人之性格，又透露了明代官吏扰商之横暴。

##### 《易直王处士墓志铭》

“王氏为安平右门，所从事久矣。易直翁，……父信斋公，以贾客死吴中，尽亡其金，环堵萧然，兄弟二人与二母相依为命，备尝艰厄。稍长，即自奋曰：‘不可当吾身而废先人之业。’茹粗衣恶，弃掇残，卒能移缩就余，以寡为多，贾行吴中，寻父故游处，以不泯其志。翁所挟资于诸贾中为最下，……然……诸贾……推翁以为能，王贾之名在吴中颇盛，然赏不大进。最后，倾赏怀珍货买巨舶，浮海棹。值东瓯乱，以济明州。将赴临安，为逻卒所邀，赏没之至。然翁所怀货，皆非令所禁，逻卒为暴勒没之耳。”

##### 《陈启文墓志铭》

“安平于晋江为望里，里之望姓可屈指者不数家，东，积庆坊

之陈，其一姓也。……翁（启文）量用所入以为出，久之有余，以其余贖附宗人之敏者，鬻迁于外，日滋月长，翁不疑附者，附者亦为翁尽。里人共贖行货，多以凶终，翁独善终。”

## 五 有关安平商人资料

此外，惠安《龙山骆氏族谱》记有佃仆。乾育，于明万历年间投身安平商人，从事海上走私活动，出卖其弟而致富事：

“今骆乾育号安峰者，正黄来保之裔也。始无立锥之地，为桶匠治生。妻陈来定女。弟乾佐，娶贺庆福女。二姓皆白崎村郭、李之佃仆也，世代村落，五尺通晓。伊叔成贯，怜育无依，送跟安海商人为奴，颇得厚利，遂带货物往广，交接倭船，将弟乾佐为质，对银二千余两，约货填送。诨育见财忘义，弃弟不赎，被倭带去，经今未回，诈称身故，以此积奸致富，遂逞雄猜。”

近年又获见《莆阳磬溪氏宗谱》，其中有《金墩黄氏祠堂图记》，记述安平的地理形势及通商情景，颇有参考价值，并录于此。

“泉城以南，循五陵而下五十里为安平，宗金墩全盛时，万余家。其最著曰高、曰安、曰黄、曰叶、曰李五大姓而已。其地势则有三峰毫光，转东北十里许为六都，熊山迤邐而行为吕林、钱埔、曹店，自是而东曰坵坂，掩以内市浦边，障安平之左臂，由内市南行者为庄头，桂林以至东石，拒海门之东。其西曰许田，接而隶曾庄，拥安平之右臂。由曾庄直南为南安界，而之朴兜、水头、江崎，以石井拒海门之西，则是东石、石井之处，实安平之二巨贖也。其水则自晋江趋东南隅入于海，南归于石井

江自海门而入海，以通天下之商舶，而南安诸水，则自九溪东折于大瀛溪，入溪尾水头而注于海，共晋江诸水，大会于海门，此则安平外局之形势也。

又自曹店而下龙山寺分为三支。一支举埕埔连皇恩而尽于东洋；一支起颜家埕埔连西安而周于西畴；中一支乃安平鳌山之大都会也。其东西之水，东自埕坂、内市、浦边下汇为东埭，西自许田、西安下汇为西埭。二埭内灌田数千亩，外设二斗门，以浅水势，并会于安海港，朝宗于海焉。此则安平内局之形势也。旧传东西无埭，海水东入内市、浦边、庵前，西入于西安、曾埭，商舶亦至其乡，与居人互市，其屋宇鳞鳞于次，北接曹店，南接内市，故二乡有市店之名。至今乡人作井为灌注，往往得船缆蛎房及海树，则旧说信然矣。

又自中一支言之，由龙山南行为今北门外，转东北佑圣宫，乃三分其脉，东西为两脉，中为正脉。其东曰后库，田埭而尽于海，护正脉之左腹。西由鳌头、西柯、下坂坑，亦尽于海，包正脉之右腹。至于正脉则起山头，连于高家祠堂，突起一山曰鹦哥山，后高贵盛，山以用土而尽。由高而南为鳌尾塔、十字街，以跨于海。吾家居地，乃正脉之正。高尽处为都会之趋也，是以古今称贵盛者，必正脉高家尚书惠连之族，而黄氏则长者黄护之居，李为承务郎李钦之第，与夫所谓叶者，但居正脉。惟安连济居西安之水陆坊，而吾宗实据高黄之胜也。”

关于安平商人在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的地位，余拟别撰明清时代福建沿海商人与山区商人一文论之，以比较研究，进行科学分析。目前未能及此，姑志于此，以待来日。

# 明代的安平海商

林 仁 川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民间手工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明代的商业规模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超越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商人集团，如徽州商人、山西商人、洞庭商人等。然而这些商人集团主要从事国内贸易，而安平商人不仅兼营国内贸易，更以梯航海外而著称，他们冲风突浪，远贸日本、南洋各国，以博厚利，成为东南沿海的著名海商集团。本文拟就安平海商的兴衰及其特点作些初步的探讨。

## 一

安平镇位于泉州南边的围头澳内，入港处有石井、白沙两澳东西对峙，港内海面开阔，是天然的避风良港。陆路北达泉州、莆田、福州，西通永春、德化。海路“南由东石、石井直通金厦”，<sup>①</sup>是闽南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

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安平商人早在唐代就航行海外，贸易经商。经过宋元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明代，安平海商的贩海活动更为频繁，尤其是隆庆万历以后，安平人出海贸洋已达鼎盛时期，

---

<sup>①</sup>乾隆《晋江县志》卷十。

他们泛海扬帆，争利于世界各地，其势力足与徽州商人相匹敌。何乔远在《镜山全集》中写道：“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此外，在《泉州府志》中也留下许多关于安平海商的记载：“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①“民无所征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②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安平海商的活动十分活跃。

安平海商人数众多，不仅平民百姓出海经商，甚至文人学士也纷纷弃儒入贾，“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③杨乔“安平人，十岁通经史大义，会父及伯兄继歿，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辍儒之贾”。④文人学士的辍儒从贾，厕身于一向被视为末业之列，在明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他们已不再顾什么名节了，而是拼命追求发财致富，赚取更多的财币，这种变化，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安平商人不仅人数庞杂，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贸海活动，而且随着海商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开始从小贾逐渐发展成为中贾以至大贾。如李光缙的“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甚少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赏时致为下贾”，后来，他迁居南澳，“与夷人市”，因他，“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致益饶为中贾”，不久，“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

①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十二。

③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王母慈节史太儒人传》。

④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九《明笃行》。

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sup>①</sup>终于发展成为富商“上贾”。安平商人史小楼也走过同样的发家之路。开始经商时，他以“积居转贩为业，始窥邑市，岁货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贾行遍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最后，“四方郡国无所不至”，大规模地经营“珠玑、犀角、瑁玳、丝帛、果布之货，转毂千万数，赢得十之”，<sup>②</sup>成为著名的富商大贾。然而最能代表安平海商发展道路的应推郑氏海商集团，郑氏海商发迹于郑芝龙，中经郑成功及郑经两代人努力，终于形成财雄势大、显赫一时的海上贸易集团。

郑芝龙出身于安平海商之家，他的母舅黄程，“行贾香山沃”，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商人，郑芝龙年轻时就追随黄程到香山沃，参加一些海上贸易活动。天启三年，他又为黄程押送白糖、奇楠、麝香、鹿皮去日本。在日本，郑芝龙很快同大海商李旦结成亲密关系。李旦死后，大部分货财和部众都归于芝龙，变成郑氏海商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使郑氏成为初具规模的海商集团。特别是郑芝龙受抚以后，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逐一地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海商集团，“卷其资蓄”，“俟其众”，不仅再次扩大郑氏海商集团的规模，而且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从此以后，郑芝龙兄弟“雄踞海上”，“独有南海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sup>③</sup>到了郑成功时期，由于他大力经营商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使郑氏海商资本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仅1654年曾定老等“就伪国姓兄郑祚手内领出银二十五

---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

③林时对：《荷船丛谈》卷四。

万两，前往苏杭二州置办绫绸、湖丝、洋货，将货尽交伪姓讫”，<sup>①</sup>由此可见郑氏海商的资金相当可观。此外，郑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积累了一大笔海商资本。总之，到郑氏时代，安平海商的发展已达顶峰，其资本之雄厚，贸易范围之广阔，已超过任何商人集团。

为什么明代安平海商会得到较大的发展呢？首先，明代闽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安平海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明代，漳泉人民开垦荒地，围海造田，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粮食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普遍种植木棉、桑、麻、甘蔗、茶叶等。当时的棉花，“晋南二县山村，家家皆种”，甘蔗满山遍野。在农业发展基础上，手工业的发展也很快，如棉布的种类极多，“晋江之南乡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长四丈二尺为一匹，时布五百缕，上布七八百缕，细密坚致如青花布、斜文布、直径斜纬织方文斗，上皆出同安。”<sup>②</sup>此外，安平附近各县出产的苧布也很有名。“苧自永春、德化而来，绩缕成布，富家收买千万匹，北上临清货卖，名曰‘家机’。自福全出者名曰‘福全苧’，又有浣屿布，俱货临清。”<sup>③</sup>

安平附近清源山的制茶业也十分发达，据明《安海志》记载：“茶昔惟清源有之，郡人未之种也，后安海游于外习用之，于是饮者知求，卖者知植……，自是四方山寺争效种之，而卖者争趋安海矣。”<sup>④</sup>制糖技术也有所发展，明代中叶以前，“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以后，已会制作白沙糖及冰糖，而“冰糖、缩沙、牛皮糖皆白沙糖成之。”<sup>⑤</sup>明代德化及安平附近

---

①《明清史料》，《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

②③④⑤《安海志》卷十一，《物类》。



的晋江磁灶瓷器业更是以规模庞大，产品优良而著称。据近年发掘，古窑址比宋元时代，都有极大的增加，大量的陶瓷器成为明代出口的主要商品，远销欧、亚、非各地，被誉为“东方艺术”，视为珍璧。

其次，宋元以来泉州人民丰富的航海技术为安平海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较为先进的造船业，没有丰富的航海技术，要发展海外贸易是十分困难的。而在这方面，安平海商却十分有利。因自宋元以来泉州地区的造船业十分发展，已成为我国的造船基地之一。《太平寰宇记》把“海舶”列为泉州的土产，南宋谢履的《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漚，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海域。”<sup>①</sup>更是泉州造船业发达的真实写照，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民间造船业很发达。“漳、泉、福、兴化，凡海滨之民”，“自备财力”，“造舟船”，“兴贩牟利”。<sup>②</sup>泉州地区造的海船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指出“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攒叠而成，上平如衡，下则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sup>③</sup>元代泉州造船业继续发展，据到过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Ibn-Battutan)说：“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中者曰‘艘’，第三等者曰‘喀克姆’。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织成席状，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依其大小而名曰‘一半’、‘三之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百三十七。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一’、‘四之一’，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二埠。”

泉州地区人民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也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不仅能熟练地掌握了航道测量，海图编绘与运用，航海气象等技术，在惊涛骇浪的茫茫大海中，“鼓柁扬帆，截流横波”，“如走平原”。“而且还出现了如《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专门记载海外诸国情况和航海活动的专著。这些著作详细地介绍了海外各国的风俗习惯和物产，这就为安平海商了解海外市场的商情，组织销路对口的商品和收购各地的物产提供了信息。

第三，福建海港的变迁也对安平海商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昌盛，号称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商港——泉州港，由于宋代以来晋江流域两岸不断地发掘矿藏，开荒拓地，砍伐森林烧窑造瓷，使地表植被受到激烈的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致使泉州港日渐淤塞。另一方面泉州是官方朝贡贸易的港口，明初在此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与琉球的贸易事宜，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败，泉州作为贸易商港的作用已大大减少，特别是到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移驻福州，自此泉州港的一切海上贸易活动均遭禁止，这对泉州的私人海上贸易是十分不利的。

位于安海港之南的漳州月港虽然在隆万时极盛一时，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地方官吏的恣意妄为，船主、“主商”、商霸的盘剥索求，也使月港的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摧残。月港海商的税收是很繁重的，明政府规定“水饷，以船广狭为准，其饷出于船商”，“船阔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税银五两，一船该银八十两”，“二丈六尺以上阔船，每尺抽税银十两，每船二百六十两”。船阔每增加一尺，加抽税银五钱。贩东洋船每船照西洋船丈尺税则，量抽十分之七。对于铺商还要征收陆饷，以货多寡

计值征输，至于从吕宋回来的商船，“征水陆二饷外……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sup>①</sup>此外，地方官吏和奸商的敲诈勒索，更加重了海商的负担。在贪官污吏的残酷盘剥下，“茫茫大壑，真成苦海”，月港海商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特别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后，宦官高榘充当福建税使，对月港海商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榨取，使月港海商资本受到更大的破坏，有的商人“坐此破产”，许多商船“稍稍掉臂，不肯入澄”，而纷纷转移到安海港去。

从上可见，正当泉州港衰落，月港贸易受阻，厦门港又地旷人稀的情况下，安海港自然成为海上贸易的新港口，安平海商也就得到迅速的发展。

## 二

在明代的各著名商人集团中，徽州商人虽有一些人从事海外贸易，如王直、许二等，但其主要是偏重于国内贸易，而且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没有直接的联系。月港海商大力开展海外贸易，然而较少从事国内贸易。惟有安平海商既“梯航海外”，积极进行海外贸易，又“贾行遍郡国”，努力发展国内贸易，同时还把国内外贸易紧密联系起来，沟通海内外的经济交流。这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sup>①</sup>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安平海商在海外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凭海为市，扬帆海外，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足迹遍布东西二洋。如东洋的日本是安平海商的主要经商地点，据日本的《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安海商船经常出没于长崎港，从国内及世界各地运去大量的商品。如1641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就有安平海商郑芝龙的三艘货船开到日本长崎港，其中货物共有白生丝25700百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各种磁器2597件，以及水银、麝香、土茯苓、苏枋木、白腊、鹿皮等大量商品，<sup>①</sup>可见安平海商在日本的经商规模是相当大的。

与安海一水之隔的台湾，当时被荷兰殖民者占据，安平海商也经常到此地贸易。据《大员商馆日记》记载，1632年12月23日，有帆船一艘，满载盐鱼和鹿肉从大员驶向安海；26日又有帆船二艘，装载盐鱼、鹿肉和苏枋木向安海出发，因正午时自北方有强风吹来，该船被迫驶回大员。<sup>②</sup>

1637年安海与大员之间的贸易活动也很活跃，两地来往的商船明显增加。这一年3月1日，一艘帆船装载生丝及各种织物和糖从安海到达大员。7月1日又有一艘运载60人及大量白砂糖、水银和各种织物的帆船从安海驶向大员。9月9日有帆船一艘运载85人和白腊160担从安海到达大员。9月15日三艘帆船运载铜、铅、米等货物从大员返回安海。9月29日安平商船四艘运载大量瓷器及大米到大员。10月10日有帆船一艘运载大米100袋，小麦粉100袋从安海去大员。11月13日有帆船一艘运白生丝和丝绸从安海到大员。12月3日帆船一艘从大员到达安海。12月6日帆船一艘运载丝绸和水银从安海到达大员。12月13日又有帆船一艘从大员返回

<sup>①</sup>根据《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第一辑第50、52、55页表列数字统计。

<sup>②</sup>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

## 安海。①

1638年安海与大员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据统计，1638年从安海至大员的商船共有33船次，由大员返回安海的船有17船次，这一年两地来往商船达50船次。从安海运往大员的大宗商品是生丝、白砂糖、磁器和各种纺织物。由大员运入安海的主要商品是胡椒、鹿肉、鹿脯及日本银。②

南洋群岛更是安平海商活动的场所，他们在吕宋的贸易实居首位。“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③据顾炎武估计万历年间在吕宋的漳泉人已达数万之多，他说：“是时，漳、泉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印尼也是安平海商云集的一个据点，陈士謁于崇祯年间“商于咬囉吧（今巴达维亚）”，死后“葬其地”。安平海商颜嘉冕先后到顺塔洋（今爪哇西部）和旧港山（今苏门答腊岛南）一带经商。婆罗洲亦有安平海商活动的足迹，“陈三锡，字载胤，号伯昭，积厅公长子，生万历乙巳年（1605年）二月廿二日巳时。……远游大年赤子澳无归”。此外，印度支那半岛是他们经商的又一集中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均有安平海商从事商业活动。

安平海商在大力开展海外贸易的同时，还积极从事国内贸易，他们“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贾行遍郡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他们在经商活动。所以何乔远自豪地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尚，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

①②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

③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二烈传》。

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sup>①</sup>

安平海商在进行国内外贸易时，把从国外采回购来的“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等货”，源源不断地远往“南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处发卖”，然后在当地收购“其地所出如丝棉、锦绮、羶布、靴袜”等货品，经安平港输往国外。为了提高商品出口能力，他们甚至在安平建立出口加工业，把从各地采买回来的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再输往海外，如棉布，每年安平海商“有可射利者，从河南太仓温台等地有棉之处，岁买数千包”，在安平织成布匹，再远销“交趾、吕宋等异国货利”。<sup>②</sup>苧也是从“永春、德化而来，织缕成布”，再销售海外各国。

由于安平海商积极经营进出口贸易，使安平港成为明代后期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中外经济交流的中心，当时“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钱、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sup>③</sup>明《安海志》中记述：“凡人间之所有者，无所不有，是以一入市，俄顷皆备矣”，虽然这种说法不无夸张之词，但中外商品之丰富，安平市面之繁华，是无可怀疑的。

### 三

明代的安平海商十分活跃，在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到清代中叶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其原因何在呢？

（1）清初安平港附近的战乱和迁界使安平海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①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十二。

②《安海志》卷十一《物类》。

③《安海志》卷十二明黄琪：《海患呈》。

安平是郑氏海商的故乡，也是郑成功抗清的主要战场，从郑成功举起抗清义旗开始，至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撤出安平为止，清军与郑成功部队在此搏斗10多年之久，长期的战乱与兵争把繁荣的安平港变成废墟，使安平海商受到很大的打击。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廿四日，清兵攻陷福州，郑芝龙退驻安平，同年十一月郑芝龙受抚，带领随从500人到福州降清，不久，被贝勒挟而北上，郑成功闻报，“从浯州回安平会阁部路振飞、曾樱、万年英等，择日起兵誓师”，“用招讨大将军印”，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韩代奉贝勒世子命，统领满汉步骑，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不战而逃，携带家资，弃城出泊外海，清兵攻入安平，在城内大肆淫掠，成功回师救援，“韩代见船只塞海，亦不敢守，弃之回泉”，<sup>①</sup>这一次虽然清兵与郑成功军队没有正面交锋，但安平港已受到清兵很大的破坏。顺治十二年（1655年）四月郑鸿逵拆安平城墙的石料，修筑东石、大盈、前埔、龙安等要塞和白沙城，作为郑成功退驻金厦之前垒，安平城废。不久清贝勒世子罗托统领满汉官兵平海至闽，郑成功听从冯澄世的建议，全师暂退厦门，坚守各岛，“遂飞报与兄泰，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坠其镇城”，<sup>②</sup>使繁华的安平镇再次受到破坏。特别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政府实行迁界令，对安海的摧残更为严重，安海之寺观、官室、官廨、民居，扫数毁平，伍常在《清初迁界》的诗中写道“觉罗无计退雄师，下诏迁居策亦卑，州里田庐成赭土，哀鸿遍野叹流离”。<sup>③</sup>这就是迁界令对安平破坏的生动写照。

①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②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③《安海志》卷三十六《诗咏》。

(2) 安平海商本身的弱点，决定了他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成为近代的自由商人。

由于中国商人的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绊，因此，他们很容易将商业贸易所取得的利润用于购置田地房产，继续扩大封建的地租剥削，从而使已积累的资本重新流入封建经济的动脉之中，加强了封建经济的坚韧性。安平海商也不例外，如李光缙的族兄认为“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当他经商致富以后，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范围，增殖资本，反而购置土地，“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sup>①</sup>过着封建地主的优闲生活。在这方面郑氏海商更为明显，郑芝龙利用海上贸易积累的资本不仅在大陆各地购置土地，使郑氏的“田园遍闽广”，而且还“招集流民，倾家资市耕牛粟麦分给之，载往台湾，令其垦殖荒土，而收其赋”。<sup>②</sup>在他受抚后，又在福建各地“增置庄仓五百余所。”郑成功也认为“农业，民生大本”，在台湾大量购置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因此郑氏海商集团失败后，清政府在查抄郑氏家产时，发现“郑成功父子田产，在海上者，田有数万顷，价值数十万金”。<sup>③</sup>由此可见，郑氏海商的地产是相当巨大的。

有的安平海商受封建宗法思想影响十分严重，他们不仅购置土地，而且还热衷于举办种种“善举”，维护封建传统，加强宗族血缘关系，这对安平海商资本的积累也是不利的。如安平人陈

---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

②《鹿樵纪闻》卷上。

③《明清史料》第四本。



洁，“弃儒就贾”，家资万贯，嘉靖时，“倭蹂重以岁饥，戚属避乱相依者数十家”，他又解囊相助，“悉分资给之，经再岁不懈，有所亲陷贼索赎，捐数十金为营脱”；有一个邻居“客粤，母丧子不能治”，陈洁“倾囊助其殓”；甚至“求贷者多持卷来曰，无炊也，悉推惠之”。<sup>①</sup>

安平海商虽有儒入贾之风，但在封建宗法思想影响下，他们一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仍有不少人舍贾归儒，以求向缙绅转化。如“伍荣辰，字载宾，仗义慷慨，生平未尝欺人，人亦不忍欺之，贾于粤，有客误遗百金于其寓，越数日检得呼还之，其人愿割半以谢，笑曰：‘我欲得金，固不止半矣’，却之，自是诸商益加敬重。及子登贤，贻书趣归。归后，广置图书、经、史文籍，目览手披，老而不倦，优游二十年而卒”。<sup>②</sup>

（3）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和屠杀，使安平海商受到重大的挫伤。

15世纪，西欧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对贵重金属和香料等奢侈品的要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殖民国家纷纷向东方扩张，进行资本掠夺，他们抢占殖民地，在海上劫船夺货，对安平海商的发展威胁很大。如在吕宋，西班牙人对中国海商实行种种限制，规定：“每舶至，人只二百为率，毋溢额，所载回必倍，以四百毋，缩额”。<sup>③</sup>而且限定只能住在限定的“洞内”。特别是万历二十一年（1603年）九月及崇祯十二年十月（1639年）的两次屠杀更为残酷，“往岁夷酋发难，尽歼贾人，安平无一人得脱，讫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其几人称寡”。<sup>④</sup>据洪少禄

①②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明笃行》。

③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交易》。

④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二烈传》。

先生收集的 11 家族谱统计，安平海商被杀者有颜氏 7 人，黄氏 5 人，陈氏 9 人，柯氏 3 人。西班牙殖民者的虐待和屠杀，严重地打击了吕宋的安平海商，使原有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下去。

（4）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造船技术的提高，到清代以后，渡洋商船越造越大，航行于福建海面的海船“船身宽大，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sup>①</sup> 安平港的港口水浅，这种大船已无法入港了。而厦门港水深港阔，岛的西南边水深 20 余米，大型海船可不受潮汐的限制随时出入港口，因此，厦门港的地理位置及港口条件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以后，厦门港商贾云集，得到飞速的发展。据《厦门志》记载，当时的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叻、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随着厦门港的繁荣，厦门海商的不断发展壮大，福建的对外贸易中心已逐渐转向厦门了，原在明末清初曾经十分繁盛的安平港逐渐变得冷落衰败，明代称雄一世的安平海商也就销声匿迹了。

<sup>①</sup>周凱：《厦门志》卷五《船政》。

# 明代安海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蔡 尔 鸿

安海旧称安平，远自宋代，安海这地方就以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而闻名遐迩。近千年来，历经桑沧，安海一直保持经济与文化齐步并进的传统，赢得人们的推崇。本文仅就明代安海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进行初步探索，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 一 明代安海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尽管历代统治阶级采取“抑商”以维护“农本”的经济政策，但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市场货物的品类逐渐增多，商品交换的流通领域日益扩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一向被鄙视为“末业”的商人，人数倍增。他们的贸易活动，范围极其广泛，“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sup>①</sup>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很多繁荣的市镇，在滨江滨海和舟车交通方便的地区，数量尤多。据秦佩衍《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的资料，明初，全国有

---

<sup>①</sup>《李长卿集》卷十九。

大城市 33 座，明中叶以后，增至 57 座。此时南京北两极为繁荣。北京“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sup>①</sup>南京“北套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争赴”。<sup>②</sup>又如苏杭两市，也极繁盛，苏州自“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sup>③</sup>杭州“内外街巷绵亘数十里”，“车毂击，人肩摩”。<sup>④</sup>明代福建的商业也远较前发展，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各种经济作物产量增加，需要扩大销路，贩运往各地。“凡福之绉丝，漳之纱绢，泉之盐，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sup>⑤</sup>交换日益增多，漳州、泉州、福州等城市都比以前更加发展，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也更加发达，梯航万里，百货云集。此时的安海，也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它已成为泉南商品的集散地，“以贾为业”者，“十家而七”，“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其“贾风之盛”为邻近地区所难及。繁华的市镇，货物充盈，无所不有，酒楼茶馆，莺歌燕舞，都对达官贵人、豪绅地主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从附近的乡村迁居市镇。在福建沿海，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相应地出现不少繁华的市镇，安海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

商品经济不断地发展，市场的繁荣，使不少商人发财致富，这就不但吸引许多农民“弃本就末”，也吸引了一些十年寒窗，

①《五杂俎》卷三。

②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经》。

③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十四《遗事》（下）。

④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五。

⑤王世懋：《闽部疏》。

埋头功名的儒生，“舍儒就贾”，“窜身市籍”；即使缙绅士大夫之辈，也“多以货殖为急”，“闾阎之家，不憚为贾”。<sup>①</sup>甚至连著名的文人学士唐甄，居然“为乐于吴市”而不以为耻辱。社会舆论逐渐从历来的“农本商末”，改变为农商并重，视为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由瞧不起商人，逐渐改变为“商贾何鄙之有”，“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明显的提高，拥有大量财富的富商巨贾，已可以“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商人的经济收入增多，社会地位的改变，就要求提高文化生活。他们迫切要求日益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要求学习和传播经商处世的各种文化知识，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从商的人日益增多，商业资本日益发展，商品种类日益增加，商品产地不断扩展，商品流通领域日益广阔，商贾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出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商人们不但要掌握各地行情和各种买卖业务，辨别商品质量优劣；还要了解各地不同的计算标准，辨认会票、宝钞、银元的真伪以及它们之间的兑换比率。对于政府的各种政策法规，各地官衙的文书告示，也是非学不可的。此外，诸如对货物贩运里程远近，需经过几道关卡？陆运或水运合算？途中安全或险阻？如何办理路引、保结、纳税等等，都要有所熟悉。但这些有关商业经营兴衰不可少的常识，并非单纯依靠实践可以获得，而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为了满足商贾们学文化、增知识的需求，一系列与经商业务紧密相关的书籍如《士商必要》、《士商类要》、《古今经世格要》等书，<sup>②</sup>应运出版，畅销一时。诚然，知书识字，拥有知识，即可为商贾的远程贩运提供方便，又可为市场竞争提供“斗智”的条

---

①唐顺之：《荆川文集》卷十五。

②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第305页。

件。由此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文化事业也就会相应地发展起来。

在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如此密切的情况下，安海自然也不例外。安海的商人也要学习经商的一套本领，故在安海商人中，要求发展文化，要求提高文化知识者，大不乏人，也出现“儒贾兼之者”的商人。这种亦儒亦商的商人，他们的地位与以前的商人不同，他们要“遍交名士”，重视利用名士的学问，扩大自己的眼界，扩大自己的知识，他们重视文化的发展，这就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繁荣，经济作物日益增多，商品交换范围扩大，亦儒亦商的商人的出现，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无不都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就是明代安海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 二 明代安海是文物衣冠之所都

### ——明代安海的文化繁荣

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安海地区的经济也相应起了显著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安海文化也相应地不断发展起来，并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相当高的水平，安海已成“诗书冠绅一大邑”。<sup>①</sup>著名的福建史专家朱维干先生在《福建史稿》中说：“我们的沿海一带，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业航运和渔盐的发展，在文化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sup>②</sup>林希元在《安平城记》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四。

②《福建史稿》第75页。

中说：“泉南之安平镇，居民万户，其地滨海，山川风气之所钟，文物衣冠之所都，不特财宝之所聚而已也”。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促使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安海文化的繁荣，首先表现在重视教育的发展。乡人陈启文经商久之，有所赢余，即曰：“爱族姓莫若教学，乃自置视田、塾田各若干亩”。<sup>①</sup>海商颜理学对资助族人“读书登第”之事，特别慷慨，族有颜魁槐，幼孤无力就学，颜理学助之，“自白衣为诸生至南宫，一切经费，胥为取办”。<sup>②</sup>在学校校舍兴建方面，自宋代建立石井书院以后至明代，几经重修，都由乡人鸠资。此外，尚有王慎中居处，其匾曰：“汀南书舍”，后改为“简易堂”。<sup>③</sup>可见安海的文化教育是比较发达的。在书院中勤奋功读，进行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从小好读诗文是安海的良好学风。如陈启文“少略涉书知大义”，<sup>④</sup>王陞“少敏悟过人，读书已熟，久而不忘，尝潜投里塾受书”，因其母反对而辍学，“然好书终不厌，史传杂记，齐谐小说，泛览多识”。<sup>⑤</sup>又如藏书家黄虞稷，“七岁能诗，语出惊人”。<sup>⑥</sup>杨乔“十岁通经史大义”。<sup>⑦</sup>至于民族英雄郑成功少时就读于安海，已为人所共知。安海勤奋的学风，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仍在全国市镇享有声誉。闻名全国的养正中学，就培养了不少科技人才和体育人才。

---

①④⑤⑦同治《泉州府志》卷五十九《明笃行》。

②③⑥《安海志》第367页、243页、344页。

明代安海文化繁荣还表现在藏书之富，尤以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为著，是我国明代有名的私人图书馆。黄居中从小善读书，每得未见书，必亲自校录缮写，至老不倦。藏书“千顷斋”，<sup>①</sup>书达六万余卷。其子黄虞稷，扩至八万余卷。常与江左诸名士约经史之会，以资流览，借阅者无虚日。又如商人任荣辰“广置图书经史文籍，目览手披，老而不倦”。<sup>②</sup>安海区区一镇，也能广置图书，学风之盛，可不必赘述。

拥有八万余册藏书的黄虞稷，编纂了一本《千顷堂书目》，这是一本在目录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书。全书凡32卷，所载皆明一代之书，经部分11门，史部分18门，子部分12门，集部分8门，颇为赅备。《明史·艺文志》之目录基本上据此为蓝本，于今欲考明代人著作，当以此为据。《千顷堂书目》是明代安海文化方面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明代安海文化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

在浓厚的学风中，在藏书丰富的环境里，孕育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反映出安海的文化达到一定的高峰，除蜚声全国的郑成功、黄虞稷之外，尚有一位大文学家王慎中。王慎中少时就学于明代大理学蔡清的门生易时中，擅长散文，与唐顺之齐名，世称王唐，是明代八大文学家之一，王慎中虽以文学闻名，但在蔡清易学思想的教育下，也是一位易学家。著有《遵岩文集》，共1卷。《文集》词“似淡实腴，似平实奇，似浅实深，似疏实密，似丰实约”。<sup>③</sup>安海的人才辈出，还可从明代开科取士的数字略见一二。明代一朝，安海中进士33人，中武进士4人，中举人18

①②③《安海志》第341页、366页。



人，中武举人25人。又如万历四十年一科安海就中了5名。<sup>①</sup>

由于明代安海成为一个对外的贸易港口，与世界各地往来频繁，接触增多，安海的文化也受到外国的影响，文化生活也起了变化，增添了新的色彩，这又是明代安海文化繁荣之另一特色。如李寓西“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信于他氏”。从此可以看出，能夷言，已是一种对外通商的手段，“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之人”，<sup>②</sup>能夷言的通事，掌握外国语言文字，沟通了我国与诸夷的往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宗教信仰也起了变化。一向以佛教为主的中国，此时在沿海一带，也出现了一些外来的宗教。郑芝龙往澳门与葡人经商，不久就信奉天主教。《出岛兰馆日志》中1644年9月1日记载：“在入港的一官船中，发现华人天主教1名，经拷问，又陆续发现了8名，共9名，这些教徒又供出，在芝龙定居的安海，有位圣徒之家，并有举行礼拜和传教活动”。《长崎荷兰商馆日志》1644年9月28日条记载：荷兰外科医生在安平为郑芝龙母亲治病时，曾目击“官人一官家中，常举行弥撒及其他天主教之仪式”。再如距安海10余里处，元末建立了一座摩尼教庵堂“草庵”，信奉摩尼教的人，也颇有其人。摩尼教一住山弟子于明正统十年乙丑年九月十三日在庵旁石崖，镌刻了摩尼教咒语。所有这些，都是安海文化繁荣的组成部分。

明代安海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大兴文化建设。具有安海文化特征的五里桥，在明代就进行了两次大修，在桥中的水心亭也进行重修。亭碑记云：“凡东西肩者，步者竭蹶而不获一憩，

①《安海志》第269页。

②《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五。

有目击慈悲欲得首事之人而资之以修”，由此也可看出安海人民乐于行善的文化精神面貌，使过桥者能获得一憩。至于安海的古城池，到了嘉靖三十六年，知县卢仲佃将宋代建的土城改为石城；嘉靖四十五年，知府熊北潭又大修之，城始定固，城长1360丈，堞有三千多，门楼四，成为一座雄伟的石城；位于安海西桥头的白塔，在明万历三十四年间进行一次大修，并将原名“瑞光塔”易名曰“文明塔”。至于历史悠久的安海古刹龙山寺，“明天启间重修，书‘龙山宝地’勒石于山门”，<sup>①</sup>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在龙山寺一匾上也题了“通身手眼”四个字。总之，明代安海大兴土木，修建文物也是明代安海文化繁荣的一个侧面，使古老的文化市镇，更加焕发光彩。

### 三 明代安海文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明代安海文化发展的情况已如前述。在这人才辈出的文化古镇，社会经济方面也就起了重大变化。傅衣凌教授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安平一镇在明代经济史上实居特殊的地位”。下面就明代安海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稍加评述。

安海这个书香之地，自宋元以来，安海的文人，仍以朱熹理学为宗旨，“为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有的成为经学之儒，在较好的文化条件下，以他们所学的知识，从事商业活动，成为亦儒亦商的商人。他们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不具酤簿，久皆心识，数如列眉，……遂称大贾，卒以至饶”。<sup>②</sup>由于亦儒亦商的商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在商业活

①《安海志》第188页。

②李光缙：《景璧集》卷十四。

动中，就能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随机应变，善于智力经商，发挥他们的才能，卒成大贾。由此可见，有文化的商人较易致富，是一条经商之道。这条经商之道，诚可作为今日经商贸易之借鉴，没有相当的文化知识，是难以搞好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的。所以说，明代安海繁荣的文化，为明代安海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文化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当文化发展之后，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安海的商人，经受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活动，也具有不同于众的特色。李光缙评述安海商人时说：“大都贾之为道，其货贷郡国，可以览胜；其争时斗智，可以获赢”。<sup>①</sup>安海商人重视为商之道，然后可以按为商之道去经营，即可以览胜；安海商人展开斗智的竞争，就可以获赢。他们“览胜”、“获赢”的途径，就是充分发挥智能。他们备有“智勇仁强之才，可以吐发胸中之奇”，有“才”就能吐奇，就能掌握经营的规律，促进经济的发展。安海商人这种经商的经验，说明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化水平越高，知识面越广，才有可能推动经济昌盛发展。

既然安海商人的特点之一是“争时斗智”，那么智从何来？倒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大凡智者，即指人的智能。而智能的来源，并非天生而有的，人的智力发展，除了通过各种实践获得外，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学习，蓄聚知识，提高文化素质，从而使智能更加发展。安海文化的发达，为此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安海人从小就好学诗书，“治邹鲁家言”、“通史大义”，使智能不断发展，于是在经商时“善心计”，善于运用智能经商，成为善贾之商。安海商人还认识到单有书本知识不行，还必须

<sup>①</sup>李光缙：《景璧集》卷二。

参加商业实践，通过“游市肆”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使智能更加全面，这样就能在“争时斗智”的竞争中，隐操胜算。由此，又可看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郑芝龙父子及其家族，就是安海商贾善于“争时斗智”的典型，他们能成为安海的大财团，形成“八闽以郑氏为长城”<sup>①</sup>的局面，除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外，与他们的文化因素，能“争时斗智”也是紧密相关的。

工商业者生活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诱使越来越多的人外出从事工商业。犹如“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遁逃，以及后也，见流寓之胜于土著，故相扇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念故土”。<sup>②</sup>又如徽州之民“闭户而不出者，即群而笑之”。<sup>③</sup>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工商业者增多，他们文化水平较高，思想也就开放，不再怀念故土，由过去讥笑鄙视经商，转而“群笑闭户不出者”，苏松、徽歙之民如此，安海人民也是如此。安海商品经济发展后出现的文化繁荣，使人的意识观念改变，离乡远商，“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sup>④</sup>“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sup>⑤</sup>安海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

在中国海商与欧洲直接贸易方面，安海海商可说是先驱？而安海海商之所以能与夷人通贸，正是因为能掌握夷语。而“能夷言”，就是一种文化才能，要与夷人接触，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难以当“通事”的，就难以与“番商”通贸。由于安海文

---

①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第242页。

②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皇明文衡》。

③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第307页。

④《镜山全集》卷五十二。

⑤《镜山全集》卷五十八。

化的发展，能“夷言”，习“番字”，当“通事”，也就有利于与世界各国往来了。

在“通夷”的问题上，明末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封建势力的统治者顽固地主张海禁，代表商人利益的东林学派则反对海禁，他们利用自己文化方面的优势，“坚持公开讲学，运用学院讲学方式议论时政得失，虽经封建统治集团的推残压迫仍不屈不挠”，<sup>①</sup>迫使明王朝不得不“除贩夷之律”。东林学派利用讲学的形式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反对海禁，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由此可见，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是较易接受东林学派的经济思想，而促进经济更加发展的。明代安海在这种经济思想的影响下，通洋贸易，发展就更迅速。《温陵旧事》中记载“为岛夷之贩，安海镇最著”，在文化发达中成长的安海商人，敢于冲破海禁的束缚，大批出洋，与东西洋各国贸易，使安海港成为闽南一带最著名的海港之一，使安海港在明代出现鼎盛的局面。所有这一切，无不与文化发展，与文化思想的影响息息相关。我们从《安海志》的史料中，可以查到安海商人足迹遍及东西洋的记载，如陈斗岩鬻财吕宋，陈士勸商于咬啮吧（今巴达维亚），颜嘉冕到达顺塔洋（爪哇西部），陈之锡远游大年赤子谿（指今婆罗洲）。至于与日本的贸易，安海商人更是首屈一指。

于兹，明代安海文化繁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可略见一斑矣。

---

<sup>①</sup>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第395页

# 郑芝龙父子与安海港的盛衰

黄天柱 廖渊泉

安海港是宋元明时代泉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港湾深邃，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商人善贾，便于走私等优越条件，肇兴于宋代。因元末后渚港衰落，安海港便逐渐超越并取代它，繁荣于明中期。但受倭寇、海盗的骚扰，直到明末郑芝龙时代，它才走向极盛。郑芝龙降清后，因清郑战争和禁海迁界的破坏，安海港又走向衰落。安海港在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海上民间贸易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又充当了清初郑成功抗清驱荷复台的基地，它的盛衰和郑氏父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史学家傅衣凌教授在新编《安海志》的“序言”中指出：“安平一镇在明代经济史上实居于特殊的地位”，“开展安海地区的研究，将不仅是地方史的事情，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她还是带有国际性的”。本文拟就郑氏父子与安海港盛衰的关系作一初探，以就教于史学家们。

## 郑芝龙海商的兴起与安海港的极盛

郑芝龙（1604～1661年），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乡人，受明招抚后，置第于安平。他生于明末朝政腐败，人民揭竿时起，海寇猖獗扰乱，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殖民主义相继东侵的风雨飘摇之秋。先为武装海商，中受明廷招安，后又叛明投清。数十年

间，纵横海上，成为亦商亦盗亦官的海商，是促进安海港极盛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潜往粤东香山澳（澳门）寻母舅黄程”。他在当时是中外贸易中心的澳门，有机会接触各国海商，学会葡萄牙语和经商的本领。天启三年（1623年），郑芝龙押运黄程的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一批货物到日本，并与泉州旅日海商翁翌皇的日籍养女田川氏结婚，翌年生下郑成功。郑芝龙又先后结识早已往来台湾和日本的中国海商领袖泉州人李旦、漳州人颜思齐，并继承他们的大部分家财和部众，成为海上贸易集团头目。

明政府为防止日本倭寇和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严禁百姓入海和对外通商。因此，郑芝龙一伙只能采取私贩形式。他们为了防备官兵的袭击，抵御西方殖民者的劫掠，组织武装船队，称雄海上，川走于日本、台湾和大陆沿海各地贸易，所以明朝政府诬蔑他们是勾结外国的“海盗”。事实上郑芝龙并非明政府所说的“海盗”，他们足迹跋涉之处，“不攻城邑，不杀官吏”，<sup>①</sup>“但令取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sup>②</sup>他宣布纪律：“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米”。所以工科给事中颜继祖疏参俞咨臬文中曰：“郑芝龙生长泉州，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故官不扰‘盗’而扰民，民不畏‘贼’而畏官，‘贼’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

---

①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六十三《郑芝龙传》。

②曹履泰：《靖海纪略》卷一。

无虞，族属亲故，击楫相访，虚往皆得实归，恍若向现任官抽丰。偶或上岸买货讨水，则闾阎市里牵牛载酒，承筐束帛，惟恐后也”。<sup>①</sup>当然郑芝龙集团也有劫掠沿海商民，充实自己经济资本之事。

郑芝龙在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屡次派兵追剿，但腐朽的官兵均遭到失败。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郑芝龙“乘胜长驱……入中左所（厦门），官兵船器，化为乌有，全闽大为震动”。<sup>②</sup>腐朽的明政府既不承认郑芝龙海商的合法地位，又无力驱逐荷兰殖民者出台湾，就打算利用郑芝龙与荷兰角逐，镇压其他“海盗”，于是便对郑芝龙施行绥抚。崇禎元年（1628年）郑芝龙终于受抚，任“五虎游击将军”，后累功擢升为福建都督，尊号“太师”。

郑芝龙纵横海上为“盗”，同官军作战屡次大胜之后，都不穷追，希望朝廷招安。可见他“含有很大的政治动机，那就是用武力胁迫明王朝放弃海禁，开放贸易，让他们有生意可做”。

“芝龙骚扰闽粤沿海不仅代表着海商资本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荷兰殖民者的利益，在打破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上，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不论是对明王朝也好，对荷兰殖民者也好，都是尽可能加以利用控制，为海商资本的利益服务”。<sup>③</sup>郑芝龙为了扩大海上贸易权益，受招抚之后，就一一剪除其昔日海上武装商人的同伙。

郑芝龙未被招抚时，曾经把荷兰殖民者作为依靠力量，如天启四年（1624年）一月至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间，他当过荷

①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一。

②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之十三《郑芝龙传》。

③陈碧笙：《郑芝龙的一生》，《郑成功研究论丛》。



兰东印度公司的通事（译员），受到优厚的待遇。嗣后郑芝龙先后继承了李旦、颜思齐的大部分财产与部众，很快地成为海上贸易的一支主要力量，这自然会伤害到荷兰殖民者的利益。他们诉说：“船只都不能在中国海岸露面，一露面就要被一官（郑芝龙）截获”。<sup>①</sup>荷兰驻台第二任长官迪·韦特借明政府的承诺为由，于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拼凑所有在台战舰士兵，开往福建铜山岛（今东山县）去攻打郑芝龙，结果大败。荷兰人说：“战舰奥卫克号着火焚毁，艇上人员被掳到澳门”，“该海贼对我们前往进攻甚为愤怒，他拥有帆船千余艘，多方危害我们，他捕获了我方一艘大帆船，连同船员八十五人”。<sup>②</sup>郑芝龙受抚后，曾与荷兰签订沿海贸易协议。荷郑为了各自的海上贸易利益，自然会发生剧烈的竞争。崇祯七年（1633年）七月十三日，荷兰第四任驻台长官普特曼斯率领八艘战舰，偷袭在厦门的明朝水师船舰，郑芝龙的三十艘大战船也被摧毁。他决意报复，在不到二个月时间，便重新集结了各种火船、战船一百五十艘，会合闽粤两省水师，迅速发动反击，于九月初一日追及荷兰舰队，二十日大败荷兰舰队于金门料罗湾。荷方记载：“普特曼斯在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sup>③</sup>我方记载所获战果是：“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sup>④</sup>荷兰受到郑芝

①②甘为霖：《荷兰人占领下的台湾》之《彼得·讷茨给牛文莱律的信》，《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③马克劳德：《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卷二。

④邹维璠：《达观楼集》卷十八《奉剿红夷报捷疏》。

龙二次重创，只得与之重修旧好，“于1640年达成了关于海上航行和对日贸易的若干协议：郑方须将生丝及其他中国特产运到台湾，由荷兰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并每年给予信用贷款一百万佛兰梭萨金币，每月取回2.5%的利息，达三个月”。帕拉福克斯《鞑靼侵略中国史》说：“这个海盗（指郑芝龙）烧毁了八艘他们（荷兰）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们最后被迫向郑芝龙纳税，每年三万埃库斯（*ECUS*）。因此，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荷兰人向郑芝龙，而不是向北京派遣使节，给他种种荣誉，向他贡献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贡献了王杖一支，金冠一顶，企图来引起他自立为王的欲望”。<sup>①</sup>

郑芝龙扫清了海上障碍后，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活动，几乎垄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易，史称“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sup>②</sup>崇禎十四年至清顺治三年（1641~1646年），郑氏商船络绎不绝地川航于中国沿海、台湾、日本、吕宋、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都要在他的支配下，才能与中国进行贸易。他的武装商船，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sup>③</sup>

安海港是郑芝龙对外贸易的基地，郑芝龙海商贸易的发展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壮大，必然促进安海港的极盛。他以其烜赫的权柄和雄厚的资财，调动大批的人力、物力、兵力对安平镇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建设和保卫。他采取很多措施：首先继续修筑安海城

①陈碧笙：《郑芝龙的一生》，《郑成功研究论丛》。

②③林时对：《荷属丛谈》卷四。

池，《东南纪事》、《荷牒丛谈》、《台湾外纪》和《隆武遗事》均记载郑芝龙“筑城安平镇”，“开府其间”。他还在安海镇内大兴土木，建筑有“亭榭楼台，雕梁画栋，极尽豪华”的府第，其“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sup>①</sup>并兴建仓库和军营，“积财宝甲兵，充实其中，人物丽盛，专务丰殖”。<sup>②</sup>更重要的是，郑芝龙还整治安海港，在安海“开通海道，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sup>③</sup>崇祯十三年（1640年）澳门商贸很不景气，“郑芝龙乃将在广东、澳门之织工一百五十家族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业”。<sup>④</sup>这样，安海港在郑芝龙时代便“屹为东南巨镇，闾比闾联，万有余家”。<sup>⑤</sup>“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sup>⑥</sup>郑芝龙在与荷兰进行海上竞争之时，“不甘心对日贸易的利益为荷兰人所独占，除了部份船舶仍开往台湾外，开辟了一条由安海直通日本长崎的航线，把中国丝绸及其他物产运销日本”。<sup>⑦</sup>郑芝龙对家乡的商人也给予特殊的优惠和保护。明代安海商人的足迹能遍及国内外各地，海舶能畅通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主要是依赖郑芝龙的势力。史载：“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护，乃得畅行海上而无阻”。又说：“安平商人或倚其势，乃得航行无阻，使安海港成为私商贸海之口岸”。<sup>⑧</sup>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安海也就成为官私贸易的公开港口了，此时

---

①③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林时对：《荷牒丛谈》。

②邵廷采：《东南纪事》卷十一《郑芝龙传》。

④杨绪贤：《郑芝龙与荷兰之关系》，《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集》。

⑤《安海志》卷四《城池》。

⑥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⑦陈善笙：《郑芝龙的一生》，《郑成功研究论丛》。

⑧《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之安海成为“桥店初投南北客，港湾未断往来舟”<sup>①</sup>的水陆交通孔道，商人云集，贸易繁荣的港城，臻至极盛的黄金时代，为时达十八年（1628~1646年）之久。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看到清朝具备统治全国的势态后，于四月尽撤水军回安平。八月廿四日清兵陷福州，芝龙退驻安平时，“楼船尚有五、六百艘，战舰齐备，军容烜赫”。但他想到没有清朝的合作，要独占通洋之利是不可能的，又因在隆武朝个人权欲得不到满足，便不顾民族大义和长子郑成功的反对，在同邑人洪承畴的勾引下，于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同月，清贝勒世子罗托遣固山统满汉步骑突至安平，芝鹏、芝豹携眷弃城泊海外。十一月下旬，清兵入安平，大肆淫掠，自此安平的极盛时期也随着郑芝龙降清而告结束，转变成为郑成功抗清驱荷复台的基地和清郑的战场。

## 二 郑成功的抗清复台与安海港的关系

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郑芝龙派人到日本接回年已七岁的郑成功到安平，“延师肄业”，自此，郑成功就在安平哺养成长，并在这里播种了“忠君爱国”的思想，习读兵书，演练武艺。他耳闻目睹荷兰殖民者的狰狞面目和滔天罪行，且有所认识。所以安海是郑成功以后走向抗清复明，驱荷复台，成为精通韬略，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政治家的英雄的发轫之地。

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郑芝龙赴榕降清之后，郑成功在其叔郑鸿逵的支持下，“遂密带一旅，遁金门”。十二月郑成功

<sup>①</sup>《安海志》卷卅六《诗咏》。

闻隆武帝后凶信，设位令军民挂孝望北祭。继又突报其父被清贝勒挟而北上，他又从金门回到安平，并会见前明闽抚路振飞及曾樱、万年英等人，择日起兵誓师。以“招讨大将军”的旗号，出师勤王，把家中帑币犒师，召集洪政、陈辉、杨才、张进、郭泰、余宽、林习山、柯宸枢、杨朝、杜辉等在安海操练兵马，整飭船只，但为摆脱安海的孤立局面，扩大活动地盘，其船舰时而飘游于鼓浪屿，或入海澄，或出镇海卫，以观其变。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贝勒令韩代统满汉骑步兵突袭安海。郑芝豹、芝鹏不敢与战，“敛其众，挈家资、子女于巨舰，弃城泊外海”。成功生母翁氏“手持剑不肯去”，清兵一到，她“毅然拔剑剖肚而死”。成功闻报“縞素飞师前来”，“殮其母，修整城池，与芝豹、芝鹏等守之”。<sup>①</sup>八月间，成功以安海为根据地，与金门郑鸿逵合兵围攻泉州城，由于泉州城坚未易一下攻破，清军又扬言袭取安海，故鸿逵只得退兵。郑成功继续在安海招兵，据说，晋江县安海姓龚的、东石人姓蔡的、金门人姓洪的、营前入姓伍和姓洪的等许多造船工人和渔民，都投入郑成功的队伍，充当水师兵船的领航和舵工，郑成功家乡附近的御踏埔村，一村就有二十多人加入队伍。海澄甘辉，漳浦蓝登，晋江施琅、施显及邱缙、林壮猷、金裕等人都到安海投奔郑成功，他们“朝夕操演部队阵法，并令堆积粮餉于安平”。<sup>②</sup>

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日益发展，军威大振。为解决庞大的军需问题，他以安平为基地，在其父郑芝龙以往纵横海上通商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海外贸易。据《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志》1644年至1654

①②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三。

年条记载：“1649年郑成功船只自安海入港，载了白生丝5000斤，绢丝5000斤。1654年至1655年，各地开来的帆船57艘，安海就有41艘，大部分属于国姓爷的”。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接受冯澄世修书与日本通商，“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断，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的建议，日本国王“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烦、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安海志》也说：成功，沿郑芝龙当年海贸旧规，编组东西洋船队，挂“石井郑记”牌照，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及南洋各地以通贸，并按海山两路，设“五商十行”于各地：“五常商行”（仁、义、礼、智、信）设于厦门及附近诸港澳，集各地外贸货物运南洋各地；“五行商行”（金、木、水、火、土）于京都、苏、杭、津、鲁等地，购买各地土产货物，供“五常商行”货运出洋。故清廷虽欲困郑师，郑军却凭海外通贸之积累，以供北伐东征之军需。安海为郑氏举义首发之地，虽清兵几次骚扰，却仍为郑氏所控制，安海港亦成为集运各地土特货品及军需粮饷以济金厦义师之港口”。<sup>①</sup>所以郑成功说：“夫沿海地方，我所自生自殖也”。<sup>②</sup>可见安海是郑成功抗清的经济基地和军需仓库。

郑成功还利用安海的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与清廷谈判，争取时间发展抗清兵力与地盘。清廷看到郑成功以安平为抗清根据地后，势力日益壮大，攻城略地，清兵被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未能取胜于郑成功时，便要挟郑芝龙，屡次派人赍书到安海进行招抚活动。郑成功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便与清廷谈判周旋。最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②杨英：《先王实录》。

重要的一次是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九月间，郑成功与清方代表叶成格、阿山在安海谈判。清廷以封郑成功“海澄公”为条件，压成功先薙发，成功坚持不让，互争数日未定，叶、阿二人不辞而回泉州，谈判又告吹了。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总督李率泰遣官资书说降成功不果，清廷令贝勒世子罗托统领满、汉大军入闽，清郑之间的一场恶战将要来临。郑成功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命族兄郑泰“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坠其镇城”，撤出安海。郑成功自顺治三年（1646年）在安海首举抗清义旗，把安海作为基地已有十年之久。在战略上安海则是“崭然一镇好金汤，长与思明（厦门）相角犄”<sup>①</sup>的要地，它是郑成功在军事上、经济上最可依凭的抗清大本营。

郑成功从安海撤兵后，次年清兵占领安平，焚毁夷平安海镇，使安海成为一片废墟，作为独立外贸的繁荣昌盛的安海港，就此衰落下去了。

清廷受郑军的惨重打击，惊恐万状。为了禁绝郑成功与沿海人民的鱼水关系，扼死郑军，乃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接受郑军降将黄梧“禁海迁界”的毒计，“迁海边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立界石，发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皆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sup>②</sup>致使“各省千年生聚，一旦流离，死亡疾病，惨不可言”。<sup>③</sup>安海全镇被毁，成为废墟，仅存龙山寺。后人作诗叹曰：“觉罗无计退雄师，下诏迁居策亦卑。卅里

---

①《安海志》卷卅六《诗咏》，吕宗健诗：《哀王孙（郑成功）》。

②陈锡晃：《海上见闻》。

③夏琳：《海纪辑要》。

田庐成赭土，哀鸿遍野叹流离！”<sup>①</sup>这是对清廷弥天大罪的强烈控诉。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跨海东征。四月初四日攻下台湾赤嵌城，驱逐荷兰，改赤嵌为安平镇，建桔柣门，以志故土，从此隔海两个安平互相辉映，可见郑成功对哺育他成长并成其抗清复台大本营的安平，情感何其深厚！所以台湾初定时，郑成功驰令各处，收集沿海难民迁徙开发台湾。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施琅平台之后，安海才予复界重修。可是复界之初，人民也极其艰辛，“而西埭崩，闾谍无措，六年起科，照户追征，鞭扑官法如炉，赔纳骨髓已竭，西埭产米计六百石，俱是安海各姓物业，何户无累，何户忍赔，昔之迁界，只苦流离；今之复界，惨累身家，年复一年，其惨不知何所底也”！<sup>②</sup>

安海复界后虽有逐步恢复发展，但因清廷建海关于厦门，闽南海上贸易，转以厦门为中心。鸦片战争后，辟厦门为通商口岸，洋轮外商竞聚于鹭岛，安海离厦门航程短，航道安全，便成为厦门的转运港口。光绪年间，更有小火轮通厦门，原安溪、永春、南安、德化、大田皆由同安转厦，但“各商户遂向晋江之安海贸易，安海商业繁盛，而同安之商务日就凋零，今仅存十之一而已”。<sup>③</sup>安海虽然代替了同安的地位，成为“江流万里通金厦，船舶交通朝夕繁”<sup>④</sup>的可喜局面，但它已失去昔日盛况，而成为厦门的一个附属港口。

①④《安海志》卷卅六，伍常诗：《安平怀古》。

②《安海志》卷十《户籍》，陈梦弼：《安海清丈记》。

③《同安县志》卷六《城市志》。



## 安海港与郑芝龙集团

陈 支 平

17世纪，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阶段，封建专制统治也达到顶峰，就是这个时候，具有明显割据性质的郑芝龙集团，却雄踞于福建沿海达二十余年之久，决非偶然。它具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同时还有地理方面的因素。

郑氏集团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形成，首先因为他们是海商集团。自明代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已经逐渐摆脱了唐宋以来朝贡式贸易的束缚，向自由商人转化，所谓“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如今日之伙也”。<sup>①</sup>“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sup>②</sup>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自然促成沿海一带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即海商集团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这种局面又是与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封建自然经济不相容的，因此，明代前、中期，封建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扼杀沿海人民的自由海上贸易活动，从而激起了沿海人民的强烈反抗，许多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商民，组成了亦商亦盗的武装集团，与明朝封建政府的禁海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明中叶长达

①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②《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八九。

数十年的“倭寇之患”，正是明代前期禁海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明中叶封建政府与沿海海商集团较量的结果，一方面，嘉靖、隆庆间几乎所有著名的海商（盗）集团如王直、许二、李光头、吴平、曾一本等，都一一被封建政府镇压了。而另一方面，从隆庆年间始，封建政府也不得不有条件地放开海禁，承认沿海人民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某些合法化。这一事实说明了私人海上贸易，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日益重要，不容忽视，不容抹杀。它的发展，虽然险阻重重，终究要沿着它本来的方面艰难地前进。从这点上讲，郑氏集团无论是做为一个实力雄厚的海商集团，还是一个政治集团，都是明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产物，同时明中叶沿海商民不屈不挠的反海禁斗争，也为郑芝龙集团的崛起，起着了某种铺平道路的作用。

但仅有这一点，远不足以使郑芝龙形成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地方集团。郑芝龙初起时，其实力远不及明中叶的王直、许二等人，而郑芝龙的海盗行径，与王直等人大同小异，对于封建统治的威胁并未少减，那么为什么嘉隆间的王直诸集团都一一为封建政府所镇压，而郑芝龙独可称霸于福建呢？我们认为，至关重要是郑芝龙与王直等人各自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别。

王直等集团的勃起，是明代中后期的嘉靖隆庆时期，也是明代社会经济进入高潮的时期，如前所述，嘉隆间的海盗集团便是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这时的明王朝，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然有其日益腐朽的必然趋势，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但从整个中国的形势来看，各种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尚未达到全面爆发的局面。换言之，嘉隆时期的明王朝，还有一些力量来支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因此，当沿海商民奋起反抗禁海政策的时

候，封建政府竭尽全力加以镇压，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终于使轰烈一时的嘉隆时期的“海盗活动”，一一遭到了失败，并且失败的十分惨痛。

然而到了郑芝龙时代，政治环境就大不一样了，各种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激烈程度，腐朽的明王朝已经无力维持以往那种一统天下的局面。郑芝龙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式武装袭扰福建，而第二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西北地区便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各地农民相继而起。与此同时，辽东清兵对于北部边疆的压力日甚一日，东南沿海，又有西方殖民者的经常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四伏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郑芝龙海商集团的活动予以让步，终于在“崇禎元年戊辰（1628年）乃受抚于闽抚熊文灿，诏授防海游击，……因功由提督参将，累迁至三省总戎大将军”。<sup>①</sup>从而由海盗摇身一变而为显宦，为郑氏集团政治势力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有的论者认为郑芝龙由海盗受抚为贵宦，郑芝龙自身的百计求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综观明朝政府的招抚反抗者，纯粹只是一种最终镇压反抗者的权宜策略。嘉靖隆庆年间的许多著名海盗如王直等人，都曾经受过招抚，而正是这种虚假的招抚，分化瓦解了当时的海上武装，最后使王直等人一一死于非命。而唯独郑芝龙受抚之后，加官进爵，青云直上，这显然是王直和郑芝龙各自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芝龙自身的百计求抚，固然在促成招安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最关键的原因，乃是明末的封建统治者无力在军事上制服郑氏集团，于是给郑芝龙政治集团的形成造成了良机。对此，邵廷采在《东南纪事》

<sup>①</sup>《安海志》卷廿六《郑成功传·附父郑芝龙事略》。

中说出了一些道理：“时方征天下兵聚辽东，不能讨芝龙，用抚羁縻。芝龙复入海物奇珍，赂中贵人及福建省达官多为之言，授游击将军”。再加上郑芝龙善于策略上的运用，善于利用明室式微这一大好时机，笼络人心，扩大影响，“礼贤以下士，劫富而济贫，民都乐从之，不期年，聚众数万，舰千艘”。<sup>①</sup>“遇诸生则馈以器，遇贫民则给以钱，重赏以招接济，厚赈以饵间谍，使鬼通神，人人乐为之用”。<sup>②</sup>这样就使郑芝龙在福建沿海一带取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从而称霸于福建。

但是与郑芝龙同时代的其他海商集团，如颜思齐、李旦、刘香，白毛等，其发难之初，势力与影响均不在郑芝龙之下，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郑芝龙基本一致。那么为什么这些海商集团都先后失败，而独有郑芝龙脱颖而出雄踞于福建呢？其中原因当然有多方面，但我们认为，郑芝龙称雄一时的另一秘诀，在于郑芝龙踞有不可多得的重地——安海港，换言之，安海港地理条件的优越，是郑芝龙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只要看一下郑芝龙受抚后步步升官，却不愿到省垣府邑去耀武扬威，却偏偏坐镇于安海一隅，便可了解到安海港对于郑氏集团存亡的重要性。

明代福建泉州安海港对外贸易的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论及安海港，往往注重于它具有促进明代私商海上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地位，而忽视了安海港在促成郑芝龙集团的发展和壮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安海港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至少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

其一，安海港是郑芝龙集团坚固的军事屏障。安海港从军事

①《安海志》卷廿六《郑成功传·附父郑芝龙事略》。

②《明熹宗天启实录》天启七年八月癸丑条。

地理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优点是易守难攻，号为天险，《安海志》详记其形胜云：“（安海）南城西海，目穷处海门也。潮一日夜两次起落，潮退港底水尽，如船入，必乘潮头初动时即随潮而入，至波平方得到岸。去必潮大，平时即转船头，亦随汐渐出，汐尽得到海门，若稍缓则两头俱不得到，必须停流，盖港汊多曲湾，微不由道，必搁浅败船，此海寇不得到岸一也。石井、东百乃安海之二巨螯，两边到海，内宽外窄，春秋二汛，海上汛船如寐；收汛则捕盗船亦多，如寇一入，则兵船把汊口，盗船不能脱，此海盜不能到域二也。……东西二埭，水泽泥淖，东埭到东门以上，接皇恩坑；西埭到西门以上，接福埔坑，是皆易防守”。<sup>①</sup>正因为安海港具有易守难攻的天然之险，因此安海港在历史上虽有多次兵祸寇变，但竟然没有发生过一次是从海道攻进的。“海寇涎望者屡，但阻于港汊之险，难于兵舰之用耳”。<sup>②</sup>“自古海寇何止百千至，桀黠势大如温文进，岂曾不垂涎安海，亦不敢窥其门墙者，以此二险也”。<sup>③</sup>安海港的这一地理优势，对于郑芝龙集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郑芝龙集团首先是一个海商集团，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海上，郑芝龙占踞安海后，进可出海击敌，退可永保无虞，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其二，安海港又是孕育郑芝龙集团经济政治核心力量的坚实摇篮。郑芝龙集团无论是在受抚前或是在受抚后，他们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明朝封建政府，二是其他的海商（盗）集团。检讨明代中期王直诸人和明代后期刘香、杨六等人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政府的残酷镇压当然是王直等

①②《安海志》卷四《城池》。

③《安海志》卷四《城濠》。

海盗集团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但如果从海商集团自身上来寻找原因，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明代沿海各地海商的发展，固然是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还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及其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些与商品经济关系密切的海商集团，绝大部分是由农村转化而来，是由地主或农民转化而来。他们与农村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上几乎保留着农民阶级所有的局限性和缺点，狭隘思想严重，地域观念浓厚。福建沿海一带的宗法制度十分盛行，乡族势力十分强大，这也影响到当时的海商集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宗法制度。而受到乡族势力的控制和支持，族商、族盗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些因素，使得明代沿海的各个海商（盗）集团，具有极浓厚的排他性，虽然在与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团结起来，象中世纪的欧洲商人那样，同心协力向封建制度作斗争，为自己的生存和壮大争取应有的地位。而相反的是，在各个海商小集团之间，往往进行着永无休止的相互倾轧和残杀。嘉隆间沿海海盗的最终被镇压，封建政府就曾经利用了海商的这一致命弱点，造成了许多海商集团之间的残杀，最终达到了全部消灭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明代海商集团的生存，至少要做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与封建政府的镇压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得在海商（盗）内部的倾轧残杀中求得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自明中叶的海商集团起，在注重扩充本集团势力的同时，往往注重于可供本集团固守栖息的据点的建设，如徽浙海商王直等据有双屿、列屿，漳泉海商据有浯屿、南澳，而稍后的颜思齐、李旦等据有台湾、澎湖等。他们以这些地点为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但这些据点都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本来为乡族、地域性小集团提供蔽护场所的据点，却脱离了他们各自乡土的坚实依靠，这些据点大

多是远离大陆，僻处一隅的荒岛，有风涛之险，却孤立无援。因此，当封建政府竭力围剿时，纵然这些据点中兵精粮足，终难以长期坚持。当然，嘉隆年间，王直等海盗集团之所以把自己的据点设在荒岛之中，是因为封建政府不容他们在大陆有所栖身，但他们这些脱离了乡土依靠的据点，弱点是很明显的，这样也就不免归于失败了。

郑芝龙所占据的据点就大不一样了，从军事用途上看，如前所述，安海港的易守难攻，与王直等人所据的双屿、浯屿等，不差上下，而最关键的是，郑芝龙家族均为石井人，石井，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安海港的天然屏障二巨鳌之一，是构成古代安海港的整体之一。从这点上讲，我们说郑芝龙是安海人也未尝不可，（《安海志》历来将郑芝龙、郑成功列入乡人传中）。这些有利条件，就使安海港的天险与郑芝龙家族的乡族势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郑芝龙拥有安海港，又能得到本家族、本乡土势力的有力支援，真是如虎添翼。而郑芝龙集团的成员组成，也正是以郑氏家族为核心，以乡里人为骨干，然后向四周势力扩散，这种海商力量与地域势力、乡族势力牢固结合，无疑大大增强了郑芝龙集团的坚固性。

郑芝龙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对于郑氏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其意义是很重要的。明王朝统治衰微的政治环境，使郑芝龙跻身于封建统治集团，从而借助封建政权的力量，得心应手地消灭、吞并其他海商（盗）集团，“芝龙就抚后，即以剿平海上诸盗为己任，先后剿灭李魁奇、杨禄（杨六）、杨策（杨七）以及惠安刘香老诸股，后又击败侵扰厦门之荷夷”。<sup>①</sup>“同时又有

①《安海志》卷廿六《郑成功传》。

萧香、白毛等横行海上，俱为芝龙所灭”。<sup>①</sup>而另一方面郑芝龙又坚筑安平城，割据称霸，借助安海港的天险和福建的乡族势力，与明王朝中央政权保持一定的离心力，若离若就，从而维护自己的海商集团利益和横行闽粤沿海的独立性，这也正是郑芝龙升官进爵后仍龟缩于安海一隅的秘密所在，所谓“芝龙就抚后，……乃于安平置第开府筑城，开海道，海船直通卧内，亭榭楼台，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其守城兵饷自给，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遣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海舶往来，非郑令旗不与通行。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而至居奇为大贾，故八闽以郑为长城，称雄闽粤”。<sup>②</sup>郑芝龙集团利用封建政权势力和乡党族亲的力量垄断了海上贸易的权益，这固然是郑芝龙集团成功的秘诀，但这也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脆弱性，它对于封建政权和乡土势力有着相当严重的依赖性，这无疑又是最终得不到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芝龙集团惨淡经营安海港是为了与封建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的作用。郑芝龙本人以无赖出身，“少落魄”，虽后来官列上品，但他走的是一条“由盗而官”的道路，虽然显赫，然总归不太光彩。郑芝龙拥隆武时，与南下黄道周诸大臣不和，多少包含有藐视郑芝龙为草莽出身的意思在内。因此，郑芝龙在经营安海港时，除了重视军事上的设施外，也十分注重于其他封建性的建设，使安海城成为一座典型封建式的郑氏家院，郑芝龙的子弟们，便从小在这家院之内，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举其子

①乾隆《长泰县志》卷十二，《杂志》。

②《安海志》卷廿六，《郑成功传》。



郑成功为例：“郑成功……幼名福松，崇祯三年庚午自日本回国，居安平，改名森。时年七岁，延师课读，甚聪敏，性喜《春秋》兼受孙吴兵法。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章句特其余事耳。……十五岁补县学生员，二十一岁入南京太学，师钱谦益”。<sup>①</sup>这样就使郑芝龙的子弟们走上了正统的入仕道路，在短短的几年来，除了郑成功入太学外，郑芝龙之弟郑鸿逵中崇祯十三年庚辰科武进士。科举的纽带，把郑芝龙集团和封建政权的结合推进了一步，加强了本身的政治地位。这也体现了海商集团趋向封建性的这一弱点。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郑芝龙在安海城为了弟们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受教育条件，这对于郑成功的成长和后来的大有作为，是相当重要的。嘉靖隆庆间的许多海商集团，往往是父盗子寇，一脉相承，缺少有效的教育，结果纵有万贯家财，整天惶恐度日，兵戎相见，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最后不免与其父辈同归于尽。因此，这二者之间尤为不可同日而言。

郑芝龙集团虽然利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称雄于福建沿海一带，但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看，郑芝龙集团的这种带有割据性质的势力扩展，只能是在明王朝内外交困行将灭亡的这一特定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清王朝建立后，郑芝龙故伎重演，企图投靠新的封建统治者来确保本集团的利益。殊不知今非昔比，清王朝是在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锐气方盛，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岂容郑芝龙在福建独霸一方！结果郑芝龙被挟北上，并以身殉。郑芝龙的悲剧就在于未能认清形势，政治环境已经大大的变，却不能采取新的策略。而从清王朝一方来讲，马上得天下，

---

① 《安海志》卷廿六《郑成功传》。

未免目空一切，低估了郑氏集团这股地方势力的分量，结果郑成功承接了郑芝龙的家底，复以抗清复明为号召，与清政府做了数十年的坚决斗争，这显然又是清朝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 安海港的兴衰与华侨的关系

林 金 枝

安海及其附近地区过去和现在都是闽南的主要侨乡，华侨的发生与发展均与历史上的安海港的兴衰关系至大。本文拟从唐宋时期安海港的兴起与华侨的出现；明清时期安海港私商贸易的发展与华侨人数的增加，以及近代以来安海港华侨出国人数的激增及其对家乡的贡献等方面的叙述，来看安海港的兴衰与华侨的密切关系。

### 一 唐宋时期安海港的对外贸易 与华侨的产生

安海港是泉州港的一部分。唐代，泉州港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因此，当时就有泉州人因经商而梯航海外。从现有的史籍看，安海港的东石人林銮，于唐开元八年（720年）首航东南亚的渤泥（今加里曼丹岛）经商。这不但是安海港人，甚至是泉州港以至福建全省到东南亚经商有名可查的第一人。此

事见于《西山杂志》手稿本。<sup>①</sup>该书还记载有：“(唐)天宝中，王尧于渤泥运来木材为林銓造舟”。此后，延至一百五十年后，“唐乾符年间(875~879年)，林銓九世孙林灵字应来，经商航海台湾、甘棠、真腊诸国，建造百艘大船，在鹫江(指东石港)家资万贯”。由此可见，唐代中、后期，安海港的东石沃就有人出海经商，而使“沿海番家人俱从之往”，如此众多的人出海经商，必有留滞海外，而成为早期的华侨。

宋代的安海港，是泉州所属的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安海镇，府南六十里，古名湾海，宋初始改为安海，曰安海市。西曰新市，东曰旧市。海舶至，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sup>②</sup>据考查，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建市舶司的同时，州官即遣榷税吏于安海建立海关税卡。这在当时泉州的三湾十一港中(包括后渚港在内)，遣吏建卡的唯独只有安海港，可见当时安海港在对外贸易中地位的重要。

津卡的设立，市镇的繁荣，说明两宋时代的安海港对外贸易已非常发达。

根据文献记载，宋代的泉州华侨已分布在东南亚、朝鲜和日本一带。下面略举几个史实：

《莆田北洋西天尾祥应碑记》中记述了12世纪初年泉州有人往印度尼西亚经商的事实。碑云：“大观元年(1107年)，泉州纲首朱纺往三佛齐(今印尼旧港)……往往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藩者，未尝有是”。

1972年在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方墓碑，高38.5英寸，宽16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附文，蔡永兼《西山杂志》。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

英寸，厚4~4.5英寸，碑文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另应甲立”（按：景定甲子系1264年）。这是泉州判院蒲公死于文莱的实物资料，至“蒲公”是否华侨，难于断定，然其子应甲，为之立墓碑，可知当为华侨。

宋代时任过杭州地方官的苏轼说过：“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朝鲜）往来买卖”。<sup>①</sup>据朝鲜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记载，北宋时，前往朝鲜的“宋人”和“宋商人”不下百起，其中注明原籍是福建的有福州二起，闽人一起，泉州人十九起，有的一起就有上百人，如高显宗十年（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七月，“宋泉州人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方物”。

据日本文献记载：宋徽宗崇宁元年和四年（1102年和1105年）泉州商人二次到日本经商贸易，李充船舶的公凭，在日本史籍中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宋代市舶制度的珍贵资料。<sup>②</sup>

综上所述，唐宋时代，由于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达，安海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日益增多，並由此而出现流寓、定居或迁徙，因而在国外成为华侨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因此，我们可以说，至迟在宋代，安海港区就有华侨开始旅居国外。

## 二 明清时代安海港私商贸易的发展与 华侨出国人数的增加

从明初至鸦片战争前夕，是安海港华侨出国人数进一步增加的时期。

<sup>①</sup>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东坡集》。

<sup>②</sup>森克己：《日宋贸易的研究》，《朝野群载》卷二十。

明代初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海防，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勾结外国从东南亚沿海卷土重来，以及为了防止倭寇的骚扰，一反宋元的做法，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实行“片板不得入海”，<sup>①</sup>严禁海外贸易的政策。到了明成化十年（1474年）更将市舶司由泉州移至福州。因此，泉州港作为闽人出海经商和流寓东南亚出国港口的地位结束了。这对安海来说，虽带来一些影响，但冒险出海者还是不少。因为“海者，闽人之田也”。<sup>②</sup>明代中后期，安海港人民出海经商，侨乡族谱已有所记载。如安海《颜氏族谱》中载：该族族民颜嗣祥、颜嗣良、颜森器、颜森礼以及颜侃等五人，都是在成化、正德、嘉靖年间侨寓暹罗而死在该地的。<sup>③</sup>《陈氏族谱》也载有：陈朝汉于嘉靖庚子年（1540年）死于真腊国（今柬埔寨）。<sup>④</sup>

明代后期，随着东南沿海倭寇之平息和民间出海贸易要求不断高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关于部份开放海禁的奏请。海禁开放后，安海港的私商对外贸易不但日趋繁荣，且已晋升为泉州首要海港。万历《泉州府志》记载说：“晋江人文甲于诸邑，石湖安平番船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温陵旧事》也说：“吾温陵人文之盛，晋江一邑，与海内诸名邦相抗衡……民无所征，贵贱惟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从一些诗文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安海对外贸易之兴盛。如明黄伯义咏天妃庙诗有云：“港通海外昆仑舶”。<sup>⑤</sup>

关于明代安平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何乔远在《镜山全

①《明史》卷二〇五《朱纨列传》。

②傅元初：《请开洋禁论》。

③④《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转引《安海乡土史话》第一辑。

⑤《安海志》卷三十六《诗咏》。

集》中是这样评价的：“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sup>①</sup>他又在《闽书风俗》中进一步说：“安平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微歛，入海而贸夷，差强货用”。<sup>②</sup>可见徽人经商多在國內，安海商人则多对外贸易。

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安海港出海谋生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从安海地区一些族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代后期，安海港人民前往海外的地方，主要是在南洋（诸如菲律宾的吕宋、印尼的顺塔、旧港，暹罗，安南的占城以及柬埔寨）等地。

明代后期，福建人民随同贸易帆船出洋谋生，其主要去向是菲律宾。因为当时福建人民开辟了以漳州月港发船经台湾南部航至菲律宾的新航线，从而大大缩短了航程。同时，西班牙也于16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占领菲律宾中部和北部地区，他们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鼓励中国帆船到马尼拉通商和欢迎华人到马尼拉定居。据有关文献记载，从1571年起至16世纪末，开往菲律宾的中国船只从每年的三、四艘增为二、三十艘或三、四十艘不等，大批的福建劳动人民，如小商、失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随船赴菲律宾谋生。1571年在马尼拉定居的华侨只有150人，到17世纪，整个菲律宾华侨已激增至“数万人”，而且是“往往久居不返”。<sup>③</sup>当时，吕宋“数万人”华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份安海港人，其原因，正如《安海志·明贞烈陈英娘传》所记载：“安平多尚远商，不计华夷，吕宋较诸夷更近，取利捷便”。<sup>④</sup>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②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五《风俗》。

③《明史》三二三《吕宋传》。

④《安海志》卷三十三《节烈》。

除非律宾吕宋外，不少安海港区人民随同贸易航船到爪哇下港（万丹）咬啮吧（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以及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谋生。例如爪哇下港是16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国际贸易港。随着明代后期海禁的开放，“中华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约千余家”，<sup>①</sup>16世纪下半叶，安海霞亭东房颜一浑、颜鸿逵、颜嘉海、颜一澜和颜嘉蕴等人，都是前往爪哇经商而死在爪哇顺塔洋的。<sup>②</sup>据考证，顺塔即今爪哇西部地方。上述安海颜姓族人前往顺塔者，均出生于1531~1554年之间，假如每人以20岁前往爪哇，最迟又仅在1574年左右，实较荷兰人于1602年在爪哇设立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爪哇为早。

安海港人民和其他福建人之所以较多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去经商和谋生，是因为荷兰殖民者于1619年占据巴达维亚后，计划要把它建成“整个东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因而采取了与西班牙人类似的措施，诱惑或掳掠华人到巴城去贸易或开发工作。因此，17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有5艘帆船开往巴城和运去1000名中国移民。例如1622年有3艘中国商船从漳州开抵巴城。1625年由泉州开往巴城的一艘商船，其中除货物外，还有360人一起前往，他们“都是肩挑中国瓷器到处叫卖的小贩”，<sup>③</sup>所以使得巴城华侨人口大为增加，由1619年的400人激增至1627年的3500人。可见，早期巴城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福建漳、泉一带的人民，其中也包括了安海港出国的人民在内。

明代后期，随着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前往日本经商的越来

①张燮：《东西洋考》。

②洪少禄：《从族谱中获得安海居民侨外史料之探讨》，《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安海乡土史料》1957年第一辑。

③黄缪伦：《红溪惨案本末》，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1961年版。

越多，形成了福建人民移居日本的初兴。据史载：“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sup>①</sup>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估计，1610年至1633年每年去日华船约在30至60艘之间，1639年增至93艘，1641年则达97艘。由于商人多，其中不少侨居日本，有人估计当时旅居日本的华侨达三万人之多。<sup>②</sup>著名海商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都是福建华侨和侨商，他们活动于日本和东南沿海各省之间。后来，颜思齐死，郑芝龙被拥为首领。据考证，郑芝龙是在1612年到达日本长崎经商的。<sup>③</sup>到1627年，郑芝龙已拥有“联踪二百余艘”。他采取“掠富施贫和杀兵不杀民”的措施，而称雄于海上。最盛时期，郑氏拥有商船三千艘，成为明末“富可敌国”的大海商。

郑芝龙原籍是安海港西岸石井人，他的船队经常在安海一带活动，与郑有乡籍关系的安平商人，也竞相投奔依附，参加海外贸易活动，与日本侨商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据有关文献记载，单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至八月间，郑芝龙就有23艘船满载货物从安海港开往日本，可见贸易的频繁。由于贸易频繁，安海商人在日本定居下来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安海金墩《黄氏族谱》和存耕堂《柯氏族谱》就记载族人“商东京”，“歿日本”的史实。<sup>④</sup>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年生于日本平户，1630年7岁时才回国。

---

①《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

②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十，《南洋学报》第十三卷。

③叶山高行（日）：《河内浦郑氏遗迹碑》，引自黄玉斋《明郑成功的家族》（上）四，《台湾文献》卷十四。

④洪少禄：《从族谱中获得安海居民侨外史料之探讨》，《安海乡土史话》1957年第一辑。



时至今日，郑成功及其父郑芝龙在日本还有“儿诞石”、“喜相院”和“遗灵庙”等历史遗迹，成为侨居日本的历史见证。

清顺治二年（1645年），郑成功兴兵反抗清朝的统治。1650年取得金厦两岛作为抗清复台的基地。而安海直到1656年以前，仍为郑氏的内陆抗清据点。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师撤出安海，第二年（1656年）清兵进占安海，把安海镇焚毁净尽，史称为“丙申焚毁”。据《安海志》记载：“丙申焚毁，化为灰烬。辛丑迁界，鞠为茂草，无屋可居，无田可耕。老者转死沟壑，壮者散居外乡。抒空南国，霜沾雪窖之魂，泪洒西郊，露冷迁民之骨”。<sup>①</sup>据说，当时整个安海的寺观、宫室、官廨、居民，悉数被毁平。<sup>②</sup>只剩下龙山寺。因此，许多无家可归的安海人只好相率流亡海外谋生。后来，清将施琅攻下台湾，郑克塽降清。但是，郑氏虽亡，其魁杰及部下，有的乘船至小吕宋，转至爪哇、马六甲各处。<sup>③</sup>在爪哇还发现“明武德将军郑公明墓”。<sup>④</sup>安海一些族谱也反映清初不少人旅居咬嚼吧、顺塔、三宝垅、旧港和暹罗的史实。<sup>⑤</sup>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取得台湾后，东南沿海的统治趋于稳定，清政府也认识到“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因此，遂解除“海禁”。同年，厦门设立海关，“榷征闽海关税务”。<sup>⑥</sup>从此，厦门作为福建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兴

①《安海志》卷十《户籍》，陈梦弼《安海清史记》。

②《安海志》卷三十五《记事》。

③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1929年。

④韩振华：《台湾郑氏余众与印尼华侨》，《载厦门日报》1982年7月27日。

⑤《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⑥周凯：《厦门志》卷七《关赋》。

起，并成为福建对外贸易和华侨出入的重要门户。海禁的开放，不言而喻会刺激安海商船的南航和人民的继续出国。安海侨乡的族谱反映了人民纷纷出国到吕宋、怡朗、苏洛、咬嚼吧、三宝龙、泗水、旧港、日里、新加坡、槟榔屿、柔佛、吉兰丹、吡叻、暹罗、通和、宋卡、安南、占城、仰光以及日本东京等地谋生经商并卒葬在各地的大量史实。<sup>①</sup>

### 三 近代以来安海华侨出国人数之激增 及其对家乡的贡献

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是安海华侨在海外发展的重要时期。

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迫开为对外通商口岸，这对安海的对外直接通航起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安海是泉州港最近厦门的一个港口，大轮船虽然不能直接通航，但帆船航行于安海厦门之间堪称便利。因此，泉州晋江甚至南安一带的出入国华侨，都由安海转口，货物交流也很频繁，商业也很兴盛，成为泉属一带的大集镇。

民初以来，封建军阀的频繁战祸，抢劫，拉夫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强抓壮丁等等，安海、东石、石井、水头等地为逃避灾难而出洋的显见大量增加，而成为今天的著名侨区。单安海镇一地，就达千人以上。据洪少禄先生《安海交通史话》记载：

“本市（安海）旅外人数，据最近户口调查，统计一千四百余

<sup>①</sup>洪少禄：《从族谱中获得安海居民侨外史料之探讨》，《安海乡土史话》1957年第一辑。

人，此外全家移出者，且未计入，故除往国内各地外，出洋华侨，尚在千人以上，其间往新加坡占多数，次为马尼拉、泗水、檳榔嶼，再次为宿务、咬牙那、三宝壟、太平、江沙、香港，其余如安南、仰光、山打根、巨港、日里、坤甸、怡朗、三宝壟等，亦多有我安人七之足迹。”<sup>①</sup> 其实，这种估计是非常不完全的。在30年代，单安海在“菲律宾同乡人数已近二千，马尼拉约七八百人。”<sup>②</sup> 如果再加上安海乡村以及百井、东石以及水头等地，那么，其人数当在安海镇华侨人数的十倍或几十倍以上。

由于安海港海外华侨的激增，因此安海华侨在海外以联络乡宗情谊为主要性质的同乡会在南洋各埠相继出现，其中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有：旅菲安海同乡会、菲律宾宿务鸿江公会、泗水安海同乡会、新加坡安海公会等等。<sup>③</sup>

安海华侨也和广大的华侨一样，在海外遭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歧视、排斥、迫害和屠杀。世世代代的辛酸血泪形成了华侨爱国爱乡的强烈愿望和光荣传统。安海华侨与祖国家乡的关系更加密切，对祖国对家乡作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

#### （一）安海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埋葬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不论在这场革命的酝酿和组织阶段，还是在光

①洪少禄：《安海海外交通史话》，《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1983年。

②③陈增荣：《安海华侨在海外的同乡会组织》，《安海乡土史话》，1957年。

复福建的战斗中，安海有不少华侨给予支持和积极参加。安海的陈清机，便是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陈在青年时代，即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走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道路，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他潜回晋江、安海一带活动，发动轰动全省的焚毁安海衙门的革命事件，被前清知县李襄国指为焚衙主谋，欲拘办治罪，鼓吹革命的《声应报》，也被查封。<sup>①</sup>辛亥那年，也有归侨桂某某和蔡鉴等人向安海群众作革命道理的演说。与此同时，安海旅居泗水华侨桂瑞芳于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冒险携带《图存篇》、《唤醒国魂》等革命书籍回安海，并由其子桂华山偕一、二同学缮抄百余份，在街上张贴，进行革命宣传。<sup>②</sup>

辛亥革命后，华侨回国投身于安海的光复运动和反袁斗争，也是安海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1915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称帝称霸全国之时，陈清机遂与诸同志鼓吹讨袁，任晋江讨袁负责人之一。又如安海桂华山，父为爱国华侨，在南洋加入同盟会。华山青年时，在泉州煌记商行为店伙，即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泉州的反袁斗争，曾游说当地驻军协统赖乾参加反袁斗争，并受革命党组织派遣与陈春木医生共同负担偷运火药工作，后往菲律宾经商，晚年居住香港。<sup>③</sup>

## （二）振兴实业，建设家乡的贡献

安海华侨也在安海和泉州等地从事工业、农业、矿业、商业以及房地产业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和建设，对泉州、晋江、安

---

①陈德贤：《爱国华侨陈清机事略》，《新光》，1981年第3期。

②张家瑜：《泉州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3年第3期。

③桂华山：《桂华山八十回忆》，《泉州文史资料》第九辑，1981年。

海等地的城镇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以交通运输的投资贡献最为突出。

据调查，福建的公路发展以闽南为先，闽南公路又以华侨创办的泉安公司修筑的泉州至安海线为最早。泉安公司是安海华侨创办的，发起人是日本华侨陈清机，他于1917年发起“闽南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招股力谋创办，后因中途受阻，未能实现，遂东渡日本，经营商业。1919年春，闽南靖国军进驻安海，迫切需要改善交通条件，于是邀请陈清机回国创办汽车公司，预定股本为25万元。当时，海外侨胞积极认股，参加投资者达二千户。1921年泉安线正式通车，1925年青阳至石狮线也通车。

华侨投资兴办的泉安汽车公司，使晋南侨乡人民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各地的土特产得到了交流，也给侨乡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泉安公司开办时工程师雷文铨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大多数是归侨。在泉州至安海间第一批驾驶客车的司机郑天德等四人也是归侨。海外侨胞对福建的公路、驾驶技术以及汽车修理技术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解放前的泉州电灯公司，也是安海华侨陈清机、蔡子钦等人集资10万元，于1932年向林菽庄承顶的。它是泉州市解放前最早独一无二的近代工业，这家企业在爱国华侨的支持和归侨蔡子钦先生的关心支持下，一直经营到建国前夕。这家企业建国前给泉州人民带来了光明，对泉州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安海华侨投资近代企业的人物，陈清机可作为代表。他创办的企业除公路和电灯公司外，还有1929年在南安康店创办畜牧垦殖试验场，名为“泉州安海侨西垦殖公司”。并从日本引进桑苗、果树、鸡和兔的优良品种，以及先进农械。1932年陈清机又发起创办“安南永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他亲自聘请日本技术人员到安溪一带探测矿产，并编写一部探矿报告和开发计划，后由于十

九路军反蒋失败，此事业也告中止。<sup>①</sup>

此外，安海华侨投资安海镇的房产也不少。据1957年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安海华侨近百年来在故乡建筑楼屋就达137座，投资67万元，<sup>②</sup>对安海的市政建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安海华侨对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安海旅外华侨，热心捐资兴学及兴办公益事业，这是他们爱国爱乡传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他们对家乡的一项突出的贡献。诸如中小学校舍的建筑，教育经费的资助，慈善事业的兴办，踊跃捐款，比比皆是。

华侨在安海办学最早、历史最长、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要算养正小学和养正中学了。养正小学于1907年由蔡德远、陈清机和高标勋等人发起创办。后来陈清机往日本神户经商，高标勋往菲律宾从事教育，又历届毕业生前往东南亚各地工作的人数至多，因此该校与华侨的关系密切。数十年来，该校在创办经费和建筑校舍方面，都得到了华侨的大力支持。

安海的养正中学是在1925年2月创办的，发起人为陈清机等人，初期经费，由安海五谷公会和泉安汽车公司负责。1936年陈清机渡菲，曾与桂华山先生联名电邀该校校长渡菲募捐经费，发展校务，结果陈自捐巨款，使该校在抗战期间得以维持。长期以来，学校先后得到了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侨的大力赞助，对培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

在安海，1912年创办的培基小学，1922年创办的北隅小学，1927年创办的俭德小学等也都是由侨居菲律宾和印尼等地的华侨

<sup>①</sup>陈德贤：《爱国华侨陈清机事略》，《新光》1981年第3期。

<sup>②</sup>《安海乡土史话》1957年第一辑。

发起创办的。

在过去，安海地处要冲，兵灾频仍，疫病蔓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害，灾情至惨，海外侨胞对育婴堂的建设，救济、施赈以及捐建医院等义举，无不慨解义囊，乐输济众，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 安海华侨的特点

李 天 锡

安海港属泉州古港，位居围头湾内，南出东石、石井之间的海门，直通金、厦，当水陆交通之要冲，是一个对外贸易的天然良港。唐代，泉州成为我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宋、元时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更加发达，一跃而成为世界的最大贸易港之一。安海港作为其属港，便也相因见盛，海外通商贸易不断发展。元末明初，泉州港盛极而衰，但对安海港影响不大，明初并曾一度移泉州港的贸易于安海，使安海港的海外通商贸易日益繁盛。明、清时代，虽然统治阶级都曾实行“海禁”。清顺治年间，还有过“丙申（1656年）毁镇”、“辛丑（1616年）迁界”，但安海港却衰而不竭，蹶而复振，海外贸易仍持续进行。其时与海外通贸，往返需趁季风，一般顺利之时，冬发夏归，需得经年。如若患风失航、贾贸失利而流寓于异国，或长期“住番”于彼从商者，便成为华侨。由于安海港海外通商贸易的繁盛，旅居海外的华侨也不断增多，现在安海是晋江县的著名侨乡之一。本文拟就安海华侨的特点（由于东石澳古属安海港，故本文仍把

东石归入安海港区)，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 一 由海商而成为华侨

明、清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移居国外的华侨。安海在这两个时期中也有大批人出国，但这些出国的华侨却是与安海港的兴盛及安平商人善贾尚贾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

安平商人，素以能贾善贾而闻名于世，以贾为业者，“十家而七”。<sup>①</sup>明代何乔远曾把安平商人与著名的徽州商人相类比，指出：“徽州以一郡，安平以一镇，其贾行遍天下者，安平人却与徽州人相类”。<sup>②</sup>元末明初，泉州港逐渐衰落，安海港和漳州月港代之而兴盛，成为福建省通贸海外的主要港口。于是，很多安平商人便进行海外贸易。何乔远在《闽书·风俗》中写道：“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歛，入海而贸夷，差强贾用”。可见当时与海外通商贸易是非常活跃的。

明朝，统治阶级实行“海禁”政策，使民间对外贸易受到很大限制。可是，由于安海港离郡偏远，一出海门，便为外海。有一些私商采取勾结官吏、假给文引、集帮结派、武装走私、轻舟分散出海以就海舶转运等各种方法，保持与海外通商贸易。明末，郑芝龙以安海港为据点，规定海舶不得其令旗不许往来，控制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安平商人得到郑氏的庇护，可以在海上通航无阻，使对外贸易更为繁荣发展。

傅衣凌教授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写道：“迨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间，福建海商之数益见发达，后遂

①②《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遍布于福建沿海各地。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泉之晋江有安海，……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sup>①</sup>可见在嘉靖年间，安海已经有不少人进行海上贸易了。明朝李光缙在《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中写道：“兄伯年十二，遂从人入粤”，“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致饶为中贾”。由于其时南澳为西方殖民者走私之据点，李寓西因在与他们贸易过程中懂得夷言，所以在“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之时，即首航吕宋，“身之大海外而趋利”。<sup>②</sup>安平商人也有远赴广东，得到官府同意，取得对外贸易特权的。如“颜理学，字道儒，一字道裕，晋江安平人，……贾于粤……矜然诺，重取予，以仗义得诸贾竖心，尝领官符贸夷舶，……”<sup>③</sup>目前从安海族谱中可以查到有姓名最早旅居海外者，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颜嗣良、颜栝祥等人旅居泰国暹罗。从安海港当时与海外通贸的情况及“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sup>④</sup>的特点推测，很可能是由于从商而流于该地的。

傅衣凌教授说：“在（安海）这个地方，我们所见的不仅是居民万户、闾阎栉比，为各方商贾之所聚；同时又是福建海商的一个重要出生地，他们常是全村经商，每每携带乡族之人偕行”。<sup>⑤</sup>《安海志》载：明“隆庆年间（1567～1571年），吕宋开洋，募华人为市。初，无以应者。镇商李寓西、陈斗岩，首航

---

①⑤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②李光缙：《景璧集》。

③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明笃行》。

④《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吕宋与贸，获巨利归，安平人乃多从而趋之，几至十家而九。去者或久客不归，间有籍居生长子女者”。<sup>①</sup>这种情况是可信的，因为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批准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关于“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的奏请，为对外贸易及人民出国定居提供了条件。南洋各地离安海最近者当为菲律宾，所以有不少安平商人前往该地谋生。据族谱资料统计，明万历崇祯年间，安海侨外者有46人，其中旅居菲律宾吕宋岛者则有43人。旅居菲律宾华侨曾于1603年和1639年两次遭受西班牙殖民者之惨杀，安海华侨死于这两次惨祸有姓名可查者共24人。1609年在马德里出版的菲律宾历史名著、阿银苏拉（*Bartolome leonado de Argensola*）所著的《摩鹿加群岛征服史》（*Conguest of the Maluccas Islands*），详细地记述了1602年的第一次惨案，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圣、弗兰西斯节日的三天前，有四百余名安海（*Anhay*）商人留在市中，因为他们无法售卖他们的商品”。<sup>②</sup>这表明明万历年间，安海华侨在吕宋岛的马尼刺市已有四百余人，且均为商人。陈台民先生所著的《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一书中，在论述明代菲律宾华侨时，五次提到“安海”，其中四次是以“安海商人”（三次）及“安海生理商人”（一次）的字样出现的。由此可见，其时安海华侨在菲律宾均为（至少大部分是）商人，并且以一个阶层在菲律宾社会出现。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郑成功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安海一带

---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②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二册），香港朝阳出版社，1985年。

是郑成功的抗清基地之一，清政府对其恨之入骨，在实行“海禁”时，曾有“丙申毁镇”“辛丑迁界”之酷行，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于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流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sup>①</sup>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明令废除出洋禁令之后，东石蔡玉记经营的航运业，开始向南洋群岛发展，直达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印尼、缅甸等地，进行对外贸易。“玉记号”先后拥有载重量万担的三桅大帆船14艘，每艘船员30人左右。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有人便在异国定居而成为华侨。如现旅居新加坡的黄渊捷，就是幼年随其父黄远户（时任“泰兴号”船公）远航新加坡，而定居于彼的。“玉记号”创始人蔡树叶的后代子孙，现在国内者仅90多人，而“旅居新加坡、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者近二百人，大多（都）从事商业、建筑业、筑路业或店员等，在海外有一定影响”。<sup>②</sup>可见蔡树叶这一家族的不少人是由海商而成为华侨，又仍以经商为主的。华侨商人余天佑现有子孙40余人在吕宋，也是主要从商。类似此种情况者还有不少。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位安海华侨都是由海商而来的，而是说早期有一大部分是如此而成为华侨的。

有些人一谈到华侨出国原因，每多认为是国内或饥馑难以谋生，或战乱不能立足，故赤手空拳铤而跨海出国。从安海早期华侨是由海商而成，他们携带本钱——船货而出洋，有的甚至在国内已是富商巨贾，但为谋巨利而出国经商的这一特点，也许可以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②蔡惠仁、蔡福藩：《东石玉记行航运贸易简介》，《晋江文史资料》第二辑。

改变一般常持的“因贫困活不下去，放北人闯关外而冒险出洋”的旧观念。

安海华侨的足迹几乎遍及南洋各埠头，他们大多具有安平商人能贸善贾的特点。例如，旅菲华侨黄秀堪的墓志中载：“有林姓者见而器之，出资畀君贾，则赢利十倍，益大奇之，遂与合资，欢好无间。”<sup>①</sup>老华侨黄树伯在香港经商时，是以贱价买进一船烂皮蒜头，后又以高价卖出而起家的，他所开设的“立记行”是安海乡侨最早在香港开设的商行。因此，安海华侨中有不少大商巨贾。上面已经提到李寓西、陈斗岩因在吕宋从商而大发巨财。清末，余天佑在菲律宾驾牙鄢经营杂货和土产的余通和公司，在其时其地的华侨商业中首屈一指；旅居日本神户的华侨周起搏兄弟及陈清机，亦因从商而致巨富；旅菲华侨桂华山由于商业不断拓展，而曾任“中华国货商会”及“华侨出入口商会”主席等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安海华侨能贸善贾的特点，从清末民初香港郊的繁盛情况也可以反映出来。所谓香港郊并不是专门贩卖香港货的商行，而是贩卖各种洋货商行的代名词。全盛时期，香港郊下设的二盘（即批发商）、三盘（即市商）、“小八炒”（即零售商）共四、五十家，工人达两百多人。香港郊在香港或日本神户设有联号、办户或买手，并且最早采用电报通商情。这些香港郊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华侨有关。如桐林乡族长黄登龙的鸿记香港郊就是依靠旅居吕宋的大侨商蔡浅哥的资金而开设的；又有侨居香港的陈寿萱也来开设了香港郊皮革厂。试想，如果这些华侨不是在侨居地的商业上面

<sup>①</sup>吴增：《欒庄黄君墓志铭》，转引自陈盛明：《晋江地区华侨墓志所反映的史实》，《侨史》1982年第一辑。

有较大的拓展，怎么能够来安海创办或支持创办这些香港郊呢？

由海商而成为华侨，早已有之，非由安海始。但在明、清时代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够有那么大规模的人口出国，并且很多人都能贸善贾，有所建树，却是其他地方所罕见的，这是安海华侨有别于他处的地方。

## 二 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广大华侨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在海外辛苦经营，艰难创业，总是希望有朝一日返回故乡，有所作为，为祖国的富强、家乡的繁荣尽一分力量。安海华侨也同样具有这个特点。

明万历年间，“安海灵水旅菲侨商，从当地夷人习种番薯，得其协助，私运薯苗回国传种，开闽南首种番薯之始，植福于子孙万代”。<sup>①</sup>清道光元年（1821年），安海乡坝江村旅外侨胞王东圃，看到家乡土地肥沃，适于甘蔗生长，便从台湾引进果蔗（俗称“水蔗”）种，栽在坝江溪畔。后来，经旅菲侨胞王经伦不断改良和精心培育，品质更优，声誉远播，良种遍传晋江各地。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风气败坏，弃婴溺女成风，其状惨不忍睹。清道光廿四年（1844年），由侨属倪子范发起，旅居马来亚、新加坡、泗水、菲律宾等地华侨募捐巨款，在安海创办了育婴堂。这是闽南仅有的育婴机构，迄今112年，收容女婴达2万多人，被领出抚养者达1万余人。

在清朝末期，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是日非。广大华侨强烈不满，希望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所以积极投入孙中山领

<sup>①</sup>《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导的辛亥革命。安海旅居槟榔屿的华侨，有2、3个月时间，曾每人每月捐献薪水的20%，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安海旅居泗水华侨桂瑞芳，冒险携带《图存篇》、《唤醒国魂》等革命书籍，回到家乡，由其子桂华山偕一、二同学缮抄百余份上街张贴，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1年11月7日，武昌起义之后，安海革命党人积极响应，举行暴动，烧毁清兵寨埔两营署，砸毁分县署及钱粮厘金各局，掀起了埋葬封建帝制的战斗，打响了福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推动了全省各地辛亥革命的发展。旅日华侨陈清机就是这一革命行动的主持之一。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不少华侨萌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陈清机在“从事革命活动时就有远大的理想，异日革命告成定要践行孙先生之教导：振兴中国唯一出路，是发展实业。”<sup>①</sup>他感到“世界文明各国，交通首重路政……”，而“祖国家乡只有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大路，交通工具多赖马驴与肩舆。这实不足适应现代的潮流。……所以公路交通之开辟，尤为最先”。<sup>②</sup>因而1913年，陈清机就在安海筹办“闽南民办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但因战乱不休，难以遂愿。1919年4月，他开始筹办“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改为“闽南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着手进行筑路工作。他远赴南洋，争取华侨投资，并亲自指挥工程，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在1922年6月1日使泉（州）安（海）公路正式通车。该公司以后又修筑了灵水至石狮及青阳至石狮等7条公路，构成了晋

①②陈德贤：《陈清机与泉安公路的开创》，《晋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江侨乡的交通中枢。泉安公路之修筑，开华侨投资福建公路事业之先声，促进了福建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1931年闽变前，“泉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因军阀混战，营业萧条而亏空。安海归侨蔡子钦和陈清机等人便集资承顶，于1932年改组为“泉州电灯电力股份公司”，资本总额10万元，分1000股，每股100元，股东39人，大部分为非律宾及日本华侨和归侨，其股本占37%。这是华侨在晋江地区投资工业最大的一家企业。公司主要发起人蔡子钦，1918年就和其父在家乡安海筹建电灯公司，后因故工程停顿，延至1927年6月29日始复建开灯。这是福建省最早的电灯公司之一。关于近代安海华侨在国内投资的情况，林金枝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评述：“从投资结构看，大多数是晋江安海人，他们又都是泉安汽车公司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人。陈清机是个鼓吹办实业十分活动的人物，他们在创办泉安公司起色后，即大肆投资企业。根据调查，解放前，泉州一带公用和交通公路事业，几乎都有这些人的投资，而且较大的企业均为他们所经营”。<sup>①</sup>

安海华侨对家乡的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也异常关心。1907年，陈清机、高标勋等人在地方人士蔡德远配合下，创办了养正小学。这不但是晋江县第一所侨办小学，而且比被誉为“华侨爱国爱乡热心教育事业的楷模”<sup>②</sup>的陈嘉庚于1913年创办集美小学还要早六年。1928年，他们又创办了养正中学。这也是晋江县第一所侨办中学，在晋江县华侨创办中等教育的历史上起着表率 and 推动作用。以后，安海华侨又相继创办了灵水、可慕、培基、启惠等

<sup>①</sup>《近代晋江地区华侨的国内投资》，《南洋问题》1981年第1期，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

<sup>②</sup>何香凝1961年8月为《陈嘉庚先生纪念册》题词。

小学。1956年和1958年，又先后创办了安海侨中及灵水中学。数十年来，它们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

新中国成立不久，安海旅外侨胞倪端仪女士，为了改善家乡人民的医疗条件，倡议捐建安海医院，得到很多侨胞的响应，纷纷捐款，于1957年建成门诊部，开晋江县侨办医院之始，推动了该县侨办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982年，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又主动集资22万元，为该院兴建一座“四化”大楼，进一步完善了医疗设施。1981年，桂华山捐资13万元，为安海幼儿园兴建一幢2层教学大楼，增加了20间教室，可以多容纳800多名儿童。最近几年，安海灵水村的华侨来家乡扩建“华侨街”，增设了百货、棉布、五金交电、食杂、饮食等商店。还有不少华侨在自己的家乡修桥造路、安装电灯，推动了侨乡建设的向前发展。

加里宁说过：“乡土观念是爱国主义的物质基础。”<sup>①</sup>安海华侨热爱家乡的行动，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归侨颜绿卧病期间对子女说：“我看来不行了。我生前不同意你们出国去，我死后你们也不要申请出国。你们都是祖国培养起来的，应该留在国内为四化建设多出力！”<sup>②</sup>他自己就是在古稀之年回国的，在病中还主持了安海地区首届“海星状”书画竞赛，为继承祖国书画传统艺术、造就艺苑新人贡献了最后一份力量。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信息时代，四化建设事业正在不断向前发展，“闽南金三角”正在开发，华侨无疑仍然是我们经济建设事业中的一支劲旅。安海旅外侨胞达数万人，他们都是

---

①张圣才：《为了祖国、为了家乡》，《闽南乡土》1985年第一期。

②李建成、许金界：《“爱我中华、不忘乡里”——忆新加坡归侨、著名书法家颜绿先生》，《晋江乡讯》第五期。



“爱我中华，不忘乡里”（颜绿语）的炎黄子孙，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能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开发“闽南金三角”、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从安海港兴盛史展望安海开发前景

陈树田 郑广南

安海港地处闽南“金三角”中间地带，这里有山有海，资源丰富，海运方便，面对港、台，人民勤劳，华侨众多，地方富庶。历史上，安海是千年良港，“著名的商业城市”，早已形成一个经济港区结构。它以安海镇为中心，石井、水头、东石等港澳为支点，构成了一个周围半径百华里的海滨经济区。现在，国家决定把港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人民正为大展宏图而努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个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我省经济发展史上看，安海港是跟随泉州与厦门开展海外交通贸易而兴盛起来的。宋代，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一大港市，城里中外商人聚集，杂货山积，商业繁荣。外国商人驾船络绎来泉州贸易，宋人用“异国悉归贸易”，“海涨声中

万国商”<sup>①</sup> 诗句，形容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盛况。我国各地“大商贾人”泛海“往外国买卖”，多从泉州驾船出洋。<sup>②</sup> 泉州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重要港市。宋政府于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泉州市舶司，主持贸易事务和征收商税。元初，马可波罗至泉州，看到港口船舶往来如织，商人众多，货物大量堆积，称为世界第一商港。安海港地处泉州南面海陬，也随着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而崛起，并成为泉州港外围的一个贸易港口，泉州港与安海港之间形成为母子港的关系。

安海港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间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在宋代，“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sup>③</sup> 泉州海滨地区“以海为业”者尤为众多。原因是，“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夷域”。<sup>④</sup> 安海港区人民擅长造船与航海，商贾造船“通夷域”更为积极，他们象其他地方海商一样，冒风浪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扬”，<sup>⑤</sup> 兴贩海外各国，以“唐货”换回“番货”，转销国内。在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安海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商活动的基地，各地海商常驾船进港，“客舟自海至”，进行贸易活动，因此泉州市舶司派官吏来管理安海港市贸易事务，“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sup>⑥</sup> 这里所谓“客舟”，按当时知泉州真德秀说法就是两浙和广南的

---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福建路·泉州》。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

③苏轼：《苏东坡集》卷六《论高丽进奉状》。

④朱长之：《吴郡图经读记》云：北宋时，“闽、粤之贾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扬，毕集于吴之市”，安海海商也是这样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

⑤《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一〇五一卷。

“客船”（即商船）。其时，南来北往的商船多经围头澳，过石井以达安海。安海与石井近在咫尺，隔海烟火相望，商船由此出洋、驶入。“斯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风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镇市店肆罗列，百货杂陈，举凡越裳翡翠，南海明珠，无所不有，丝绵锦绮，毳毛靴袜，无所不备。镇市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sup>①</sup>

至明代，泉州港衰落，而安海（明代安海称安平）港则进入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安海港的繁荣完全是靠发展对外贸易而来的。

随着国内商品经济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经济力量，他们摆脱官府市舶司的束缚，开辟浙江双屿，福建月港和安平民间对外自由贸易港口。而安平港在这些港口中居重要地位，安平海商最为活跃。明人何乔远云：“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sup>②</sup>“航海贸诸夷”是超越国家界限，交通各民族的贸易活动。为了开展海外贸易，安平海商行贾郡国，采购浙江湖丝、江西瓷器、四川药材和本省府县的山货、海味、手工业品、土特产，以备浮海“贸夷”之用。各路货物源源而来，使安平镇成为海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温陵旧事》说泉州海滨诸港“为岛夷之贩，安平镇最著”。<sup>③</sup>从安平港载运出口的货物有丝、绸缎、锦绮、陶瓷、药材、铁器、糖品、果品等，远销柬埔寨

---

①《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②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十二《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

③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

寨、占城、暹罗、渤泥、三佛齐、吕宋和日本等国，<sup>①</sup>博易运回胡椒、香药、犀角、象牙、珠贝等“番货”。中外诸色货物汇集安平港，港市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

与此同时，众多的“番商”纷纷驾船前来安海港市贸易。嘉靖年间，“番舶连翩径至，近地装卸货物”。<sup>②</sup>据黄堪《海患呈》云：日本商船一来就有数十艘，碇泊安海港海门白沙。“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云集于市”。本地人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sup>③</sup>另据《同安县志》云，“碇于晋南之白沙头，与漳、泉人互市”的日本船，最多曾达“数千艘”，<sup>④</sup>万历以后，安海港是大海商郑芝龙及其家族经商海外的大本营，郑氏拥有庞大的商船队。此时，安海“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省城”，<sup>⑤</sup>外国人称其为“著名的商业城市”。

降及清代，泉、漳二府人民与过去一样，多“以贩洋为业”，航海通贸暹罗、柔佛、马辰、吕宋、苏禄、六昆、麻六甲、安南、宿雾、噶喇吧、文莱、单丹、旧港、大吡、宋厝脐、柬埔寨等国。<sup>⑥</sup>清初，安海港虽遭战乱与迁界的破坏，但至康熙后期很快又重新振兴起来。“康熙年间，外洋大船时泊于此(安海港)”，“户部税馆在安海关榷”。<sup>⑦</sup>安海税馆隶属厦门，清政府规定，

①据何乔远《闽书》云，三佛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中国商人与阿拉伯商人多在这里交易，安平海商常驾船到此地同外国商人贸易。

②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③《安海志》卷十二《海港》附文，黄堪：《海患呈》。

④康熙《同安县志》卷十《盗贼志》，“数千艘”疑数十艘之误。

⑤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八。

⑥德福：《闽政领要》卷中。

⑦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关隘志》。

进出口洋船要经厦门同知会同提标参游查验，方能进出。此时，厦门已逐渐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港口。清人朱仕玠说厦门为“闽中通洋巨镇”，商贾辐辏，百货聚集。他还引《厦门诗》云：“洋舶纷四出”，“往来市诸番”，对外贸易兴盛。<sup>①</sup>在此情况下，安海港发挥了它特有的经济活动和适应力，在对外贸易事业上同厦门商港建立了经济联系。清代后期，安海商人组织各种行郊，经营工商业，繁荣安海港区经济。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反动势力统治下，安海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动，兴办一些新式小工厂，开公路和经营海上轮船航运，加强同厦门的经济联系，商旅活跃，货物丰盈，取代号称“银同安”的经济地位，成为厦门商埠外围的一个附属港，同主港厦门共同繁荣发展。

## 二

安海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是安海港兴盛的重要经济因素。今天，我们要振兴安海港，开发、建设安海经济开放区，仍然要重视这一经济因素，让它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新的作用。

如上所叙，安海港在对外交通贸易过程中，先是泉州的子港，后来转变为厦门的附属港，与厦门在经济上形成了密切关系。安海港与厦门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关系持续发展至今。厦门开辟为经济特区后，客观上必然要求更进一步加强安海港与厦门特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经济上同步发展。现在开发、建设安海

---

<sup>①</sup>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卷一。

经济开放区就是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当前要做的事情很多，最主要的应集中力量办好以下几项事业：

(一) 兴建水陆联运码头，发展海上航运。

安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大体上与历史上所形成的安海港流域经济区差不多，它包括晋江与南安两县毗连的海滨地区和安海、石井、水头、东石四镇。在地理位置上，安海经济开放区处于泉州与厦门特区的中间地带，海陆交通的中间点，是厦门特区北翼一个富庶的经济区和一个具有海上交通运输优势的港口，可以发挥厦门经济特区附属港的作用。

因此，开发安海经济开放区的首要任务，应是充分利用和发挥海上交通运输的优势，从海上谋发展，开拓致富之道。

安海港区人民既有航海传统，又富有经验。海港航运便捷，东与台湾仅一水之隔，北上达浙江、江苏、山东和旅顺、大连，南下通广东、港澳，对外可远航世界各国。这样，安海港可以通过发展海运，对外交通贸易，推动安海经济开放区的建设，促进经济开放区的繁荣发展。

当然，我们振兴安海港，开发和建设经济开放区，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由于地势和海湾变化，安海与水头港口淤塞，有待疏通。不过，石井与东石仍然海运畅通，保持着良港优势。东石镇港位于安海海港东岸，可通海船，石井镇港在海港西岸，为安海港门户，这里水深港宽，可以同时停泊数艘大型轮船，有条件建设现代化水陆联运的深水码头。<sup>①</sup>

从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和安海经济开放区的发展前景来看，需要在安海港兴建水陆联运码头，即在建设海运码头的同

---

<sup>①</sup>据探测，石井港涨潮时水深18米，退潮时水深9米。

时，筹资修筑地方铁路。近年来，漳平至泉州的铁路正在修筑。这条铁路线距安海港石井码头仅有几十公里，地势平坦，易于修筑。从石井码头修筑铁路接漳平至泉州铁路，通鹰厦铁路，纳入全国铁路运输网，并同安海港海运连成水陆交通线。将来安海港石井水陆联运码头建成，厦门经济特区进出口的一部分物资。可以用海运或铁路运输到这里贮存或转运。同时，安海港石井水陆联运码头也将在沟通本省山区腹地，协助内地开展对外贸易发挥作用，可将龙岩、漳平、三明、永安、安溪、德化等地的工矿产品、土特产、山货和农产品运输到港口，装船外运，投向国际市场；内地山区所需的国外先进工矿设备和其他物资，也可以从安海石井港进口、转运。这样一来，对外开放和加强同内地山区的经济联系就会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有利于安海经济开放区同内地山区经济的共同繁荣发展。

## （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工业。

前人开发和繁荣安海港区经济的实践，留给我们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即：在发展对外交通贸易的同时，也要发展国内的生产，源源不断地为对外贸易提供货源。而且，也只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才能吸引和招徕外国商人前来做生意。这条历史经验对我们开发、建设安海经济开放区也有借鉴价值。不过，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我们经营、发展经济事业的途径和方法也就应不同于过去。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充分发挥安海港区山、海、人的优势，利用丰富的山海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结合起来，使之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来繁荣发展开放区的经济，使之成为厦门经济特区一个外围的生产基地。

安海港区盛产海盐，连同邻近沿海地区所产的海盐，年产量达一百多万吨。这是一宗巨大的物资财富。盐来自海水，海水产盐是无穷无尽的，如果采用现代化技术生产海盐，产量还可以增

加。盐是重要化工原料。因此，安海经济开放区适宜兴建现代化大型化工厂，以盐为原料，生产纯硷、烧硷、盐酸和氯气等产品。这些化工产品是化工工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医药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等行业不可少的基本原料。将来大型化工厂建成投产后，不但可以补偿国家每年进口这类化工品所支付的外汇，而且还可以变进口为出口，大量换取外汇。除化工厂外，还可以兴建水泥厂、钢铁厂、玻璃厂和罐头厂、食品加工厂等，把安海经济开放区建设为一个海滨工业区。

安海港区及邻近地区优质花岗石资源极为丰富，这里的打石业历史悠久，颇负盛名。今后还应重视发展打石这一传统行业，并采用新技术开采花岗石和生产各种产品，以满足各地建设需要。近年来，本地出产的优质花岗石制品已打开国外销路，石雕艺术品也颇受外国人欢迎。因此，发展打石业，出口花岗石制品和石雕艺术品也就成为创汇的一条途径。

随着经济开放区建设发展，各方面都需要人。安海港区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主要办法是兴办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专业人员，以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才，建立一支新型的产业军，他们将在工业、海运、渔业和种植业等各个生产领域发挥作用。

### （三）把安海经济开放区建设为鲜活产品的生产基地。

安海地区出产龙眼、荔枝、桃、李、柑、柚和梅子等水果。安海港又是“富有赢蛤之利”的海域，盛产海蛎、蛎蟹和紫菜。内外港有大片浅海滩涂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里有条件开拓、发展以殖蛎、培植紫菜和人工养殖对虾等海洋养殖业。石井、营前等老渔港，现拥有渔船上百艘，一年四季捕捞大量海鱼。这些山、海出产的产品，部分可投放市场和制成干货、罐头，其余则可作为鲜活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四)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当重视开放旅游业。

“旅游是对外开放的开路先锋”。如今，许多国家都重视开发和**发展旅游业**，称它为“无烟工业”，视为影响大，见利溥的一桩大生意。我们开发旅游业不但是对外开放的需要，而且对发展繁荣安海开放区经济也将起积极的作用。

安海港区具有开发旅游业的优越条件。这里既有秀丽的山海自然景色，又有著名的历史名胜古迹。大自然和先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待我们去开发和利用。

安海港区风光如画，景色迷人。外港为围头、金门海湾，海域辽阔，烟波浩瀚，南眺金门、厦门两岛，尽收眼帘，东望台湾海峡，天水一色。内港别有一番景致：石井海门，风平浪静时，海水明澈如镜，风浪一起，立即呈现“怒潮掀海立，大浪夹山来”的壮观景象。入海门，洋面宽阔，形如大湖泊。轮船渔舟，往来似梭，港澳渡头，帆樯如林，宛如一幅活动的海港图。海港南、北、西三面群山环抱，烟楼山、鳌石山、象形山、杨子山、鸡笼山、熊山、灵源山和岱峰山等山峰与海相映，形成各种天然景观。安海有“双桥跨海”、“东海晴光”、“东海秋帆”、“鸿渐朝霞”、“霁云观潮”、“西畴春晓”和“鸡笼耸翠”诸景。石井亦有“五马朝江”、“杨子晚照”、“鲤鱼吐珠”、“碧沙环带”、“双龟渡海”、“双阳华表”、“紫阳呈案”等八景。古人给安海港区如此众多的美景名号，说明自古以来安海港区就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区。如今，虽时过境迁，有的风景已消失，而且人们的审美观和乐趣也改变了；但是只要我们装点海山，保护自然环境，广种花草树木，绿化和美化港区，就可以把安海港建设成为对外开放旅游的胜地，吸引中外诸色人众前来参观、游览。

安海港区有多处历史名胜古迹，是文化古迹流辉之区。安海

是有名的文化古镇，石井、水头和东石也是文教昌盛，人文荟萃之乡。本地区有名人学士、名宦、高僧，也有著名的英雄人物，他们留下不少历史文物与遗迹。安海镇有安平桥、龙山寺、西塔、星塔和宋代思想家朱熹讲学的石井书院等古建筑和寺院；水头镇朴兜村是参加王安石变法的北宋改革家吕惠卿故里；石井镇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家乡。开发、利用这些有意义的历史文化遗迹，兴办旅游业，是建设安海开放区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应以举世闻名的安平桥作为核心，兴建一些附属的游览设施。

安平桥是座跨海的大石桥，它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都是因工程宏伟而闻名于世的古代建筑。安平桥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工程浩大，用巨大石板建造，全长八百一十丈，广一丈六尺，疏为水道三百六十二，是世界建桥史上一大杰作。古人称赞说：“天下无桥长此桥”，为天下桥之冠。现在，国家拨款重修安平桥的工程已竣工，今后的任务是研究桥的建筑工程和建桥工艺，进一步修饰大桥，力求保持其宏伟壮丽的原貌。从旅游业的要求来说，还应兴建几项附属的游览设施：

第一、在中亭地段辟一碑廊，复刻历代重修安平桥碑记，选录历代文人学士咏赞安平桥的诗词，请著名书法家书写诗文，镌刻竖碑，让游览者信步长桥，歇息中亭，观碑了解安平桥的历史，欣赏碑刻和书法艺术。

第二、结合安海港疏导工程，清除桥下积泥，挖沟通海，引海水灌注桥下。游览者可乘游艇游弋桥下，观赏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石桥。

第三、利用桥东大片积滩地和“九十九弯”航道，兴建公园式的游览设施。这样一来，既方便旅游者参观游览活动，又为本地区人民创造一个休息、游玩的场所。

再是开设民族英雄郑成功事迹专题参观游览项目。

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又是外国人崇敬的历史人物。石井镇是郑成功的故乡，镇旁山上有他远祖母坟墓（俗称“米篮墓”），墓前有郑成功纪念馆。建议在石井镇山头上竖立郑成功巨型全身塑象，以壮景观。安海镇是郑成功7岁时从日本回国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郑芝龙豪华府第的遗址就在五里桥附近的桥西铺。覆船山有郑成功陵墓。此外，白沙岛是郑成功四叔父郑鸿逵筑寨堡和引退居住的地方。石井山上还有郑成功部将马信坟墓（俗称“乌面脸公墓”），这些有意义的历史遗迹可以连成一线，组成专题参观游览活动项目。

安海港有长达千年的海外交通贸易历史，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反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文物和历史遗迹。港区之东有宝盖山，山上石塔为“姑嫂塔”。据传说，姑嫂俩的丈夫皆为海商，“贩海久不至”，登塔望夫归而得名。<sup>①</sup>这传说反映了安海港海滨人民很早就以海商为业，从事兴贩海外的经济活动。外国人驾船来安海港贸易的历史遗迹有石井的“烟楼公”坟墓。

“烟楼公”事迹不为外界所知，他原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船主。明朝嘉靖年间，日本海商经常驾船来安海贸易，这位日本船主与日本海商联踪到安海港，泊船石井港澳，同海滨乡民友好相处；他反对倭寇抢劫肆暴，并尽力保护乡民。后来，日本船主死在石井烟楼山上，乡民敬面怜之，为他造坟安葬，并建祠祀奉，以表缅怀之情。几百年来经常有人上坟及到祠庙烧香，至今香火不绝。如将“烟楼公”遗迹辟为开放参观点，宣传中日友好关系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

<sup>①</sup>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安海港区周围有几座名山，山上有寺院古刹，也是有待开发的名胜古迹。明人何乔远在他所撰《闽书》中，对安海港区的名山古刹作了详细介绍：灵源山，距安海镇东北八里，山顶有“望江石”，登上可以“返望郡中山，而外望海”；山上有灵源庵、紫灵室、师姑井和吴明宫等古迹。唐代，名士欧阳詹少年时曾隐居灵源山中三载，宋时林知亦读书此山中。再往东北，有华表山，山间有草庵，是我国东南唯一现存的摩尼教古庙宇。东石东北处有岱山石佛寺，依山岩镌大石佛像，南宋时，王十朋知泉州，书刻“泉南佛国”四大字。水头镇西部有雄山，高耸入云，山巅有飞瓦岩古寺庙，亦为一大胜景。石井镇西有杨子山（亦称欹髻山），山腰处有清水岩寺院，宋代进士杨肃与吕大奎曾经读书于寺中，后来，有人在寺中招徒传授医术，培养一批行医民间的医生。这里列举的名山和古刹，是兴建旅游设施的好地方。

我们知道，名山、古刹是旅游者最喜欢涉足参观之境。上面说到的灵源山、雄山和杨子山都是名山、古刹兼备的山峰，只要制订开放计划，加以经营管理，即可成为旅游和渡假胜地，以吸引国内外旅游者前来观光、游览。这样一来，安海开放区对外开放的大门就可以开得更大大，使之更加繁荣昌盛。

## 安海港在闽南金三角中的历史地位

庄 为 玑

### 一 闽南金三角的历史地理

这里所谓“金三角”是指“闽南泉漳厦地区”。根据我国文

化发展的趋势是自北而南，这个地区的发展也是这样。最初这个地区是先民越族的住区，浙江有瓯越、福建有闽越、广东有南越。三国时这里只设立一个“东安县”。<sup>①</sup>两晋时升为晋安郡，分设八县，梁时析梁安郡，或称南安郡，地兼兴泉兴。隋时全省并为泉州，复名建安郡四县，即建安、闽县、莆田、龙溪，那时龙溪已由泉州分出，为漳州的前身。迨及明代，厦门由泉州府同安县分出，设立思明州，脱离泉州而独立。降至近代厦门辟为五口之一，其地位已超乎泉漳。从历史上看来，泉漳厦在一千四百年前，原是泉州统属，千余年后始鼎立而三，三者的历史关系是极其密切的，而其中心的变化，亦自北而南，始泉州，终厦门。这是金三角内部的历史发展规律，认识这个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童大林著《闪光的闽南金三角》，说“把闽南这块宝地，称之为‘金三角’，把整个闽粤海岸，比作黄金海岸，确实当之无愧”。“金三角地区完全可以发展为一个具有自己优势和特色的新型经济区”。这是国内学者对“金三角”在地方经济发展上新的认识。<sup>②</sup>

我们已知“金三角”的涵义，现在进一步谈一下“金三角”的地理特点。泉州发达较早，《闽大记》云：“泉州府环山障海，为东南之巨镇”。<sup>③</sup>《泉州府志》也说：“泉郡宅于山海间，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海而居者，亦食其海之入，举得而有焉。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也”。<sup>④</sup>这

①《泉州府志》卷三《建置沿革》。

②童大林：《闪光的闽南金三角》，《福建画报》1984年第一期。

③王应山：《闽大记》第4页。

④《泉州府志》卷二十第20页。

说明泉州为沿江沿海的商业地区。故童氏认为泉州是我国廿四名城之一，马可波罗在这里留下了东西文化交流的足迹，郑和曾从这里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漳州自唐以来，发展成为农业地区。《道院记》云：“临漳在闽会之极南，地旷而土沃，其民务本，不事末作，而资用饶足”。<sup>①</sup>到了明朝，《闽部疏》云：由“漳州气候最暖，草木皆先时花。崇兰、桂子、茉莉、詹葡，一时并开；荔子、蕉黄、旧桔、新李，同案而荐。紫茄蒂于陈根，王瓜枯于靡草，诚中之异境也”。因此，漳州逐渐发展为花果之乡。明时又发展为商业区。明《闽大记》云：“漳州闽会极边一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泉漳人以海船为利”。故童氏曰：漳州有名花、名茶、名果，驰名中外，可发展为食品工业、饮料工业、医药工业及生命科学的基地。厦门市为本省直辖市。《厦门志》云：岛上有唐陈黯薛令之的古迹。至明《东西洋考》云：“中左所一名厦门，从前贾舶监验于此。验毕移驻曾家沃（曾厝安）候风开驾”，“万历三年（1575年）漳泉道议分漳贩西洋，泉贩东洋。欲于中左所设官抽餉，郡守力言不可，乃罢”。<sup>②</sup>清《厦门志》云：“成宏之际（1465~1505年），有间乘巨舰贸易海上者，奸人阴开其利窠，而官不得显收其利”。<sup>③</sup>明末，郑成功统治厦门，厦门为诸洋利藪，到清初康熙廿三年（1684年），厦门正式设立海关，代替宋泉州的市舶司。近代鸦片战后，1842年《南京条约》第二条，1843年《虎门条约》第十

---

①《道院记》，见宋《舆地纪胜》漳州部分。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十，《厦门志》卷三。

③周凯：《厦门志》卷十六《旧事志》。

七条，确定厦门开为商埠。①故童氏称：厦门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国际著名的商埠，现在随着经济特区的建设，正在成为一个金融、贸易城市。根据上述金三角的历史和地理的特点，可以摸索出“金三角”的发展规律。它们既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又各有其地理上的独特地方。

## 二 安海港在金三角中的地位

安海港是古泉州港的一部分。泉州港古来的发展是北有后渚，南有安海，形成S形地带。安海港和后渚港不同。后渚为沿海港，安海为内陆港。泉州港初期以安海地处内陆，隋唐以前适合江港的发展，为江海之间的联络站，故有东桥西桥的建设。一个小镇竟有两大石桥，实为国内少有的奇观。这个奇观说明安海宋时为泉州平原联络站，同时又是航海的避风港。由于安海地点适中，介在漳泉之间，故安海能成为金三角的钥匙。早在隋唐以前，安海已成为泉州的内陆港。《西山杂志》云：“大盈辟于西周”②（正与出土文物相符合），降及秦汉，中原人民大量南迁。《安海志》云有汉一粒沙南来振兴佛教；东晋汉人南来，云集晋江两岸，亦有部分远离晋水居于东石安海各地。晋时印度僧人来泉，登陆地点应在安海，由此北上丰州，在九日山译经。当时后渚港尚未诞生，故由南港北上丰州较为适宜。唐开元时，丰州东徙泉州，建城于清源山下，后渚港始应运而兴。然安海港仍能维持其交通地位，成为安海与泉州的联络点，沿途置店列肆，

---

①《厦门海关简史》稿本。

②《西山杂志》手抄本。

今新店有开元的“售货之场”，池店为“蕃商之馆驿”，五店市为“蕃商集行陆路中站”，畚店为“集市之所”，在这条路上，商旅络绎不绝。唐开元时有林銮舟至勃泥，沿途造了七塔；天宝中，王尧为林銮自勃泥运木造舟，可载四万担货物。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厦门已出现“新城嘉禾里”属于南安县。五代始升大同场为同安县，厦门改隶同安县。①其时后渚或已出现，尚不及安海。《安海志》云：“宋开宝间，有唐名臣安金藏之后安连济，徙居湾海，易湾为安，安海之名自此始”。②然则宋代以前，安海原名“湾海”，以海港多湾，故称湾海。又称：“安海城即石井镇，在八都濒海，人烟臻集，古名湾海”。南宋以来，后渚虽迎头赶上，安海仍繁荣如故，绍兴五里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称。明《安平志》云：“安海于宋全盛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市为最盛”（21页），这是安海繁荣的第一高潮。

宋元泉州为东方第一大港，后渚为泉州北港，安海为泉州南港，两港遥相辉映，而安海为联络海外的重点港口。今掘地古迹时常发现，足以证明安海为宋元时代的要港，若欲深入了解宋代安海，必须进行安海旧市的发掘（详见《安海志》“宋代安海山川海港示意图”）。

安海港湾曲折，传为“九十九弯”，古时水入西垵、曾埭而至大营；安海旧有“一镇六桥”之说：即东西桥、内市、甘棠、佳坂、皇恩诸桥。桥梁纵横，陆路四通。东上郡邑而达省城，西

①《厦门地名》第2期《泉州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

②《安海志》卷一《沿革》第2页（铅印本）。



通漳州而至南粵，北经南安而抵安溪、永春、德化诸山城，南至厦门、同安诸海城。安海为联络“金三角”重要港口。元末战乱，安海未受波及，明初更曾一度移泉州贸易于安海，使安海得以犹盛不衰。

明清时代后渚衰落，安海代兴。其时成化间，泉州中心北移福州，泉州官商衰落，一时成为真空，安海代兴，私商活动。嘉靖廿四年（1545年）日本夷船十数只，由漳州商人引水，迳来围头、白沙。其时安平商人李寓西曾徙南沃与夷市，或假文引，以渡官卡；或借官许通贸琉球为转口，再往日本或南洋各地。

明末郑芝龙，天启间有船120艘，崇祯间竟达千艘。芝龙建第安平，海船直通卧内，贸易不亚于省城。驱逐荷夷，称霸海上，岁税千万，富逾十主。安海港遂成私商贸易之口岸。其子继之，郑成功编组东西洋船队，设“五商十行”于各地，以金厦两岛，抗天下全师。清兵以最毒辣手段，始而毁镇（1656年），终而迁界（1661年），安海夷为废墟，海港遂致衰落。此安海繁荣的第二高潮。

安海既被摧毁，私商仍然继续存在，中心转到漳州月港，而安海仍保持其联络站之特点，漳泉私商结合，与外商互市。其时安海系泉州与漳州相近的地带，且有运输路线直通漳州，于是安海与月港沟通，成为私商在泉活动之据点。安海虽被摧残，而往外谋生者日多。其时以吕宋最近安海。何乔远《闽书》<sup>①</sup>记云：

“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人多往焉，久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孙系者”，“泉州……行而南，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微歛，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安平一镇，在郡东

<sup>①</sup>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王享记》。

南，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多服贾南京、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

明王慎中《遵岩先生文集》，其书多安海史料。如安海王氏、陈氏等的墓志，安海《华侨族谱》中，“有陈氏、黄氏、颜氏、柯氏、施、曾、高、吴、郑、洪、陈等十一姓，共三百〇六人，其中死于西班牙杀害者（万历癸卯夷变）即有六十七人之多。安海所以能维持至今不坠者，安海华侨之力也”。

公元15世纪以后，世界局势大变。我国私商活动日多，外国西葡英荷殖民日亟，遂使外贸情况日益复杂。王士鹤同志曾作一文<sup>①</sup>谈及1573、1644年（万历元年至顺治元年）中国——马尼拉贸易船只数目、港口、航线，中文资料提到海澄月港、台湾省淡水和基隆，外文资料亦提及福州、泉州、漳州、广州、澳门、淡水、基隆，其中福州泉州商船，须至月港结队，然后启航，广州则先至澳门再行放洋。明嘉靖年间，厉行海禁，滨海人民，则在浯屿、月港、海港、梅岭等地进行走私贸易，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始能除海禁，海商回航时须先至中左所（厦门）纳税款然后入港。海澄遂为福建最繁荣的港口，直至天启、崇祯年间，荷人为患，洋船被劫，海澄衰落，厦门才起而代之。可见安海——月港——厦门的港口，是依时代不同而变化的。上述泉州商船，即包括安海在内。钱江同志写了一篇论文，内有1570—1760年（明隆庆四年到乾隆廿五年）中国船到菲律宾的船只共约3,097只，每只载重400吨，平均每年16艘（包括安海船在内），190年中贸易总额达3亿比索，其中利润约为1900万比

---

<sup>①</sup>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地理华刊》第七号，1964年。

索。①其他如日本、荷兰的贸易不多提了。所以安海商人在我国是很有地位的。

近代以来，安海在列强入侵的情况下，教案发生，实开革命风气之先，为反帝运动作出贡献。据《闽南中华基督教简史》称：“安海位于厦门之北境，为兴泉永通衢，隶属晋江县泉南重镇也，安海为泉永设教之枢纽，乃至安海租屋者咸德境，安海士绅下逐客之令，盖写实也”。②辛亥革命以后，安海有华侨投资电气、汽车公司，推动安海前进，南而厦门漳州，北及泉永，仍以安海为联络点，起新旧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

### 三 解放后安海在金三角中的作用

安海过去兴衰历史如此，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否再起联络作用呢？我认为仍然会起作用的，不过有两种看法：一是依附厦门港说，一为依附泉州港说，这或者有先后的不同。

有的人认为安海在古代三百年来，都是厦门附属港口，其建设必须纳入厦门特区的范围，方有前途。厦门特区将来可作为自由港，其商品出入，必依靠附近的腹地。厦门本岛作为轻工业及旅游的胜地。安海港、石码港可为厦门副港，可作为厦门的重工业基地，以补厦门的不足。厦门虽为半岛，但铁路单轨，容纳商品吞吐量有限，必须依靠两翼市镇，安海为其北翼，若欲继续发挥联络作用，则安海可为陆上交通的中点，设使闽南闽西铁路能经过安海，则厦门商品可西往闽西以达江西，又可经闽中以达闽北。出口亦然，安海既能起联络作用，则安海至少有三件事可

---

①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的贸易》（硕士论文）。

②许声炎：《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简史》第13~13页。

为。一为重工业基地，二为陆上交通的中点，三为中外物资的堆栈。即此三者已能使安海地位复兴。

就海路而论，安海小轮既可直达厦门香港，又可得香港免税的优待，今已实现直达的理想，海外贸易仍可复兴。

根据今年3月胡平省长传达国务院三个“金三角”（即长江、珠江、闽南）的开放问题说：三个三角地带带有开辟沿海经济开发的战略意义。就本省而论：开放闽南三角地区，开辟厦门经济特区和福州开放城市等，不仅能较快地促进我省沿海一带的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引内联”加强其对内对外的辐射作用，把内地经济也带动起来。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关键在于发挥闽南自然优势和社会经济优势，积极扩大出口，多渠道的创汇，还要抓好能源、交通、通讯等建设。这便是开发闽南金三角的基本原则。①安海必须面向金三角的开发，发挥其联络作用。

安海港是属于泉州地区，泉州地区周顺明专员②说：谷牧同志首先认为本地区是闽南侨乡，是东方第一大港，第一个海关，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本地区的历史地理优势，如何利用这个优势，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把泉州和厦门、漳州来比，泉州的首先优势是华侨的故乡，如何集中全力搞好侨务工作，使它为泉州建设服务，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要看陈埭、石狮的发展，就可以推知安海港要如何利用侨资来“外引内联”。外人或华侨一到厦门，必然要来泉州，那么泉州的古迹正吸引阿拉伯人前来投资，他们认为泉州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安海港离泉州偏远，似乎与泉州的开放不很密切，但它仍旧可以起联络作用。

---

①《福建日报》1985年2月7日第一版《国务院座谈会》。

②《福建日报》1985年4月5日第一版《访晋江地区专员周顺明》。

但是，就长远来看，有人认为要搞活东南经济，建滇闽铁路是扩大港口腹地的唯一办法。认为这条南方陇海铁路一开，泉州新港萧厝港一开，泉州就可恢复它的青春。这只是将来的事，还在开放厦门特区之后，有待于今后的建设。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则安海仍可与泉州建立密切的关系。那时候，左有厦门港，右有泉州港，安海介在这二者之间，可谓左右逢源。安海以其地理优势，可南可北，何去何从？有待安海港人民自身的努力，以创造其光辉灿烂的前程。敬祝安海港鹏程万里，前途无限光明！

## 安海丁姓回族探源

陈国强

安海位于福建著名侨乡晋江县西南部的低丘台地。1942年安海公社属安海镇。解放初属可慕区。安海镇有居民6千户，3万多人。1958年成立的安海公社，面积42平方公里，有67个自然村，11,000多户，62,000多人，划分为30个生产队、1个农场。1983年前安海镇与安海公社合并，1984年又划分为安海镇与安海公社，1985年又合并为安海镇以统领诸村。

在安海地区，丁姓和郭姓回族，据1979年统计，有150多户，450多人，1983年人口普查，约有400人，其中丁姓有58户，354人（男170，女184）。除丁姓回族外，还有郭姓回族8户40多人，其中1户是从惠安白奇迁来。丁、郭两姓回族，居住安海已经近300年，但一直未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丁姓回族是从陈埭公社丁姓回族迁来繁衍，长期与陈埭丁姓有密切来往关系。他们

还保存有祖先传下的族谱，可以作证据。

据安海镇郑梦星先生告诉我们：安海丁姓回族一直传说他们来自晋江县陈埭公社，是“陈埭丁”的后代。为此，我和吴进通同志于1984年11月到安海调查访问，在郑梦星先生帮助下，先后看到当地保留的四本家谱。

（一）《陈江丁氏家谱》，光绪二十六年二十世丁逢星撰。书页宽26.5、长24.5厘米，宣纸，毛笔楷书，保存人：丁秀欣，男，62岁，属古坑二房二十二世，青阳山塘供销社供销员，现住安海星塔新乡。

（二）《安平丁氏续修宗谱》，光绪年间十九世丁启成、丁朝续修。书页宽29、长29.5厘米，宣纸，毛笔楷书，用红布做封面。保存人：丁辉煌，男，57岁，也属二房，安海土产批发部职工。

（三）《安海家谱》，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世丁子登（定）、丁子年修。书页宽23.5、长26.5厘米，宣纸。保管人：丁少仁，男，43岁，属陈埭花厅口二房二十二世，安海八一厂工人。

（四）《晋邑安平丁氏宗谱》。光绪甲辰年丁在修，书页高24.5、宽13厘米，宣纸，毛笔楷书，已残缺。保存人：丁鸿尚，男，53岁，属二房二十二世，安海水产商店职工。丁鸿尚还保留有一残本，封面题《此本抄过别本支图》，大小同上。

根据上述几本族牒，对安海丁姓回族来自陈埭丁姓回族，记载很详尽。摘述如下：

据《陈江丁氏家谱·谱序》载：“吾家自始祖节斋公由苏入泉，始居文山，继徙陈江”，“九传遯菴公即我房分支祖也，葬于古坑，因名曰古坑房，传至十五世延斋公。生祖兄弟七人，祖贾于鸿江，遂家焉。兄弟同来者有四，而继起者惟六七两派并行至于今，阅有五世矣”。“族弟乃出吾宗旧谱相示，阅旧载分明

可稽，上自始迁之祖，下逮延斋公，俱历历有据。惟支分安平尚未迁入，乃依旧谱臆真，而旧谱中所未入载者复立图以续之”。从二十世丁逢星的这段谱序及谱中各世序列，可见从一世至十五世丁景（号延斋）和晋江陈埭丁氏族谱一致。到十五世丁景生有宪、蒲、天、高、寿、算、七等七子。其中蒲、高、寿三子仍居陈江（陈埭），宪、天、算、七等四子分居安海。丁宪子十七世捷光“壮年往番，一去不回”；丁天子十七世冬梅、秋香、阳生无后。雨生“壮年往台，一去不回”，均未在安海衍派。

丁算（字考亭，生雍正乙巳年，卒嘉庆甲子年）子十七世镇、美、汀。镇子十八世起、立、字、钦。钦子十九世清源、受恩、火炎。清源子二十世平水、逢吉、汉水。受恩子二十世煌辉、條、海、车。火炎子二十世增华、其忠、金炒、秀润。美子十八世励、壁。励子十九世保、泰，保子二十世宝镜。壁子十九世练、堆金、光侗、光寻，堆金子二十世维连、维斗、维添、维坤，光寻子二十世维旦。

丁七（字恩赐，号朴方，生雍正己酉年，卒乾隆壬子年），子十七世君瑛、君垂、君壬、君栋。君瑛子十八世焕章、焕森、意（往台湾）、培。焕章子十九世的。的二十世九助、光明、九接。二十一世文龙、文福、健、荣波、金镡、金锄。

从二十世丁逢星所修谱谍，可见陈埭丁姓从十六世迁居到安海，一直记载到二十一世。

《安平丁氏续修宗谱》，不仅绘有丁姓在安海祖墓简图，还抄存了乾隆、嘉庆、道光历朝购买墓地契约。最早是乾隆五十三年《卓轩公墓契》，全文如下：

立卖尽绝契人晋江县（七）都陈安坑乡曹荣良有承祖应分旧穴地壹所，坐在土名陈湖山，东至路面，西至墓，南至地坪，北至地，四至明白，今因欠良别置，托中将此地尽卖与安海丁凤

官，边卖过般仪银完足，银即日全中收讫，其地听丁凤官前去择穴葬亲，开筑沙水明堂，东西南北听其随时换向，永为己业，日后不敢言贴言赎，亦不敢阻挡，保此系是承祖应分物业，与房亲伯叔兄弟姪无干，亦无重典不明为碍，如有不明卖主抵当，不干买主之事，今欲有凭，立卖尽绝契为据。

作中人 林乞老 代书人 曹廷美 知见人 曹夺老  
乾隆伍拾叁年六月 日卖尽绝契人曹荣良。”此外还有嘉庆三年、道光十五年、道光十八年、咸丰八年等买地契约，说明早自乾隆五十三年，十六世丁凤官在安海购买墓地以后，安海丁姓一直向当地汉人购买土地。关于丁凤官，谱内记载：

“十六世，显考国洛公讳凤官谥国洛，系卓轩公次男也，生于清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一月十一日酉时，卒于清道光三年癸未七月三十日巳时”。

由上述材料，也证明陈埭丁姓十五世迁居安海，十六世凤官购地在安海埋葬先人之史实。

《安海家谱·家谱序》中记载：“吾家自始祖节斋公，分派诚斋公，诚斋公分派中斋公。其子孙旧居于陈江花厅口，名曰上舍房是也，传至十五世志安公，与祖叔志笃公，贾于鸿江，遂移眷于此，相其地于鳌头西而居，迄今六世。”这是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世子定（登）、子年所题。据此，安海丁姓除《陈江丁氏家谱》所载来自鹏头古坑房外，还有花厅口的二房。关于一世至十四世的情况，祖先与他谱相同，谱系中十四世丁荣甫生六子，二子志安，六子志笃。“志安……享年三十八，考妣合葬安平鲤鱼山，生康熙十一年，卒康熙四十八年”。“志笃……享年四十三，生康熙乙亥，卒乾隆丁巳”。谱中一直记载到二十四世伟、小确、伟琦、伟峰、志孺、锦昌、培坤、浙江、再高、润泽等人。

《晋邑安平丁氏宗谱》前言中记述：“裔孙（丁）在虽出继



而此心无刻不思念本生之祖”，“就树高公以下之生卒年庚自修一本。而树高公以上之列祖昭穆世系俱是已无处稽考”，这是光绪甲辰年丁在所修的宗谱，仅就木主所载列下，缺乏系统。

从以上四本谱牒分析，安海丁姓均是从陈埭鹏头、古坑房或花厅口迁入，具体时间是在十六世乾隆年间，因做生意才迁入安海的。也有个别是在解放前后才迁入安海的，如丁良螺（二十二世）父丁文顺去过南洋，解放后才从陈埭迁居安海，叔丁和尚现尚住在陈埭四境。

在调查中，安海丁姓群众大都明确自己的身世和祖先，并能与谱牒中记载连接起来，这也直接可以证明他们祖先来自陈埭的花厅口、江头、鹏头和古坑房，其中如二十一世丁志东、丁文献、丁文舍、丁文焰之父为丁金抄。二十二世丁启昌之父为丁成权，祖为丁维添；丁加俊、丁加哲、丁加田之父为丁成耀，祖为丁维添；丁忠勇之父为丁招，祖为丁其中；丁秀欣、丁文焕、丁秀明之父为丁川；丁芋园之父为丁标榜；丁再育、丁润泽之父为丁赐仲。丁寿山、丁寿全、丁德仁之父为丁树，祖为丁维斗；二十三世丁祖植之父为丁子珍，祖为丁成权，曾祖为丁维添；丁秀珍之父为丁成茂，祖为丁添；丁宁波、丁金生、丁金振之父为丁子通，祖为丁渊，曾祖为丁九接；丁少秋等父为丁赐潭，祖为丁再兴；丁炯照等之父为丁培坤。

安海丁姓回族的职业，从户口登记簿中予以统计，有供销社9人，小百货烟杂5人，大学（在北京）2人，中学教师4人，小学教师4人，幼儿园2人，干部5人，竹器社5人，农机厂3人，蚊香厂3人，医药2人，冶金2人，工艺2人，小贩2人，市建2人，农民30人，其他油库、旅行社、糖厂、工艺社、白铁、炊事员、皮革、果林场、饭店、外贸、邮电局、车站、百货公司、盐场、市管、包装厂、饼干厂、酒厂、铁工厂、冶炼厂、酱油厂、塑料厂、水泵、纸箱厂

等各1人。职业门类多，人数分散，反映了他们长期来与汉族杂居的特点。

此外，安海丁姓回族还迁移到省内外、香港及新加坡、菲律宾各地，共有30户186人（男95，女91），与安海当地丁姓合并共计有88户540人（男215，女275）。其中在香港有10户68人（男38，女30）即丁文焕、丁再育、丁润泽、丁炯旭、丁炯照、丁炯熙、丁培坤、丁祖盘、丁世川、丁天炎、丁少山等。在新加坡有3户26人（男14，女12）即丁天场、丁文溪、丁培基等。在菲律宾2户8人（男4，女4）即丁少川、丁天佑等。在省外有2户7人（男4，女3）即贵州丁秋林、四川丁文滔。在厦门有4户26人（男12，女14）即丁湘江、丁宁波、丁忠男、丁启真。在石码1户17人（男7，女10）即丁栋探。在省内还有8户34人（男16，女18）即永安丁少秋、丁少平、丁少建，龙岩丁杏安，泉州丁秀珍，晋江丁苏州，南安丁建佳，莆田丁荣茂。另在晋江县石狮有丁文焕，东石有丁寿全等。

长期以来，由于和汉族杂居，安海丁姓回族和陈埭丁一样，在生活习俗中已与汉族一样，但还保留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团结心，和陈埭丁有着密切关系，和其他外地丁姓回族也很有感情。解放前丁超贤叔父丁树恩母亲逝世，陈埭丁很多人来送葬，乘泉安公司汽车不必买票，因人多，用竹箩装饭装菜。1961年前后，香港丁再育、丁润泽曾寄回1000元，制丧事用绣灯、彩牌等物供全体丁姓回族使用。1984年丁文火逝世，安海丁姓有100多人参加送葬。安海丁姓在解放前就一直参加陈埭丁祭祖活动，每年清明前后，要到鹿园祖墓祭祖。1982、1984年，每次都有十几人前去参加。当1979年陈埭成立回族委员会时，安海丁姓有五、六十人前去参加庆祝、游行、照相、开大会，他们和东石、官桥、莆田的丁姓乡亲都住在陈埭鹏头村。

现在，安海丁姓老人，还相传记得过去清初的清兵毁镇，只剩下十九间厝，整个安海公社只剩下六间厝。长期以来，丁姓回族和当地汉族有着共同的生活和信仰，他们也崇拜信仰龙王寺、帝王爷。丁姓回族过去都与汉族通婚，同姓不婚。近年来只有丁少强和丁纯纯同姓结婚，但血缘相离很远。

解放前，安海丁姓回族和陈埭丁一直有联系往来，他们一直认为是陈埭丁的子孙，陈埭丁也一直认为是同姓族亲，故往来频繁。1978年陈埭丁国栋带领南音乐队二十多人（也属二房，住岸兜），到安海表演二天，还开会，与安海丁姓一起照相。陈埭丁还经常帮助安海丁姓解决困难，如解放前安海丁世琛土地被西坡伍雁占据，墙被拆，人被打。后来，陈埭丁出面，帮助交涉，直至解放后才妥善解决。前几年，安海丁金生房业出租后产生纠纷，陈埭丁也出面帮助，并由陈埭丁国标代表到安海几次，帮助申诉。陈埭、安海两地丁姓回族，碰到有婚姻嫁娶，都要互相邀请贺喜。1981年晋江县选民族代表，最后由陈埭丁姓选出7人，安海丁姓选出1人，共8人。

安海丁姓根据居住分布地区，习惯上又分为衙门口丁、金厝围丁、下坂坑丁。他们均属陈埭丁二房的分支，属于三房江头只有4户37人，均住在安海公社曾林大队。

在调查访问中，有的老人还反映：解放前国民党在安海也大抓壮丁，强迫他们出钱出粮，还用刺刀伤人。其中丁姓回族就被抓走几十人。有的壮丁途中逃跑回乡。家里还得花四五百块光洋、六担米去买通，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丁建安参加地下工作，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解放后担任省公安厅一处处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安海丁姓有不少人到香港做生意，也有迁到台湾去，甚至远到东南亚国家，他们虽远离家乡，但还保留强烈的民族感情，传说有安海丁姓到马来亚当大官，前年逝

世，临终时嘱咐子女要回家乡安海取得联系。

从安海丁姓族谱和现状的调查，均可证明他们来自陈埭丁姓。陈埭丁姓在解放后已被政府承认是回族，1979年1月19日晋江县革委会又发出晋革（79）004号文件，题为《关于重申陈埭公社七个大队丁姓回族问题的批复》，文中指出：“经调查和研究，证实你公社所属七个大队的丁姓，确系回回人之后，因此本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为认真贯彻落实民族政策，研究决定重申你公社岸兜、鹏头、江头、溪边、西坂、四境、花厅口七个大队的丁姓为回族。”安海丁姓既是由陈埭丁姓回族迁来繁衍，目前他们与陈埭丁姓回族关系还很密切，并且长期以来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团结心。因此，安海丁姓应属回族无疑。鉴于当前政府还未承认他们是回族，而他们又一直迫切要求恢复民族成份，建议有关领导应予重申他们是回族，以便落实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为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 安海港与古陶瓷外销

叶 文 程

安海港是泉州四大海港之一，它的兴起与繁盛，同海外交通海洋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更使安海港日益昌隆发展。古泉州地区的晋江县，是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盛产陶瓷的重要地区，宋元时代及其以后，在这里及其附近地区出现许多烧制陶瓷的窑场，其中较著名的窑场有晋江县磁灶乡、泉州东门窑等。与晋江毗邻的县份，如同安、南安、

安溪、德化等地也出现许多生产陶瓷的窑口和窑场。由于安海港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和位置，是对外通贸的著名港口，因此，这一地区在南宋及其以后，古代陶瓷窑场的大量出现和对外输出有密切的关系。建国以来，经过多次的调查与发掘所得到的大量古陶瓷标本，结合在东南亚各国出土的资料看，可以证实这里所烧制的陶瓷器大量是作为外销的。而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由安海港输出海外诸国的。所以，古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不但反映与促进安海港的海外交通的发展，也是中外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实物证据。下面我们简述古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的有关记述；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的发现；国外发现的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与安海港陶瓷外销的意义。

## 一 古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的有关记述

古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唐、五代以来，这里的陶瓷业生产已相当发达，并且远销国外。“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sup>①</sup>这就说明在五代时，这一地区的陶瓷便已销往海外诸国去。

到了两宋时期，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陶瓷更加大量地销往海外诸国。据南宋理宗宝庆年间赵汝适《诸蕃志》一书所记：泉州地区等地的陶瓷，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盆钵粗器及瓷珠等，已行销于中印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东印度群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以及东非海岸一带。由此可见，泉州地区生产的陶瓷，品种多，数量大，并且销往的地区和范围相当广

---

<sup>①</sup>《泉州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手抄本）。

泛，几乎包括整个亚洲和非洲。

宋末元初，中外商人来往更加频繁，亚、非各国商人皆云集泉州地区，并将泉州地区的陶瓷器大量贩运出口。“宋末荷兰人将（从）福建（主要应指泉州）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sup>①</sup>其时，中国商人到海外诸国进行通商贸易的，都是从泉州港或取道泉州出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曾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又说：“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sup>②</sup>由此可知，荷兰人及中国商人贩运瓷器至欧洲，就是从泉州港出口的。因此，中外商人由泉州港运出的陶瓷器，除了国内其他窑口的产品外，绝大多数可以肯定是泉州地区（如德化窑、泉州窑、晋江磁灶窑等）各窑口的产品。“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近年月港窑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其雅。白磁出德化，元时上供。”<sup>③</sup>

如上记载资料，可以确认北宋末元初，由泉州安海港及其他港口销往国外的陶瓷器有饶州（即江西）、福州等地运来的，也有由福州转入月港，再由月港而入安海港的；同时，还有月港窑（应指漳州窑或石码窑）仿饶州窑的。所以，由安海港外销的陶瓷，既有外地（如江西、福州）的陶瓷，又有古泉州地区如德化、晋江等地的陶瓷器。

元朝陶瓷外销范围更加扩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曾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他于1292年回国时，

①冯和法：《中国瓷业之现状及其状况》，《国际贸易导报》，1932年。

②吴自牧：《梦粱录·江海船舰》。

③《安海志》卷十一《物类·土货》。

曾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白瓶，存于威尼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sup>①</sup>

元代《岛夷志略》曾记载，当时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的国家，有越南的占城，泰国戎，缅甸淡逸，柬埔寨真腊，马来亚丹马令、吉兰丹、丁家奴、苏洛岛，新加坡龙牙门，菲律宾三岛，婆罗洲蒲奔，勾栏山，苏门答腊日丽、三佛齐、喷喷、旧港、班卒、假里马打、花面、淡洋、喃巫哩，爪哇的遐末物、文诞、东淡逸，甚至远达印度群岛的文古老和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五十多个国家地区。当时外销的陶瓷器，除了青瓷和青花瓷外，还有一些粗碗、壶、瓶、罐、水埕、水坛、盆、钵等粗器。《真腊风土记》一书，也记载了泉州之青瓷器外销真腊（今柬埔寨）地方。这里所指的泉州青瓷器的外销，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一桩史料。

记载泉州地区，特别是晋江地方陶瓷外销的，还有《梅溪吴氏分支族谱》云：“三世元末大乱，招延清源鸿儒麦先生，设塾诲训子弟耕陶……”。又乾隆版《晋江县志》云：“瓷器出晋江磁灶乡，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并过洋（指南洋，即东南亚诸国）”。

明、清时代，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作为博易外货的瓷器，有关文献中曾有较详细的记载。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所载祖法儿国和锡兰国条，皆有以瓷器作为博易之物。费信著《星槎胜览》和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对这一时期的陶瓷外销也都有记载。这时，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仍然继续不断。尽管泉州官方的对外海洋贸易停止，但是民间私商仍将陶瓷器运

---

①沙善德著、吴乃聪译：《福建——中国考古之新富源》，《福建文化》第二七期。

销到外国去，并且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只是当时输出的港口不同而已，更多的是由安平港（即安海港）运出；也有的从漳州（月港）起运；有的由厦门港运出；有的则由福州港运出。由此看出，明代陶瓷的外销，泉州地区生产的陶瓷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无容怀疑的。

到了明代中期，特别是成化、正德至嘉靖年间，我国民间的海外贸易是比较发达的，瓷器的输出必然随着扩大。此时，中国商人泛海运载瓷器等物至国外贸易。也有外国商人来中国者，并获大利而归。当时中国瓷器不仅输往亚洲和非洲，而且也大量销售至欧洲。至于对日本的瓷器输出，也从未间断过。据日本小林氏《中国陶瓷图说》的记载，《出岛兰馆日志》记录了1641年6月26日由郑芝龙派往日本的海船，携带瓷器一千四百四十七件；同年七月十日从福州开出的一条小海船载瓷器二万七千件；十月十七日大小海船九十七艘驶入长崎，载有瓷器三万件。<sup>①</sup>

到了清代，特别是康、雍、乾时期，是我国瓷业的鼎盛时期，泉州地区陶瓷的外销仍有发展。从清代初期到中叶，中国瓷器除在欧洲有广大市场外，其它如美洲、非洲、澳洲，都有人直接或间接来购置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各地，无处不有中国的瓷器。

总之，上述有关文献和地方志中，以及国外书刊，对古泉州地区陶瓷大量外销作了详尽的记载，这为我们了解历代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的路线、种类和范围；也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陶瓷的外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这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注意的。上述这些记载古泉州地区的历史资料，其输出的地点和具体港口，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虽然没有完全明确指出是从安海港输出的，但从陶瓷的外销窑口和品类看，特别是从明代民间私商贸易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从安海港运出的外销陶瓷当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完全可能的。

## 二 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窑口的发现与 国外出土的泉州地区古外销陶瓷

隋唐以后，特别是宋元之际，由于泉州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陶瓷器在对外贸易货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当时的陶瓷器生产和外销均得到蓬勃的发展，窑址遍布古泉州地区，以生产青白瓷为主。同时，青瓷的制作也更加成熟，产品远销亚、非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国外出土的泉州陶瓷器，也以这个时期的产品占较大的比重。

近年来，在古泉州地区的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德化、永春、安溪、同安等县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窑口和窑址。属于宋元时期的有127处；属于明清时期的有283处。在古泉州地区的各县发现400多处古外销窑口，这在我省也是罕见的。

晋江县发现的古外销陶瓷窑址，主要集中在磁灶乡一带。如土尾庵窑生产的外销陶瓷产品，其种类以军持、执壶、瓶为主，这些器物在国外屡见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1979年曾在这里出土了绿釉力士塑像、铁绘执壶、绿釉注子、黄釉喇叭形碗、青黄釉铁绘盏、灯盏、黑釉罐、黑釉盏托、黑釉注子、黑釉扁罐、黑釉小罐、黑釉薰炉、青釉薰炉、褐釉器盖等器物。

磁灶蜘蛛山窑出土的器物也相当丰富，以军持、注子、瓶为

多。国外大量出土该窑产品，菲律宾、日本均有资料可证。菲律宾出土的长颈军持和绿釉军持、盘和砚滴。日本出土的青釉碟、孔雀纹盘与蜘蛛山窑出土的基本相同，应是这个窑的产品。1979年，在这个窑址上曾出土了孔雀盘、绿釉军持、双龙抢珠军持、花口绿釉瓶、牡丹纹盘、灯碟托子、黑釉敞口碗，黑釉深腹碗、青瓷碗、轮花口青瓷小碗、酱色釉碟、青瓷碟、灯火碟、宝塔式器盖、平底钵、绿釉带座小炉、带座小炉、直道纹盒、绿釉莲花碗、黑釉碗、绿釉龟形砚滴、四系孟、青瓷漏斗、鼎式炉、瓜瓣执壶、两系壶、平底盘、长颈壶、鼓钉纹盖罐等器物。

在磁灶乡童子山窑址也发现有盆、洗等主要产品、装饰花纹除刻花外，还有釉下绘花，开泉州地区瓷器釉下彩的先导。还出土有题诗的器物。这里出土的黄釉铁绘纹盘，在日本的福冈和长野县都有发现。<sup>①</sup>

此外，如泉州的东门窑、南安窑、安溪窑、永春窑和德化窑、汀溪窑等也都出土不少古外销陶瓷。上述各窑生产的古外销陶瓷、在亚洲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以及远至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也都发现有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器。

近几年来，在国外许多古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不少中国的陶瓷器，从唐代到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如德化窑的瓷器自宋以来，外销延续不断，在东南亚国家中，以菲律宾出土为最多。1964年以来，在菲律宾的遗址与墓葬中发现了数千件较完整或能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离马尼拉约50英里），坭都洛的加莱港等遗址最为集中。出土的器物有

---

<sup>①</sup>叶文程、徐本章：《谈谈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未刊稿）。

壶、军持、罐、瓶、盖盒、碗、碟、高足杯等。器物均模制，胎质有烧结适当、瓷质较好的，也有一些生烧因而瓷质较差的。釉色青白（影青），也有白中闪黄，俗称“牙白”的。器物分口沿有釉和没釉（涩口）两种。有釉的都采用一匣一器正烧方法烧成，无釉为对口烧而成的小洗之类的器物。装饰均以印突细线条纹为主，纹饰有莲瓣、卷叶、牡丹、飞鹅、钱纹、万字符号、水生植物、玫瑰花等。<sup>①</sup>

在菲律宾还发现有早期的中国瓮，如中国元代龙瓮。<sup>②</sup>在菲律宾宿务发现的中国瓮，是15世纪时由中国输入的，一直为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所应用。另一类明代的中国瓮，同样发现于菲律宾的宿务岛。<sup>③</sup>这种瓮，在肩腹间都印有龙纹，属龙瓮之类，应是泉州地区的晋江县所产。

在菲律宾发现的晋江磁灶窑烧制军持壶（或称注水壶）、双龙壶，是古泉州地区外销陶瓷的重要物证，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这种壶一般高为12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5.5厘米。口稍外移，边唇外折，颈短而粗，底平微凹，流长附于肩腹之间，腹部周身印有两条龙纹，腹下部有一道弦纹，底腹印有瓜瓣纹。器表施绿釉，釉水光亮。<sup>④</sup>这类军持在晋江磁灶窑出土不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在调查发掘该窑时也曾发现不少这类标本。这种军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发现，如菲律宾就曾发现

---

①李辉柄：《关于德化屈斗宫窑的我见》，《文物》1979年第5期。

②Jocano, *Philippine Prehistory*, 1975.

③*A History of the Orient · Chinese Pottery in the Philippine*.

④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

过。①

另一种收藏在法国科隆市博物馆东方艺术文物室的军持壶，亦系菲律宾出土。浮雕花装饰，深绿釉，尾附在肩腹间。壶底内凹，无釉。壶体分段模制接合。壶肩模印有双龙带幸福珠。壶口、壶颈和尾部釉特别厚。对照比较样本是与爱迪斯：《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图二十九相同②。

在菲律宾出土的另一类军持壶，造型圆身、长颈、喇叭口，边唇削成突出斜槽。胎骨为淡红色或灰色，釉为琥珀色，有碎裂纹。在菲律宾又发现一大批这类形式的军持，釉色为绿釉和琥珀色结合，这种器物可能为早期类型的军持。③

这一类军持，在菲律宾发现有几件，一件高15厘米。深绿花纹，带棕色斑点，重釉，尾附在肩腹之间。平底，底部施釉。壶分两部分模制接合而成。对照标本，为洛克辛图二十（菲）圣安娜出土，图二十三。④另一件，高16.5厘米。由釉底料做的。受侵蚀厉害，呈琥珀色，带棕斑纹。器壁一部分和底部无釉，壶口及颈部经修复。对比样本，本编目93件。一件高17厘米。图94号，为琥珀色釉。另一件高17.5厘米。图94号，带琥珀色。④

上述几件军持壶，均被推定为元代器物。菲律宾出土的上述这些标本，与晋江磁灶发现的绿釉、酱色釉军持完全相同，确为

---

①爱迪斯：《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

②《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瓷》，德文版。

③Cheng Te-K'un: *The study of Ceramic Wares in Southeast Asia*.

④《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瓷》，德文版。

晋江磁灶所产。磁灶发现的军持，口沿边唇斜削，颈长，腹上部附一尾，平底。施绿釉，底腹无釉。酱色釉军持，出土数量多，与绿釉军持形制相同，施酱色釉，底腹无釉。<sup>①</sup>

在菲律宾的怡老戈、锋牙丝兰、描沓安、邦邦牙、黎刹、氓都洛、描实描地、怡朗、武六干和苏禄等省，也曾出土有埋葬瓮、龙瓮、龙壶、瓷碟和白瓷等器物。<sup>②</sup>

泉州地区的陶瓷，不但外销到东南亚各国去，而且还把制陶制瓷技术传播到国外。有人曾提到：“在中国（福建省）晋江磁灶乡……自这小村镇移来的工匠，把这工艺介绍到菲律宾来”。<sup>③</sup>泉州晋江的制瓷技术，由我国的陶瓷工人带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去。根据调查访问和已有的资料看，在菲律宾的怡老戈曾有几条龙窑在烧造陶瓷器。他们把所烧造的瓮，叫做“文奈”、“达巴渊”和“大孝”。<sup>④</sup>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发现不少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陈万里在《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一文中提到：“最近荷兰兰登人民美术博物馆的报告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出土，一个白瓷盒，有细线样的花纹，就照片来看确是德化的白釉器”。陈万里在调查记中还指出，就已发现的泉州及同安古代窑址的碎片看来，完整物品之在国内传

---

①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

②陈台民：《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菲律宾《华侨周刊》第十七卷第二十期，1958年11月16日。

③④G. L. Acarin：《磁灶的制瓷技术》，菲律宾《华侨周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1963年。

世的很少，可以想见当年的制成品似乎都是用于外销。此刻所要先行提及一点的就是晋江、同安等处在当时所烧制的，恐系外销用品居多。<sup>①</sup>

### 三 安海港陶瓷外销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安海为泉州地区的一个市镇，水陆交通之要冲，为海外交通的优良港口。在探讨安海港与古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的问题，确是一件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对安海港陶瓷外销的探讨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一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安海港陶瓷外销的情况，不仅有史籍的记载，而且有在国外发现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证据，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安海港出口外销的陶瓷，除了古泉州地区所属各县生产的以外，还包括有外地区外省生产的陶瓷器。其外销产品，有白瓷、青瓷、黑瓷、青白瓷等，还有各类日用粗陶器，如大小埕、瓮、缸、罐、钵子等。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与安海港近在咫尺的磁灶镇生产的陶瓷器，更多的是从这里出口的。

宋元以来，古泉州地区陶瓷手工业发达，可谓陶瓷的勃兴时代。这一时期陶瓷发达的原因，与当时安海港通贸海外，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明清之际，这一地区陶瓷工业的发展，为安海港等港口的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商品。所以，海港的兴起和繁盛，也促进了泉州地区陶瓷业的发展。因此，作为外销商品之一的陶瓷器，是安海港历史上通贸

<sup>①</sup>陈万里：《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文物》1959年第九期。

海外的重要实物佐证。通过对港口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充实安海港海外交通史的内容。

古泉州地区陶瓷外销，特别是由安海港出口的陶瓷，晋江县所生产的陶瓷在出口比例上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随着陶瓷制品的外销，海洋贸易的发展以及华侨的出国，制造陶瓷的工艺技术，也随之传播到东南亚诸国去，受到海外各国人民的普遍重视和欢迎。所以，今天我们在回顾安海港陶瓷外销的历史时，感到极大的快慰和高兴，我国勤劳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陶瓷文化曾经作出过贡献。对港口地区陶瓷的外销历史的追溯，也使我们看到这里陶瓷的外销，在中国制瓷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友好关系史、海外交通史和海洋贸易史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借鉴历史，在开发闽南金三角经济区，振兴安海港的今天，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安平桥与海外交通的关系

李意标 黄国盪

安平桥（又称五里西桥）为我国宋代现存下来最长的石桥，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为什么能历经八百余年的沧桑仍能巍然独存？它与安海港历史上对外贸易的关系又是如何？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

安海港属泉州四大古港之一。泉州港自唐经五代至北宋，海

外交通贸易即已相当发达。尤其是在宋室南渡后“经费困乏”，需要“一切依办海舶”<sup>①</sup>来解决，海交贸易更为迅猛发展，跨入了鼎盛时期。安海港为泉州港重要的支港，也随着泉州港的发展而发展。早在唐开元八年（720年），该港便有东石沃林銮者“造海舶航行于渤泥、琉球、三佛齐、占城等地”，并“引来蕃舶通贸”，使“沿海畬家人多从之”。<sup>②</sup>宋元祐二年（1087年），与泉州设市舶司的同时，州官也遣吏榷税在安海设立石井津。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又“建石井镇，委官监临”。<sup>③</sup>宋末，安海港海交贸易之繁荣，正如《安海志》所载：“斯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风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市镇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sup>④</sup>

南宋时，由于泉州海交贸易发展的需要，大量建筑桥梁。据不完全统计，桥梁建筑将近百座，为泉州建桥的黄金时代。在这些桥梁中有不少是工程浩大的跨海长桥。如苏埭桥长2400丈，宏济桥长1300丈，玉澜桥1000余丈，獭窟屿桥有770跨水道（长约千丈以上）……等。安海港的安平桥和东洋桥，就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安平桥，建于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二年（1138～1152年），水道362，长811丈（实测2255米），宽1丈6尺。东洋桥，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长547丈。这两座长桥，同泉州南宋所建诸桥一样，也都是为适应海交贸易的需要，解决“马舆安行商旅通”<sup>⑤</sup>的。

安平桥与东洋桥的建造，不仅要求有相当的财力，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伴随着海港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安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三十三编《交趾、西南夷》。

②③④⑤《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海周围市场十分活跃，“自镇至郡城，商旅络绎，沿途馆舍驿铺竞立，专为客商驻夜息足而设”。<sup>①</sup>如现在的柑市、曹店、古陵、余店、五店市、新店、池店等都是。这种经济的繁荣，给当地人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安海商人尤获大利。他们“或坐地列肆以谋薄利，或贩干果杂货以应市需；或运珠贝诸蕃货，贾行两京、吴、越、齐、蜀、粤等地，转贩丝绸、锦缎、药材以供贾外海舶。更有梯航海外之海商，远贾琉球、占城、麻逸、渤泥等国，以博厚利”，“转毂千万计而成豪富之大贾”。<sup>②</sup>这些豪富的安海商人，对修建家乡的跨海长桥都非常热心，如绍兴八年，安海人黄护“舍钱万缗，倡造安海西桥”。<sup>③</sup>此外，还有往来于安海经商的外地商人，也积极捐输。如这次修复安平桥时出土的石栏杆，其中有阴刻“浯洲屿（金门）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和“崇放里□□头保□□十六娘□□共施造此一间”等字，宋赵令衿在《石井镇安平桥记》中也记载：“斯桥之作，因众志之和，资乐输之费，一举工集”。特别是当时寺庙的和尚，他们把修桥造路视为一项“积德修行”的善举，积极劝募捐助建桥。安平桥的倡建，便是“僧祖派始作斯桥”，<sup>④</sup>而后由泉州军赵令衿成之。由于僧人带头劝募建桥，更能促使富商士信民众的乐于捐献，形成群策群力的建桥力量。至于建桥的科学技术，安平桥比北宋（1053年）建造的万安桥（即泉州洛阳桥）迟建85年，桥却比万安桥（362丈）长449丈。它吸取了万安桥的建桥经验，同属于“长桥浅基”的梁架式石桥，但又不照搬其经验。安平桥的桥身基础，既不采用以往的“打桩基”，又不搬用万安桥的“筏形基”，而是

---

①②《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③《安海志》卷二十九《乐善》。

④《安海志》卷十四《桥渡》。

采取更科学的“睡木沉基”法。这个方法，既简便，又省工省料。同时，在施工中，安平桥比万安桥更为尊重科学实际，他们非常注意滩土地质的特点和水流深浅缓急的不同，据此来设置桥墩的位置和形状，如墩身的宽窄、墩间的距离、桥墩的形状等，都因地制宜，各有特点，其中就有船形墩、半船形墩和长方形墩等不同形式。这些情况说明，安平桥是在南宋时期，为适应海外交通贸易发展的需要，并不断总结吸收闽南各地的建桥经验，以更成熟更先进的造桥技术建成的。

## 二

安平桥与宋时泉州所建长桥一样，均处于滨海交通要冲之地。它横架于晋江安海镇和南安水头镇的海湾中，把晋南两个县、镇联成一体。它建成后，使“飓风潮波无时不至，船交水中进退不可”<sup>①</sup>的险恶的海湾渡口变成坦途，而与内陆紧密相连，通达四方，“东上郡邑而达省城，西通漳州而至南粤，北经南安而抵安溪、永春、德化诸山城”。<sup>②</sup>由于安平桥成为安海港的交通枢纽，因而使更多的泉州西南线的商船往返，可以直达安平桥边码头停靠，装卸进出口货物，并通过大桥，把货物运送到泉州各地。所以安平桥的建成，对于安海港发展成为一个“通天下之商舶”的重镇，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使“行旅往来，民间负载，熙熙攘攘，习而安之，阅元而明以至国朝（清）”，<sup>③</sup>历数百年而不衰。

---

①②③《安海志》卷十四《桥渡》。

当然，安平桥也同泉州南宋所建长桥一样，均受海交贸易兴衰起伏的制约。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赛甫丁与阿迷里丁相继据泉叛乱后，使来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纷纷离去，泉州海外贸易因之闭绝。继之，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后，又多次下令“禁海”，不准民间使用“蕃货”。①明成祖时，还“禁造双桅海船”，②防止人民扬帆出海，加之洪武三年、嘉靖三十八年和四十三年，倭寇屡犯泉州、安海，沿海人民深受其害，海交贸易濒临绝境。清初，先是“禁海”，继则“迁界”。顺治十三年（1656年）规定，凡与郑成功往来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人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拏缉，皆革职从严治罪；地方保甲通容不行首举者，皆从死”。③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抗清力量被消灭后，虽也取消“禁海”，但对海交贸易仍有种种限制。因此，泉州港自元末以后，海交贸易即一蹶不振。海交贸易的衰落，也影响到从海交贸易发展中兴建起来的滨海桥梁的修建，如苏埭桥、宏济桥、玉澜桥、獭窟屿桥等均先后被废弃。但安平桥却能代有修建，而仍存至今。这是由于安海港在泉州诸古港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安海港的海交贸易，虽也遭到叛乱、“禁海”、“迁界”和倭患，甚至有如清初的“丙申（1656年）焚毁，化为灰烬；辛丑（1661年）迁界，鞠为茂草”④之惨遇。但它与泉州他港有所不同，元末赛甫丁等据泉叛乱，“蕃舶停航，外商裹足”，然“战乱囿于府邑省城之间，安海居泉州之南数十里，波所未

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

②《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七。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申严禁海敕谕》。

④《安海志》卷三陈清夔：《安海清丈记》。

及”，甚至有私商乘机将“船舶转口而之安海港者”。<sup>①</sup>明代，虽遭“禁海”和倭患，而“安海距郡之统制偏远，扬帆一出海门，便为外海，最利于海上贸私”，且“东西两洋海上私贸之夷人船队，为避官府禁制，每窃据沿海港沃”；<sup>②</sup>而安海附近之“围头、石井、白沙诸沃均曾为夷人船队所窃据”，故“能贸善贾之安平商人，每奔逐贸私蕃舶窃据之港澳，以获暴利”。<sup>③</sup>因是民间贸易日益发展，逐步取代了以官商为主的海交贸易。安平商人为了抵制封建王朝的“海禁”，他们“各有妙法，或以海港附近出澳轻舟分散出海，以就海舶转运；或贿赂官吏假给文引，以渡关卡；或借官许通贸之琉球为转口，再运往日本或南洋各地以牟厚利者”；更有“富豪商贾勾结官吏，私造海船，白雇船工，满载货物径自往日本、吕宋、交趾等地贸易”。<sup>④</sup>如嘉靖二十六年，就有10余艘日本船，由漳州商人引水来围头、白沙碇泊，运来四方土货云集为市，安海私商“窃出酒肉柴米以济”。<sup>⑤</sup>明末，郑芝龙拥有海舶千艘，以安海为据点，结帮集伙窜行海上，官府无奈他何，安海商民乞其符令，借为保护以畅行海上。清初，郑成功更延袭其父的旧规，编组东西洋队，航行于日本及南洋各地。直至顺治十三年（1645年），安海被清兵焚毁，夷为废墟，海港闭绝20多年。然而，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施琅平台之后，沿海“复界”，对外贸易便再复苏。以后，清廷设海关于厦门。安海距厦航程较近，海道安全，旅运方便，泉州一带客货往来，均由此集散。如上所述，宋元以后，安海港不但不象泉州港那样逐步衰落下去，而且在明代中后期，竟然“成为私商贸海之口岸”。

①②③④《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⑤《安海志》卷十二《海患呈》。

加之“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致而富商大贾代有所出”。如嘉靖时李寓西、巨商陈斗岩、曾友泉等，均“贾行遍郡国”，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圩”。<sup>①</sup>尤其是郑芝龙受抚后坐镇安海，使安海“镇市之繁华，贸易之丛集，乃不亚于省城”。<sup>②</sup>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复界”后至乾嘉年间，安海镇民迁回重建家园，百工作坊日趋繁盛。清末，更有“行郊”开设，如：以经营物类为名的杉行、鱼行、布郊、米郊；以贸销地区之称的则有福郊、厦郊、漳郊、北郊、香港郊等。这些行郊均属远贾购销之大商和代理洋货的商行。其间还产生了不少侨居南洋各地的殷实的富侨。

由于安海港自宋元以来，对外贸易基本上持续不衰，所以安平桥也与泉州南宋所建的诸桥不同，能够经过历代维修而长期保存下来。现在桥中亭收存十四方修桥碑记（按：据《安海志》记载共十五方），记载着自明天顺三年（1459年）至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桥历代维修的情况。这些桥碑所载内容，从侧面反映了安海各个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如明洪武至永乐间，安海港因受“禁海”影响，海交贸易低落，安平桥即较长时间没有维修的记录。以后，由于泛海私商的活跃，明天顺三年便有商民捐资修桥。嘉靖间，倭寇骚扰沿海，海交贸易一息奄奄，桥又无人顾及。倭患平息，安海城池“金汤永固”（安平桥望高楼上石刻）海交贸易再转生机。明末，更有郑芝龙纵横海上，海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故在万历庚子（1600年）和崇祯十一年（1653年），安平桥又由商民颜嘉梧和郑芝龙等先后倡修。清代，顺治

①李光缙：《景璧集》卷四。

②《安海志》卷十二《海港》。

十八年（1661年）至康熙前期，先是“禁海”，后又“迁界”，安海对外贸易遭受到严重破坏，桥也长期未修。康熙二十三年“复界”后，从雍正至光绪年间，安海港的海外交通贸易发展较快，于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以及道光、光绪年间，安平桥又相继得到维修。虽然，其间也因古桥年代久远，衰朽败落，需要经常修治，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个时期，海交贸易正常发展，商民经济力量雄厚，才能多次捐资修桥。总之，安平桥之所以能长期保存下来，它与安海港的海外交通贸易的持续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论 安 海 教 案

徐 恭 生

1856至1863年安海教案，是继福州乌石山教案之后，我省闽南早期的一起较为剧烈的反洋教斗争。它是以反对洋教士和外国教会为形式的反侵略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福建，尤其是晋江地区的反洋教运动，以及基督教在这个地区的传播均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有关问题作个简要地论述，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 一 安海教案发生的背景

安海位于厦门之北境，为兴、泉、永通衢，历来是闽南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近代安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厦门的关系甚为密切，因此谈安海教案发生的背景，应先从厦门说起。

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厦门地区遭受英军3次进攻和蹂躏。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使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规定厦门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商人和传教士纷纷东来，以厦门为据点进行侵略活动。外国商人依靠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在厦门设立洋行，逐渐控制了这地区的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大量倾销洋货，大批输入鸦片毒害厦门以及闽南一带人民。使这个地区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许多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人民生活日益穷困，游民队伍迅速增加。外国侵略者为了发展海外殖民事业，乘机大肆掠夺廉价劳动力，他们采用拐骗、绑架等卑鄙手段，把我国许多善良的劳动人民掠卖到国外充当奴隶，这就不能不激起该地人民的反抗。如1852年3月20日美国“罗伯特·仓恩”(Robert Bowne)号船从厦门贩运410名华工前往美国旧金山，他们分别来自晋江、同安、南安、安溪、惠安、龙溪及龙岩等县。华工们在船上倍受侵略者的污辱和迫害，于是奋起反抗，杀死船长等4人，华工在搏斗中也有8名牺牲，但终于获得了胜利。4月8日船开到琉球国八重山石垣岛(在今日本冲绳县)，登岸的380名华工中，晋江县籍的有89名，占24%。<sup>①</sup>厦门出洋华工不断暴动，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与此同时，闽南小刀会势力也迅速发展起来。咸丰三年四月十五日(1853年5月22日)安海附近东石乡会首蔡俭等为响应同安小刀会起义，率众数千人攻入安海镇，“毁拆都司营署”，迫使“都司李瑞安逃走萧下乡，分县避居民屋”，<sup>②</sup>显示了安海人民群众

---

①《历代宝案》第二集，卷一九二。

②《安海志》卷三十五。

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之外，还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只能在南洋一带做好入侵中国的准备。1842年2月英军侵占厦门的时候，美国归正教公会牧师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年)第一个到达厦门鼓浪屿，得到英国军官的热情款待，接着他又在英军的支持下强占民房，建立了传教据点。《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又有波罗满(*William John Pohlman* ? ~1849年)、罗啻(*Elihu Doth* 1809~1864年)及打马字约翰(*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1892年)等牧师相继前来厦门传教。1848年该差会在厦门新街(今人民剧场附近)建筑了一座能容纳三、四百人的礼拜堂，称之“中华第一圣堂”。1849年入教者3人，到1854年已达42人，美国归正教公会发展如此迅速，其他差会也不甘落后；它们亦争先恐后地派遣传教士来厦门活动。如英国伦敦会于1844年派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 1810~1888年)牧师从南洋麻六甲来厦传教，不久养为霖(*William Young*)、施敦力亚历山大(*Alexander Stronach* 1801~1879年，即施约翰的胞兄)、麦嘉湖(又名马约翰 *John Macgowan* ? ~1922年)、山雅各(*James Sandler*)等牧师接踵而来，1856年在泰山口建筑礼拜堂。大英长老会于1850年派医士用雅各(*James H. Young* ? ~1854年)从香港赶来厦门设立医院和开办学校进行传教，并与新街教徒同往漳辖重镇白水营及内地布道，厦门就这样成了帝国主义在闽南及沿海各地传教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57年已有教徒112人。

早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除布道之外，还积极为西方殖民者扩大侵略利益效劳。他们到处搜集情报，鼓吹对华采取强硬政



策,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年)等,还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和英军侵华的罪恶活动。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年)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年)充当美国侵华使团的中文秘书。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雅裨理在厦期间,亦曾任过英国领事的临时翻译,恣意袒护外人的不法行为,甚至公然干涉地方内政和包庇不法教民。例如咸丰四年(1854年)龙溪县县令赵某逮捕石码镇一个违法教民王员舍,在厦的外国传教士竟然出面为其交涉,并竭力要求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对福建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57年1月23日)伯驾照会福建巡抚王懿德,无理要求“转飭泉州、厦门该各地方官,速放囚王员舍一名回归”。<sup>①</sup>由此可见,早期来厦的不少外国传教士充当了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谋士和急先锋。因此,他们所到之处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这就是近代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洋教斗争的主要原因。

## 二 安海教案的经过

1856年大英长老会派遣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年)牧师来厦“执掌教务”。<sup>②</sup>他以厦门为据点,积极向厦门郊区及漳、泉内地扩张,又与美国归正教公会密议划分传教区域

①朱士嘉:《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下册第468页。

②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1867年,第239页。

范围，以便分工合作，迅速打入内地，“遂以厦门与附近（禾山、同安）及漳辖西溪一带归美公会；以漳辖南溪一带及安海以北诸地归英公会”。<sup>①</sup>这件事值得注意，按照条约规定，传教士只能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不能进入内地。<sup>②</sup>杜嘉德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而且根本无视中国主权，更加暴露了他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本质。杜嘉德认为安海在地理位置上极为重要，“且据兴、泉、永出口要津”，“圣道（指基督教）欲入内地，非从安海不可”。于是，他亲自出马，前往安海布道。可是安海人民并不欢迎他，面对他的到来“极力攻击，始而禁人赁以第宅，继而禁与牧师传道者之交游，终且掷石扬沙”，<sup>③</sup>使其无立足之地，只好退回厦门。与此相反，白水营传教的局面很快打开。1854年施洗者14人，1855年又有13人施洗，教会势力自白水营扩张到石码、马坪、龙文时，坑美、桥内等地，“大有应接不暇之概”。白水营为漳辖南溪重镇之地，是海澄、漳浦等县出入厦门要口，它与安海刚好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均为西方基督教向内地发展的桥头堡。安海传教情况与白水

①《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神学志特号，第十卷，第三期）第103页。

②1843年10月8日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规定：“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1844年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闲游，尤不得赴市镇私行贸易”。1844年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以上规定外国人活动仅限于五口通商口岸，不准进入内地。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③《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第130页。

宫对比，相差甚巨，这使得杜嘉德感到羞愧和恼火。可是，杜嘉德又“稳安海为泉永设教之枢纽”，绝不甘心就此罢休，为了打开局面，又重新作一番策划和准备。厦门与安海一水之隔，其间水程只有130里，当时还没有轮船运输，老百姓往返全靠民间帆渡，有时来回一趟要好几天，外国传教士为了方便活动，便自造一艘帆船，名曰“福音船”，来往于厦门和安海之间。1858年杜嘉德等乘“福音船”又到安海，偷偷摸摸地租赁咸德境黄氏住宅为讲堂，但多次被安海群众所捣毁。虽是这样，杜嘉德仍旧死皮赖脸不走，又将布道堂从咸德境迁到玄坛宫后蔡宅书塾，这就更加激怒了安海绅士阶层和广大群众。安海是闽南著名的文化古镇之一，历来人文荟萃，扬名翰苑，誉称“二朱过化”<sup>①</sup>之地。因此，安海绅士对无视中国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的基督教是不能容忍的，遂对西方传教士“下逐客令”，“全镇二十四境，各演剧严禁与教士往来授受”，这样“无人敢与教士为伍”。<sup>②</sup>甚至有名的士绅、商贾和殷户也“视教会为不屑亲近；凡亲近者，均被摈绝革逐不齿”。<sup>③</sup>杜嘉德为了扩张势力，站稳脚跟，于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60年9月9日）用小恩小惠的办法，第一批拉拢郑爽、郑坦兄弟等四个二流子入教充其爪牙。据《长老会历史》记载：“爽素嗜阿芙蓉，为安镇吏夫”，是安海镇有名的大烟鬼。后来还有一个“戏馆中吹手”陈强也被收入教。这样安海群众不仅瞧不起教会，而且对杜嘉德本人也更加憎恨。有一天，杜嘉德上街活动，一群小孩尾随嘻笑怒骂，杜嘉德顿时老羞成

①“二朱”即指宋代朱熹及其父亲朱松。朱松曾在安海当过镇监，大力提倡儒学；后来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也常来安海“与父客耆士论经义”，于是“镇人盖勤于学”，后人称为“二朱过化”。

②③《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第104、130页。

怒，突然转身对孩子们“怒斥逐之”，致使一小孩惊慌扑地，受了重伤。此事引起周围居民和行人的气愤，有人喊道：“洋鬼子杀人”！众人簇拥而来。杜嘉德见势不妙，急忙躲入教会堂所，但是愤怒人群冲进堂内，“将牧师拉出堂外，以石击杀，人以其为死，弃之”。<sup>①</sup>其实杜嘉德并没有被打死，只是一时昏迷过去，后来蔡宅主人将他拖入屋内抢救。杜嘉德醒后即叫郑爽替他乔装打扮，躲藏在“福音船”中逃往厦门。杜嘉德返厦后即刻向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报告，英领事柏威林（*W. H. Pedder*）勃然大怒，决定派遣炮舰前往安海镇压。可是，狡黠多端的杜嘉德看到安海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如付诸武力，将来对他“布道”更为不利，因此，他一方面劝阻出兵，另一方面却竭力要求英领事对福建地方官施加压力，由清政府出面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鉴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侵略者是有求必应的。署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在英领事的恫吓与要挟下出兵镇压，并于同治二年六月（1863年7月）出示严禁安海人民反洋教的正义斗争。《告示》全文如下：

署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 周为出示严禁事：

案准英领事馆柏照会：安海教堂前因该处之人，种种为难入教门徒，并党众毁抢堂物，业经照会严办在案。

现据牧师金称，该处教堂经再修理完好，恐被强徒再行生端毁抢，稟请移飭示禁，等因准此。除扎石狮分县飭差巡查拿究外，合予示禁，为此示仰安海军民等知悉：

你等须知外国人现在内地设立礼拜堂，系天津新定和约载明，准其安分传教。官民人等，毋得阻扰。自示之后，你

<sup>①</sup>《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第104页。

等务须安分守法，不得仍前阻扰。倘敢不遵，一经差役拿案，定即按律严办，决不宽贷。各宜凛之，毋违！

特示

同治貳年陆月<sup>①</sup>

### 三 安海教案的影响

安海教案正发生在英、法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安海人民反洋教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抵抗。这是一次由爱国绅士倡导的，有广大市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参加的自发的反侵略的爱国运动，它给西方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晋江地区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影响颇为深远。据《长老会历史》记载，杜嘉德等在安海“大遭窘逐，十余年之困难，教会方始树基，故传道于泉州因以停迟”<sup>②</sup>。然而这场反侵略斗争，由于清政府对外实行妥协投降，对内坚持武力镇压而失败。安海《基督教教堂告示石碑》上刻着“外国人现在内地设立礼拜堂，系天津新定和约载明，准其安分传教”，而对人民的反抗则是“一经差役拿案，定即按律严办，决不宽贷”。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签订的屈辱卖国的《天津条约》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安海人民的斗争精神，推动了泉州、同安、永春等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杜嘉德在安海站住脚根后，便积极地向泉州及其附近乡镇扩张势力范围。但他也跟在安海一样遭到各地人民的激烈反对。同治

---

①《安海志》卷卅五《基督教堂告示》写为清周凯出示，似误。据《厦门志》附录《周公墓志铭》及《台湾通史·周凯传》均云周凯于道光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卒。

②《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第103页。

三年（1863年）冬天，杜嘉德带领郑爽、陈强窜到泉州南门外新桥尾活动，“日则出门布道，听者虽多，而信者绝少”。于是“数日后回安海”。翌年，杜嘉德又带一批传道人员前往泉州活动，其中郑坦只走到五陵地方即被人殴伤，后来在开元寺布道时，群众又向他们扔石头，逼得他们抱头“避入友家得免”。<sup>①</sup>第二天杜嘉德等人赶紧投往惠安躲避，一周后才敢回安海。同治六年（1866年）二月，杜嘉德第三次从安海前往泉州，他吸取了前二次冒失进城失败的教训，先拉拢一些泉州人替他打前仗，比如有个叫谢深的泉州人，“熟识诸事”，由他出面在陈祠对面典得李坦的店屋为讲堂，建立了泉州城内第一个传教据点，杜嘉德便洋洋得意地回厦门去了。后来郑爽等人为了扩大地盘，利用施、吴二姓矛盾，又租到南街头新花山为教堂。新花山原系靖海将军靖海侯施琅书塾，施之于孙中落，卖与吴姓，教士蔡择骤乘机向吴姓认租，不让施姓知道，并在天未破晓之前偷偷摸摸地搬进去，以便掩人耳目。泉州群众对此十分气愤，当即有二百多名绅士出来劝阻，接着又有李孝然、李孝治和李培世三个秀才“到堂诘辩”，并严肃警告说：“不速搬去，将必有焚毁之祸”。郑爽等以洋人作靠山，对此置若罔闻。泉州群众忍无可忍，在十月十九日（11月25日）由李孝治和金作励两位秀才率领七、八十人冲入教堂，把传教士痛打一顿，郑爽、黄择善、郑国梁三人连夜雇车“潜回安海”，翌日一早即往厦门向杜嘉德告状。二十一日（27日）杜嘉德又向英国领事馆报告，要求他们出来干涉。英国领事郁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年）立即向福建地方官施加压力，驻泉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不仅派兵镇压，还出示布告，威胁

①《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第133页。

说：“如有毁抢教堂者，必就地正法”。<sup>①</sup>最后强迫有关人员赔款408元才算了结。

同治六年（1866年）美国归正教公会派传教士前往同安活动时，也遭到当地人民的反对。在铜鱼馆后一间布道所，每天晚上都有群众向它甩石头，迫使它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基督教从泉州传入永春时，“閩永绅士百四班宴集，发出文告，鼓励人心，同力协阻”。他们说：“洋人藉称传道施医，实利我土地，收拾民心”。<sup>②</sup>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传教的真正目的。光绪九年（1883年）基督教从安海传入深沪，翌年法国侵略台湾，深沪有14艘赴台澎的商船被法军劫走，深沪人民反帝热情高涨，于是把设在三乡街的基督教布道所捣毁。由此可见，1856至1863年安海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安海人民的反侵略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 辛亥革命在安海

张 家 瑜

武昌起义一声春雷，唤醒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要革命，要推翻清统治，必须象文学社、共进会一样，先在群众中做好扎实的准备，然后伺机发动起义，一举夺取清统治的地方政权。地处

---

①②《中华基督教历史》甲编第134、149页。

滨海的安海镇，夙有“港湾深邃优良，海上交通四达，通天下商舶，贾胡，……足迹遍天下”<sup>①</sup>之称。由于安海受反动压迫较深，吸取新思想较易，获得新信息较快，准备革命行动较早，在武昌起义影响下，他们打响了福建革命的第一枪。但是，由于革命阵营的内在弱点和反革命的摇身一变，刚刚赢得的胜利果实，很快就丧失了，给人民带来的曙光也逐渐地暗淡，安海重又回到了黑暗之中。

## 一 革命前的安海社会

“安海古称湾海，宋初易湾为安，曰安市，……明曰安平镇，清复安海旧称”。<sup>②</sup>“(清)初未设专官，……雍正七年（1729年），设户部税馆，……八年，增设守备一员，十年，改守备为司，……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晋江县贴堂县丞移驻石狮兼管安海，三十五年，改驻安海镇，……清末设有海关厘金机都构”。可以看出，安海在清末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战略要地。

在交通方面，“安海系泉南之要港，……安平商人足迹遍天下，华侨出国者，破浪乘风，既早飘颻于南岛，……尤多远拓于异邦”。这就说明安海在辛亥革命前，不仅成为我国有数的通商巨港，又是我国著名的侨区之一。

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经济的解体，辛亥革命前的安海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镇。

①②④《安海志·修编说明》。

③《安海志》卷一《沿革》。



早在鸦片战争前，安海鸦片走私已经极为严重。当时，“鸦片之流毒，最甚广东，而次莫如福建”。<sup>①</sup>而福建烟土走私“莫甚于泉漳之民”。而泉漳一带，尤以“泉民贩卖（烟土）之盛，更属数倍漳州”。当时，泉州府属的海口“共计八十四处”。而晋江县却占“有海口三十四处”。<sup>②</sup>可以看出，泉属走私尤以晋江最为突出。道光二十年，刑部右侍郎黄爵滋等奉旨至闽查办，据黄回奏晋江情形，谓：“除该御所指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外，如晋江县之东垵、西头、西岭、西边、溪边、水头、莲埭、岭兜、永宁、高厝等乡”。<sup>③</sup>这13个港口，当时安海一镇却占了西边、溪边两个港口。可以看出，安海不仅是走私重点，而且“附近农村普遍种植鸦片”，结果却带来了“安海人吸食鸦片烟在七八十年前已经是很普遍的了”<sup>④</sup>的严重后果。

随着鸦片流毒而来的，安海镇却同时出现赌博成风，妓馆林立。从这明显看出，鸦片战后，安海社会已出现了三害横流的严重局势。

自从福厦被辟为商埠之后，安海成为厦门通往泉州水陆联运的重要港口。当时安海已出现了买办性质的商行。原来的封建工商业受到破坏，农村生产遭受阻碍。<sup>⑤</sup>以往安溪、南安、德化、大田等县货物都从同安转运。但从鸦片战后，“各商户遂向晋江之安海交易，安海商业繁盛而同城之商业日就凋零，今仅存十之一而已”。<sup>⑥</sup>这里所指买办性质的商行是指香港郊的兴起，

---

①③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卷十三《确查海口烟贩情况疏》。

②沈汝翰：《戎马风涛集》卷六《禀查办鸦片烟土及各处海口情况疏》。

④⑤郑士美：《辛亥革命前后安海社会见闻杂记》，《晋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⑥《同安县志》卷六《城市》。

“凡是贩运外国货的都把它归入这一类”。<sup>①</sup>当时从外国运来的舶来品洋布，“把手机织的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当时水郊、福郊、漳郊，所经营的商品都先后有了洋货前来代替”。<sup>②</sup>这就说明了安海是近代封建经济最早解体，受帝国主义经济冲击较突出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加紧对安海进行宗教、文化侵略。1854年，“英国人牧师杜嘉德由厦门来安海，……开始传教”。<sup>③</sup>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法宝之一的基督教的传入，一开始就遭到安海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在兴泉永道的告示就暴露出：“安海教堂因该处之人，种种为难入教门徒，并党众毁抢堂物”。<sup>④</sup>但是也看出，“基督教传入以后，西医师、摄影师，接踵而来，白话字，基督教学堂也逐渐在安海生根，在人民生活中引起了新的变化。”<sup>⑤</sup>这就是帝国主义藉办学校、医院，了解中国情报，培养为他们服务的买办。

清政府对外丧权卖国，对内加紧掠夺。当时安海文官有分县，武官有都司和风官，人们把这两个机构叫做大衙门。当时压在安海人民头上的有“税务官，粮盐，厘金，海关以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捐税局是由强豪承包的，……手下都有一批为虎作伥、鱼肉人民的爪牙”。<sup>⑥</sup>再加上封建械斗成风，官吏则借口查办而欺压百姓，种种逆行，使安海人民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

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统治阶级残酷压榨，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其中规模较大是响应太平天国革命。1853年4月15日，

①②⑤⑥郑士美：《辛亥革命前后安海社会见闻杂记》。

③《安海志·记事》。

④《安海志·基督教教堂告示碑文》。

“安海附近东石乡会首蔡俭、伪军师陈文”率“‘贼匪’数千人入安海街，毁折都司营署，焚烧新街陈益升典铺，都司李瑞安逃走萧下乡，分县避居民屋”。<sup>①</sup>这次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在安海的统治基础，锻炼了人民的斗争意志。辛亥革命在福建打响了第一枪，正是革命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资本获得了初步发展。安海城乡商品经济也同样在辛亥革命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士绅、商贾相继开行设郊，香港郊的发展，“在香港或神户均有联号，办户或买手”。<sup>②</sup>“香港郊的资本，直接间接都和华侨资本有了关系……当时侨汇投入商业资本的除侨汇业本业以外，与华侨合资，或由归侨独资经营的商户也已陆续出现”。<sup>③</sup>这说明华侨资本家也在家乡参与各种经济活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安海民主革命提供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也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辛亥革命前，他们也开始为维护本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进行不同程度的斗争。

1907年2月，官绅合办第一所新式学校——安海养正丙等小学堂正式开学了，以后又相继出现一些商办、民办、侨办和教会办的学堂。它对于新科学、新思想的传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些青年学子一旦从风气闭塞的学塾走进学堂，对孙中山的民族民主运动，开始“从日本、南洋和港澳的归侨同乡口述或携带回来的报纸而有所了解”。<sup>④</sup>对《猛回头》、《警世钟》、《革命

---

①《安海志·记事》附文。

②③郑士美：《辛亥革命前后安海社会见闻杂记》。

④陈勇荣：《辛亥安海的革命活动与群众暴动》，《泉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重要的革命书籍，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安海，如桂华山父亲就把邹容《革命军》改为《图存篇》带到家乡安海，从而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火焰，在僻处东南一隅的安海，在漫漫地燃烧着。

## 二 革命的准备阶段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和清政府立宪骗局的被拆穿，革命种子也加紧在安海散布着。当时来安海的革命党可分两大类：一部分是在海外参加同盟会的安海一带的华侨，如陈清机在日本，桂华山之父和蔡鉴在泗水，他们为了家乡的光复，纷纷回安海进行革命活动。另有内地派来的革命党人，如许卓然原在厦门紫阳学堂当教员，为了家乡光复，活动于泉州和安海两地。<sup>①</sup>当时孙中山也从西南派广西蒋某某来安海活动。来自各地的革命同志，经过彼此努力，很快就在民主革命的共同目标下统一起来。

这一时期，他们主要做了几件事：

（一）组织革命力量：经过来安海革命党人的努力，到辛亥革命前夕，新发展的同盟会会员，计有陈少宝、陈铁、杨丙、高洲、陈池、林坦、林清机、蔡温、柯铁、曾赏等20多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店东、厨师、散工、兵勇、归侨、商人、农民等。

（二）建立联络点：为了便于联系，开展革命工作，决定以会员陈少宝的菜馆作为联络点。

（三）秘密召开会议：郊外凤山祠不易暴露，每约半年，革

<sup>①</sup>陈德贡：《民主革命者许卓然事略》，《晋江文史资料》第四辑。

命党人在这里集会一次，讨论反满道理及当革命形势发展时安海必须伺机而动诸事宜。

（四）成立革命武装：10月10日武昌义旗一举，安海也加紧建立革命武装，由许卓然、陈清机、陈少宝组织秘密团体——“革命军”。广西蒋某也带来写着“革命军”的黄布章，并告示“9月至10月就要起事，要做好准备”。<sup>①</sup>此后安海革命党人密切注意革命形势的发展，伺机而动。

### 三 安海光复的经过和意义

武昌起义，象阴沉天空中的一声巨雷，震动了中国的大地。各个省区的革命浪潮翻腾，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安海革命前夕，全国已有一半省区宣布独立，消息传来，民气大振。

早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安海地方广大群众就有9月初和9月中要拆毁衙门的传言，但这些酝酿没有被当地官员所发觉。11月7日晚上7时，驻安海的防堵兵数人在城隍宫杏芳林酒店喝酒，酒醉与酒店人员陈长（西宫人）发生争执，清军气焰极为凶狠，于是在群众中长期积压的怒火立即燃烧起来，自发地把酗酒闹事的士兵包围不放，当时曾任过汛防官的颜大颂与经常和他在一起的20多个乡民，想前往劝阻，但立即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打跑了。“革命军”蔡温见事情大有可为，急往通知杨丙、柯厅、曾贲、陈铁等人，立即赶往出事地点，把群众革命行动引向纵深发展，他们混在人群中，大声喊“打”，这一喊，喊出了群众共同的心愿。这一群为非作歹的防堵兵眼看群众怒火愤发，凶焰大为

<sup>①</sup>陈增荣：《辛亥安海的革命活动与群众暴动》。

下降，像斗败的公鸡一样，慌慌张张冲出人群，从杏芳林酒店直跑下来。跑进楼仔后陈少宝的菜馆里躲起来，这时激愤的群众包围了菜馆，人越聚越多，喊打之声震天。这些防堵兵见势不妙，又冲出人群逃回驻防地。群众也紧追围住都司衙和汛防营所，人数发展到二千多，喊打之声震撼山岳。

清军驻防地见到激愤的群众像洪流一样汹涌而来，非常震慑，只好紧闭大门，求保安全。可是广大群众已经迸发出来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下，都不约而同地捡起周围的大小石块，象冰雹般飞向武营，撞击紧闭的大门和武营的屋盖，恨不得把这群害人虫彻底砸烂。初时清驻军想用消极的紧闭大门来平息众怒，因此暂保持箴默。但是群众的怒火越烧越旺，于是又改用武力恫吓，突然大门敞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从营里冲出，向天发射数枪示威，为首一人两手挥动两把大刀，左右开弓，前面群众后退无路，当场砍伤数人，最后才匆匆退入营中，照旧紧闭大门。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吓退群众。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群众看到战友受砍伤，怒火烧得更旺，加紧攻门。这时清驻防兵见大势已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好从武营后门潜逃。营守都司李丹臣不在，驻防地成为空营。分县吴会英见大势已去，也溜之大吉。

在加紧攻门时，革命党人蔡恩身先士卒，手持短刀，抢先翻墙而入，于是暴动群众冲进武营，立即放火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小武衙门烧掉，接着又捣毁在大埕头的粮局和分县衙门，最后冲到海关欲拆毁海关，后经有人劝阻未毁。此时，天已将明，群众乃渐散去。

安海的光复，在福建辛亥革命史上是件头等大事，但如没有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声威，要保住这个胜利果实是不可能的。首先，封建势力企图嫁祸给革命党。杏芳林店主陈世勋怕清军卷土重来，采取暂时逃避，暗中指使陈氏家族谋士陈国书，书写张贴

假《革命告示》，把革命暴乱的责任推给革命军。其次，清统治者的安海代理人也在磨刀霍霍，暴动的第二天，就从泉州方面传来李丹臣正在纠集人马，准备前来镇压。但是形势的发展，福州、厦门、泉州紧接光复，使李丹臣内心虽然想复辟，但也不敢妄动了。

安海一光复，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就在10日成立联乡会，23日改组为保安会，打击“海盗”李盛来安骚扰，社会治安大有好转。

革命首要问题是政权的建立，14日决定设军政分司，推陈瑞东负责，2月2日军政分司改为分县，并另推陈秩臣负责。

为了支援安海革命政权，在经费上，华侨蒋报料“捐资千元，助安海人士办善后”。<sup>①</sup>广西蒋某某也“继续寄款接济”。在军事上，23日华侨蒋报料和杨山光带少数民军来安海。12月12日，福州革命军宋渊源带兵到安海。<sup>②</sup>于是安海政权呈现出稳定局面。

随着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安海革命政权也受到严重摧残，残渍余孽原知县李襄国，原汛守都司李丹臣，原广东协办、海南镇台杀害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刽子手黄培松，被委为福建下游督办，进驻安海，勾结地主黄登龙，残酷镇压革命人民。因此，安海成为反革命镇压的重灾区。革命党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像昙花一现地失败了。

革命虽失败，但安海的光复，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革命党人的英勇战斗，则为安海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①《辛亥光复泉州革命先辈传统》，《泉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②陈增荣：《辛亥安海的革命活动与群众暴动》。

首先,安海的光复,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的光复。安海以一地能够打响了全省的第一枪,这给全省的革命党人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向全省清统治者敲响了丧钟,预告了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革命的进程也按预期的顺利发展,12天后,就有福州、厦门、泉州等全省主要城市的相继光复。

其次,安海的光复所带来的民主革命精神在安海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如1912年晋江知县李襄国派其弟在安海坐收贾铺捐,引起全街罢市,并组织以陈清机为首的商务维持会共谋应付。1915年袁世凯称帝,安海革命志士在陈清机等人领导下鼓吹讨袁。1927年由郑士美等组织“雪鸿吟榭”,无情揭发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可以看到,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浪潮,从未象现在这样欢快地跃动过。

再次,安海的光复,也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短短几个月中,曾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兴办实业。从安海来说,光复后百业俱兴。1912年安海成立商务维持会,后改为厦门商务分会。会长陈清机本着孙中山的“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首先道路之筑造”的教导,于1919年,发起创办全国第一条民营汽车路——闽南民办汽车路有限公司。因此,安海民族资本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

#### 四 结束语

安海的光复,是和安海交通的便利,新思潮较早涌入和旅居国内外的革命人士为了家乡的解放,回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安海地处厦门对岸,厦门、福州开辟成为通商口岸,安海首当其冲。结果自然经济较早解体,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积极参加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运动,这样,



福建光复革命的第一枪，必然落在安海人民的身上。

安海革命政权的昙花一现，一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破坏，轻易地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另一面也说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革命任务，这个重担必然要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身上。

安海的光复，也同样和广大海外华侨的大力援助是分不开的，不少华侨从政治上经济上积极支援安海的解放事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华侨的援助，安海的光复就要艰难得多。

安海光复的胜利和失败也告诉我们，胜利果实来之匪易，必须珍惜前人的革命成果。

## 安平施钰与《石房樵唱》

吴 幼 雄

前年寓京，偶涉《石房樵唱》，通读全书，摘要记录，今辑录部分，提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石房樵唱》作者施钰，为清末安海镇的著名爱国文人。《石房樵唱》吟颂了祖国秀丽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反映了清末鸦片战争前后安海和泉州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安海港与台湾的关系。因此，它是清末安海镇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可惜，1983年修撰的《安海志》，可能因资料不足，没能给施钰以适当的地位。

据安平施钰撰的南浔施姓《续修房谱序》记，施姓“宋绍兴

进士大理寺评事公，分福清县高楼乡，来居晋之十八都，遂为浔海族祖”。<sup>①</sup>该谱云“十六世太高祖鹿门公（施秉，襄壮公平台奏勋，诏授鹿门公左都督，诰封明威将军）方徙安平”。后施秉任职台湾，家居台南镇北坊施厝衙。族谱又云“高祖济亭公（施世榜），娶安之金墩黄，继配曾姓，遂家焉”。自此，南浔（衙口）施姓一脉定居安海镇。

施钰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6岁“从师造施藜堂参军家塾”，15岁由安平港首次“乘船东渡”台湾应试，此后“常客海外”（指台湾），自嘉庆八年至道光元年（1802~1821年），凡20年中，施钰“常以岁科例而羁双岛（台、澎），且七困罔棘，两荐莫售”，即他在7次乡试和两次荐举（嘉庆二十一年和嘉庆二十三年，即1816年和1818年）中都落选了。此20年中，他为应试往返台湾14次。道光四年（1824年），未仕进而先丧偶。以上种种，足见其科举仕进的道途是十分坎坷的。科举的厄运和求名心切，曾使施钰“望洋叹气，即矮屋关心”。<sup>②</sup>在严酷的科举仕进制度下，在强烈的功名欲望驱使下，科举仕进虽身陷逆境，但仍然怀有大鹏“扶摇九万里”、“水击三千”<sup>③</sup>的雄心壮志。

施钰的先祖因历官台湾，在台湾建有“文昌阁，……以千亩充书院膏火。……开水圳以达沙连，八保之课田永赖。……修圣庙于凤彰，构天坛于彰邑，献己地为鹿港圣母宫，捐千粟作常平社仓谷”，又有“万寿亭香火乏资，置租以奉”等的义举，更有部分族人在台湾世代居留。借此关系，又有本人的奋进，他于道光四年

①②南浔施钰：《续修房谱序》，道光二年撰。

③南浔施钰：《石房樵唱》卷二，道光三十年版。

(1824年)以廪生拔为台湾贡生,授官盐课大使。数十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时年37岁。道光三十年(1850年)卒于泉州北山别业(泉州县后街彩笔巷),享年62岁。

施钰费20年光阴,挤进了清末儒林的行列,其时正值鸦片战争的前夕,英帝国主义以鸦片为武器,向闭关自守的清政府进行侵略。鸦片走私严重的泛滥,泉、漳、莆三郡沿海粮食又连年歉收,皆仰给于台湾米粮。社会上“各大村棍徒,藉端拦阻米谷,嗷嗷待哺,滋生事端”,<sup>①</sup>英政府看准“福建省就是从富庶的台湾吸收大米以满足其大部分消费需要的”,<sup>②</sup>首先提出占领厦门,截断台湾米粮供应,“舰队还可以劫夺粮船”。<sup>③</sup>其次,看准沿海盐业为清政府极重要专利,提出“劫夺盐船”,“迫使(清)政府承认我们的任何条件”。<sup>④</sup>施钰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以“不才谬许膺懿尹,惟抱冰兢报圣君”的诗句,表明自己抵抗侵略的决心。坚定地与清政府的禁烟派站在一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英舰多艘窥视泉州永宁,泉州城内警起,<sup>⑤</sup>清政府宪檄黄退岩,委护泉城,躬亲巡守,民赖以安。施钰对其正义行为赠诗曰:“府制书旁午,干城义正申。金汤资永固,盘石奠惟均。著绩逾群策,安居遍庶民”,<sup>⑥</sup>给予黄退岩以极高

---

①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二《愚王慎初郡伯招商接济民食公呈》。

②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③《英国蓝皮书》,1939年11月2日,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附件,《鸦片战争》(二)。

④《英国蓝皮书》,安德鲁·韩德森先生致G·H·拉本特函,利物浦,1839年10月21日,《鸦片战争》(二)。

⑤《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二。

⑥《石房熊唱》卷二《黄退岩司谕征诗启题赠》。

的评价。自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期间,施钰在台湾坚守盐运大使职务,三年不归安平,如自叙所云“以庚子渡海,三年未归”。<sup>①</sup>他是一个忠于职守的爱国地方官员。

施钰既是道光间福建地方爱国官员,又是道光间安平诗坛上的一颗明珠。道光三年(1823年),他于安平“水绿山青”书塾把247首诗辑录成壹册,并由他的朋友倪肇元作序,诗集取名《石房樵唱》。按作者的谦意,是“辑其诗草附以杂,著名曰石房樵唱,示不敢居作者之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施钰又以其“古风各体及限字短文诸咏”共73首“以补樵唱卷中之作未备”,<sup>②</sup>又于台湾作自序辑入《石房樵唱》,增辟为卷之二。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即他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又以晚年所作的试帖诗46首和七言律14首,计60首,收入《石房樵唱》为卷四。可惜《石房樵唱》未及问世,施钰即离开了人间。其书后由侯官翰林郭柏荫作总序,由其儿子施名成,女婿苏尧臣同校出版。

施钰《石房樵唱》诗作大体可分为几类。

其一,触景言情,览物寄咏,发幽古之思而作,如:

#### 《中秋日偕友游灵源山》(并序)

灵源山在邑治五都,唐道士蔡明浚居之,一名吴山,又曰吴明山,宋吴氏昆季隐此,乡人祠及二媪。山雄跨四里许,高出东南诸山外,顶高大而平,亦名太平山。上有石曰望江石,南眺大海,可历数百余里;北顾郡治山川城郭,历历如绘。下有灵源庵,宋林知读书处,知卒葬焉。又有灵

---

①《石房樵唱·自序》。

②《石房樵唱·又序》,道光壬寅(1842年)作于台湾。

泉井、紫云峰、紫云室，其地四时花木荫映。南一支为乞雨山，上有七星墩，乡人祷雨于此，掘得炭者即雨。元王翰，明王慎中、苏浚、黄克晦、张瑞图俱有诗。

峻嶒绝巘削天开，叠石阶盘路几廻。  
秋色自随今日眼，林花为忆旧时栽。  
非关令节偷闲至，剧爱名山带笑来。  
信有烟霞携满袖，不知身已到蓬莱。

《闽书》云，南望诸山，惟吴孤横角四山，知名吴孤即灵源山也。（原诗注）

闲寻幽径趣悠然，古岫斜通寺后泉。  
万载江山诗客咏，一裘香火菩提缘。  
宿黠木叶供朝爨，鸟并歌声杂暮蝉。  
指点宋唐高隐地，苔碑墓草自年年。

我本山人耽古迹，看山山意合幽栖。  
绝无人语喧虚谷，听得松吟奏故蹊。  
有兴莫论峰近远，多情遑问日东西。  
振衣试上望江石，墟市城湫入眺低。

挥毫愧乏张吾军，村曲惟应樵采闻。  
此去归途风外冷，瞬时暝色月中分。  
后游指屈重阳届，远水波涵夕照曛。  
回忆尘襟何处涤，太平山上看飞云。①

嘉庆十一年（1806年），施钰作《安平怀古》（并序）4首（后附明工部尚书何乔远《秋日安平八咏》）。《安海志》辑入

①《石房樵唱》卷一。

卷三十六《诗咏》，但遗漏其序，现补记《安平怀古》序于下：

“安自宋迄今文物代兴，其胜迹之在人耳目间者难更仆数矣。第盈虚消长之理，原于天而备于易，虽时势使然毋亦理定故也。予性嗜古，幼时听父老谭述往行，即侍立忘倦，后有记忆，辄不能忘情，读书至忠孝节廉事，如果投猿怀，紧抱不忍释手，咀嚼其味，中边皆甜。故于今昔之慨其言也，深诚不自知其何以然而然也。近就见闻偶及，得诗四章，想樵歌牧笛固无当乎雅颂之称，而鸟语虫吟祇自鸣其春秋之遇。既非爱有所偏，亦非事有所择，信手书来，难逃挂漏之罪，惟愿一二同志谅我嗜痂，原其管见，共为网罗旧典，舞蹈太平。则传人传事，顿令此地增辉，所为风化悠关，亦性情可托者，岂外是欤？若多文为富，有志书在，博雅君子得所取焉。丙寅七月既望。”<sup>①</sup>

以后，施钰又作《增订安平十景诗》（并序六言律），<sup>②</sup>这10首六言律诗并序，辑入《安海志》卷三十六，但其署名为“清·佚名”，<sup>③</sup>实为施钰所作。借此机会，又替《安海志·增订安平十景诗》补阙、校对于下：

“其诗如思有以补之”，诗如间应补“阙”字（第466页，第1行）。

“此即旧八景而为十景者”，而为间应补“增”字（第466页，第13行）。

“其与灵岩于对列”，“于”应改为“相”字（第466页，第

①《石房樵唱》卷一《安平怀古》（并序）。

②《石房樵唱》卷二《增订安平十景诗》（六言律并序）。

③《安海志》卷三六（三）其他《增订安平十景诗》（六言律并序）清·佚名，第456页。

15行)。

“将效绣虎之前驱”，“将”应改为“得”字（第467页，第4行）。

《石井书院》的“居民沐泽于同”，“于”应改为“相”字。

《泉南佛国》的“西方原空色相”，“方”应改为“法”字。

《山寺晨钟》，“晨”应改为“暮”字。

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二十八日，施钰自台湾王公港泛舟返安平，“涛声迅发，自晦及朔，风雨坏艘。九月初八日午晴，后泛归。十二日抵深沪，越宿旋里，念吉佑之在天，告平安而及物”，狂涛过后，碧波万顷，化险为夷，喜形于色，得诗四首。

巨浪喷沙飞，秋航泊未归。  
常将忠信凛，不计雨风违。  
雾拥潜虬吼，涛翻画鹢危。  
逢晴昭海若，咫尺有天威。

向晚纵归舟，乘风不少留。  
篷斜低照影，波漾碧浮沤。  
扞虱梢公傲，目虾水母游。  
阿班登眺处，笑指众山头。

阿班，丹中司瞭望者。（原诗注）

侧坐浑忘倦，天激海气遥。  
云依关锁塔，日射往来潮。  
撒网渔船簇，书空雁字飘。  
故乡秋亦好，邂逅笔难描。

假道经浔海，言旋藉笋舆。  
到门喧旧犬，款客市新蔬。  
悲喜从头说，平安拜手书。  
何如林下叟，皓首赋闲居。①

此外，施铤还有许多咏祖国、家乡山河并怀古之诗，诸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晚上沪江壁山寺》诗，《孤山绝顶观海》诗，《游清源洞观孔泉至晚归》四首，《弥陀岩读侍郎漕督浔江公题石》三首，《鹭江南普陀寺晤省己师话》三首，《蔡惠忠公庙碑》、《峡江怀古》、《五音石》、《小西湖开化寺》四首和《鼓山寺谒闽忠懿王像》等，都是较好的览物寄咏诗，而且诗的格调也较高。

其二，咏时令、花草、禽虫、楼亭。即景赋诗，活泼生动，生气盎然，栩栩如画，又寓意其中。如道光十一年（1831年）正月，作《初春晓雪》云：

庭际雪霏霏，随风冷逼帏。  
水融宜沦茗，花落每沾衣。  
瑞兆丰年庆，春生绮阁辉。  
晓寒无限好，酿得老梅非。②

又有春分夏至淫雨迷濛，偶晴，作《喜晴》诗四首，其一首云：

喜我山人逸兴饶，刚逢山雨霁今朝。  
看山踏屐青山上，侧听山农唱采樵。③

道光十六年（1836年），施铤于泉州北山居别业落成时，作诗八首，其中《作舟楫亭》一首云：

一亭一树俨桅舱，转旆遮栏廻筑墙。

①③《石房樵唱》卷二。

②《石房樵唱》卷一。



局改也堪作舟楫，果然本地有风光。①

又《书叶楼》云：

陈紫江红荔灿园，绯桃碧枣恰当轩。

深秋木落霜沾柿，书叶楼头噪鹊喧。②

又《景物八咏追和鸿胪督学陈又绳先生韵》其中有《篱边蛭笛》诗云：

亭畔何人弄笛时，深宵蛭蚓响东篱。

微吟如向竹中出，得气任从肚里吹。

枯垠清声嗤仲子，黄泉静处效桓伊。

不须听尽梅花落，倚遍楼栏始觉疑。③

又有《端阳坐雨》二首诗云：

日夜皆零雨，偏逢令节多。

簷声听不尽，莫问采莲歌。

当年古渡头，箫鼓斗龙舟。

此日苍烟暮，江空水急流。

原诗注：采莲，是日乡人抬有木刻龙首，搴旗击鼓游唱街道，谓之采莲。

又有《中元夜醉后吟》云：

荒斋独酌，邀月为朋。时第一灯挂壁，淡云横空。枪落叶之喧，风与虫声而相答。此情此夜，真个令人无在不魂销也。

自昔明灯逐水流，孟兰盛会集江洲。

而今月夜凉如许，不见招魂古渡头。

①②《石房樵唱》卷二。

③《石房樵唱》卷一。

飒飒西风绕莫经，芳林绿叶半凋零。……

伤心更值心伤候，满砌虫吟不忍听。①

此外，施钰《石房樵唱》还有惜别吟、悼忘诗、悲别离、题画诗、限字回文等，在此不赘述。

其三，《石房樵唱》卷四附有杂录，有《续修房谱序》和《浔海施氏二房小宗碑记》，记载施姓的源流，是研究古代台湾、泉州、安平地方史的好材料，特别是研究古代安海港史的珍贵资料。

最后，特意提一事，即施钰撰《募修安平龙山寺正殿疏》，亦收入《石房樵唱》，又为今《安海志》所遗，在此补阙。

#### 《募修安平龙山寺正殿疏》

泉之古刹，唯安平龙山寺为最。供奉千手菩萨，灵威夙著。碑云隋朝重修，阅今千有数百年矣。寺凡三进，外有钟鼓楼、廊庑、禅室，次第毕具。明季遭倭毁，而正殿岿然独存。可见佛力之普大，神功之赫奕者焉。

国朝平台后，宫傅将军侯震壮公偕侄督世职讳韬公出资重修，功载郡志，而庙貌始称无恙。雍正年间，乡绅外翰司城施讳世榜公捐银倡首。进士正安州司马颜讳仪凤公撰记又修一次。特地居高敞，四面受风，复遭蚁蠹，梁栋易伤。于乾隆己酉年，敝师募缘再修。时第补苴罅漏，未敢大兴瓦木，乃屈指于今，又四十馀载矣。历年既久，患蚁如初，屋瓦欹裂，不蔽风雨。渐至座前渗滴，香火难供。殿内湿流，拜跪无处。苟非有佛力保护，安在无倾覆之虞乎！衲承师住持，目睹心危，因奉都之人士，敦促募修。乃卜吉于去秋，七月十四丑时兴工。赖佛化有缘，善

①《石房樵唱》卷一。

信者皆到寺示输，计有四百多金。已将前进山门及两房禅室修筑完好。惟正殿木料高大，工用浩繁，统计修费非千馀金不可。纵内地四方募化，未知何日告成。伏思鹿港贵地，素称殷富，又多好善。凡为事为商，渡海而来者，莫不感念神祐，托庇清安。况鹿港龙山寺，亦奉千手佛祖，原系安平传炉，香火称盛，家户祈祥。是乐助安平之龙山寺，即诚敬鹿港之佛祖，其功则一，其报不殊。敢布广长舌，普恳诸护法，共襄盛举。随愿喜捐，务期登簿，以凭勒石。夫耘耨不分多寡，福田莫论啬丰，力行善事，定获祯祥，慈航普济，降鉴非遥。谨疏。<sup>①</sup>

施钰最终因某些客观原因，没能亲自往台湾鹿港劝募，正如《募修安平龙山寺正殿疏》注释所云，“代住持作。原拟往鹿港，后按费颇敷，不果行”。但它反映了道光间安平港与台湾鹿港的“人缘”、“文缘”关系之密切，确实是安海港史中不可多得之资料。

## 光前裕后的安海港

许 在 全

安海港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秀丽的闽海之滨。它虽然属乡镇小港，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却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两晋以后，南安丰州逐渐成为泉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

---

<sup>①</sup>《石房樵唱》卷四《募修安平龙山寺正殿疏》。

化中心，安海港就已经显示出台柱的作用。唐开元六年（718年），泉州设立州治，代丰州而起。这时泉州虽有后渚港作为自己的出海口，但安海港仍不失其作用。安史之乱以后，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西亚诸国改以海道与我国进行贸易。阿拉伯人自印度洋到太平洋进入我国南海，其中许多船只就停泊在安海港，由陆路转至泉州。安海至泉州一路，商旅往返，络绎不绝。今之新店，即唐开元的“售货之场”；池店是“蕃商之馆驿”；五店市（今之青阳）是“蕃商集行”、“陆路中站”；畚店即“集市之所”，所有这些，都是唐代安海港促进泉州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

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港的兴盛，安海港作为泉州港的支港，其经济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据《安海志》记载：“安海于宋全盛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躬”。南宋绍兴时期，安海建造两座工程浩大的跨海长桥，东桥三里，西桥五里，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既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又便于内陆货物的集散。宋元时期安海港的迅速发展，对周围乡村经济的繁荣，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明初实行海禁，作为官商控制的泉州港迅速地衰落了。为了保持和发展自身的经济利益，安海港却一反而为私商活动的大本营。这一时期出现的安平商人，据傅衣凌先生分析：其势力足与徽州商人相匹敌。甚至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徽州商人还有所不及。因为徽州商人主要活跃于国内市场，而安平商人不仅“贾行遍郡国，北贾燕，东贾吴，南贾粤，西贾巴蜀”，而且“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兴起，安海港与月港海域相通，同样都是以民间贸易为其主要特点，因而关系密切，联成一片。及至明末，安海港且有独占鳌头

之势。郑芝龙在安海港建立庞大的贸易基地，垄断海上贸易，成为富甲东南的第一号人物。他拥有部众三万余，帆船千余艘，纵横海上。郑成功刚以“石井郑记”，组织海山两路，设“五商十行”于各地，往返东、西二洋。明代安海港的海上贸易，兴盛至极，影响很大。

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王朝采纳黄梧的“平海五策”，颁行迁界令，强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片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安海被夷为废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始令居民回归原地”。安海人民回归故土，重建家园，便迅速发展经济，恢复海上竞争活力。他们北自烟台、牛庄，南至潮汕，远达吕宋、新加坡，尤其是与台湾往来极为频繁，重新展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生机。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厦门二地开埠，安海的“香港郊”应运而生，直接与香港、日本进行贸易。1898年前后，安厦之间汽轮通航，安海与厦门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泉属各县华侨的出入和货物的进出，使得安海和厦门的联系更加密不可分。

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广泛的经济联系，是安海港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安海港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之区的围头湾内，是个避风的天然良港。它由安海、东石、石井、水头四个滨海的侨乡集镇组合而成，联系着广大的闽南侨乡和内陆各地，腹地辽阔，有雄厚的侨资和丰富的物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安海港的地位也曾几度低落，但它总是枯而复荣，衰而不竭。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大好时机，在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下，今日的安海港，工厂毗连，工业基础坚实，产品已经远销国内外。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繁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名胜古迹修葺一新，旅游资源丰富。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滨海的历史名港，

它正在发挥着厦门支港的作用，成为晋江与厦门联系的基地，同时它又作为晋江上游山货、矿产的重要出海口。我相信，只要人们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它的经济资源、人文景观、山川地理，便会被它深深地迷住；只要对它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想一想它的发展前景，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颗闽海明珠一定能拭去岁月的灰尘，光前裕后，大放异彩。

## 略论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

庄景辉

有宋一代，尤其是到了南宋，是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时期。探讨这一时期泉州与海外进行贸易的经营形式、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及其兴盛的原因，对于了解历史抑或借鉴于今，无疑都是很有必要而非常有意义的。

### 一

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经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封建政府因“所得动以百万计”而极为重视通商海外，而且，垂涎于奇珍异宝的达官贵人和图牟暴利的豪家巨族，以及谋求生计的民间百姓，都从事海外贸易活动。

接待海外“朝贡”使者，受理外国“进奉”货物，是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经营形式之一。海外诸国遣使者来宋“贡方物”，

朝廷给予免征税收的优惠，并“回赐”礼品。这样的“朝贡”，实际上是一种“不过利于互市赐予”的政府间贸易。<sup>①</sup>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确立了作为对外贸易港的重要地位。此后，无论是泉人贾海外，还是蕃舶至泉州，再也不必寄港广州，而可以直接通航了。为了扩大海外贸易，朝廷曾专门下令，让泉州市舶司以政府的名义同海外国家联系，招诱南海诸国入贡。《宋会要辑稿·职官》载：

据本寺（鸿胪寺）状称，契勘福建路市舶司依崇宁二年二月六日朝旨，招纳到占城、罗斛二国前来进奉。

这种招诱活动，卓有成效，连罗斛（今泰国南部）这样“自来不曾入贡”<sup>②</sup>的国家也来朝进奉。继市舶司设立之后，宋朝政府又于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置“来远驿”，<sup>③</sup>把泉州作为接待海外“朝贡”使者的一个重要口岸。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国向宋“进奉”，朝廷便下诏让使臣免赴京城，令泉州官员代表政府给予热情款待。<sup>④</sup>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前来“贡方物”，宋廷同样委泉州负责受理。<sup>⑤</sup>许多贡使运载大量的物货在泉州登岸，并由这里起发京师。来南宋“进奉”的占城使者，一次运到泉州的货物，就有乳香十万余斤，其他香料数千斤，还有象牙七千多个。<sup>⑥</sup>通过这种由封建政府经营的以“朝贡”形式出现的贸易，输入泉州的各种海外物货，其数额是很惊人的。

权贵官僚私牟海外贸易之利，是经营形式之二。权贵和官僚经营海外贸易为宋朝政府所严加禁止。然而，尽管宋廷一再申令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一《四裔八》。

②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十。

⑤《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三佛齐》。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十一。

“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严禁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活动，<sup>①</sup>但这种现象却不能杜绝。特别是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从镇江移置泉州<sup>②</sup>之后，这种经营形式显得更为突出了。为了满足奢侈生活而追求珠宝香药，为了挥霍蠹耗而转买海外物品以牟取暴利，这些皂族宗室仰仗政治上的权势，不仅对“以命易货于鯨浸万里之外，幸登于岸”的商人“重征”、“强买”或“陷之罪而干没”，<sup>③</sup>甚至“夺贾胡浮海巨舶”；<sup>④</sup>而且，或“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sup>⑤</sup>或“遣亲信于化外贩鬻”，<sup>⑥</sup>更是趋之若鹜。正如南宋两度出知泉州的真德秀所说，宗子“抵法冒禁，色色有之”。<sup>⑦</sup>政府的禁令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权豪官家私营海外贸易者更不乏其人，此从朝廷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便可窥见一斑。

民间商人兴贩牟利于海外，系经营形式之三。这种私商经营海外贸易的形式在宋代是相当普遍的。<sup>⑧</sup>政府极力鼓励这种商贸活动，但它又是在市舶司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其经营形式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独资”，即采用自己的资本，打造船只，购置货物，招聘船员乃至纲首（即船长）从事海外贸易。如王元懋便是独资经营的典型例子。《夷坚志》载：

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祇役僧寺，其师教以南番诸国书，  
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

①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

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

③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十九。

④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

⑤《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⑦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

⑧《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七。



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sup>①</sup>

又如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将自己的船壹只，请集水手，欲往日本国，转买回货”。<sup>②</sup>这种独资经营者，可以说都是地方上的富豪之家。二是“合本”，乃共同出资，合股经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据《淮海集》载：

林昭庆，泉州晋江人也。少蹻驰，以气自任，尝与乡里数人相结为贾，自闽粤航海道，直抵山东，往来海中数十年，此用甚饶。<sup>③</sup>

又据《夷坚志》载：“泉州商客七人：曰陈、曰刘、曰吴、曰张、曰李、曰余、曰蔡，绍熙元年（1190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sup>④</sup>等等。这些人有不少是想通过海外贸易发财致富的中、小商人，还有一些是谋求生计的无地或少地之民。无论是“独资”，或是“合本”，民间私商经营的海外贸易，在泉州市舶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王元懋一次贩到的沉香、真珠、脑麝等货物，就“价值数十万”。<sup>⑤</sup>

泉州人们从商致富的情形，犹如刘克庄作《泉州南廓二首》所吟：“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惟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sup>⑥</sup>他们当中的确出现了许多象“致赀二万

---

①⑤洪迈：《夷坚三志》己卷第六《王元懋巨恶》。

②〔日〕《朝野群载》卷二十《大宰府附异国大宋商客事》，转引自陈高华等《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③秦观：《淮海集》卷三十三《庆禅师塔铭》。

④《夷坚三志》己卷第二《余观音》。

⑥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

万”的泉州杨客，①“获利百倍”的泉州纲首朱纺，②“费用甚饶”的晋江人林昭庆，③“其富不贲”的泉州人王元懋④等这样的暴发户。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宋代泉州民间私商经营海外贸易之盛况。

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就是以这样的几种不同身份者的不同经营形式与海外各国通商往来的。

## 二

宋代通过海路与泉州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是相当广泛的。成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云麓漫钞》，记述了南宋中期常到泉州贸易的海外国家有31个，即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秬、三佛齐、真腊（真里富）、三泊、缘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渤泥、阁婆、占城、自丽、木力干、宾达浓、胡麻巴洞、新洲、佛罗安、朋丰、达叻啼、达磨、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唤、白蒲迹、高丽。⑤曾于嘉定至宝庆间（1208~1227年）任泉州市舶提举的赵汝适，在他编的《诸蕃志》一书中，记录了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情况。这部“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里之联属，山泽之蕃产，译华言，删其秽淡，存其事实”⑥而写成的重要著作，所列举的国家就更多了。这一时期同泉州发生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

①《夷坚丁志》卷第六《泉州杨客》。

②莆田《祥应庙碑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③《淮海集》卷三十三《庆禅师塔铭》。

④《夷坚三志》己卷第六《王元懋巨惑》。

⑤区云卫：《云麓漫钞》卷五《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

⑥赵汝适：《诸蕃志·自序》。

不下60处。以今人的地理概念来说，其范围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非洲的广大地区。《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书记述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事例，考古发掘出土的大批实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东亚：泉州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往来是十分频繁的。从泉州去高丽，船舶乘夏季之后的南风北上，“必先至四明（即宁波）而后再发”，一般“五、七乃至二十日”便可到达。<sup>①</sup>泉州多有海船入高丽往来买卖，<sup>②</sup>即使在宋辽对峙曾一度禁止商贩往来的时期，泉州商人私自到高丽贸易从不间断。宋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sup>③</sup>而其中以泉州商人为数最多。仅据《高丽史》所载，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至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泉州商人到高丽国贸易的有18起，近五百来人。<sup>④</sup>举其姓名和有事迹可考者有欧阳征、林仁福、陈文轨、怀贲、陈亿、李颢、卢遵、林蔼、林禧、王易从、黄文景、肃宗明、徐戩、徐成<sup>⑤</sup>以及柳悦、黄师舜<sup>⑥</sup>和黄慎<sup>⑦</sup>等。这些泉州商人不仅带去了大量的“土物”、“珍宝”和“新注华严经经板”等，还为密切两国间的关系做出了贡献。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国“始复遣使修贡”，就是“因泉州黄慎者为向导”，才使中断了数十年的两国关系重新恢复起来的。<sup>⑧</sup>

宋朝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虽然是明州，但泉州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前面提及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是专门从事对日贸易的商

---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八。

②《东坡奏议》卷六《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③《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④⑤《高丽史》卷四~八。

⑥《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六。

⑦⑧《四明志》卷六《市舶》。

客。他于宋徽宗崇宁元年至四年（1102~1105年）曾先后二次泛海到日本“转买回货”。日本商人则常搬运杉木板和罗木板至泉州贸易。<sup>①</sup>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就与泉州开始通商往来了。在宋代，主要是三佛齐（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加里曼丹岛）、阁婆（爪哇岛中部北岸）、蓝无理（苏门答腊岛西北亚齐）、凌牙斯加（泰国北大年）、佛罗安（马来半岛西部）、新拖（爪哇岛西部）、蓝篔（苏门答腊岛东岸）、苏吉丹（爪哇岛中部）、单马令（马来西亚境内）、登流眉（马来半岛中部）、麻逸（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菲律宾三岛）、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和罗斛等。三佛齐是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不仅是“诸蕃水道之要冲”，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东来的印度和阿拉伯诸国船舶，“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sup>②</sup>从这里“舟行顺风月余亦可到”泉州。<sup>③</sup>占城是泉州与南海诸国交往的必经之地，是“海外诸蕃国”的“都会”之一。其距泉州较近，“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便可到达。象这样以泉州为基点记述与东南亚诸国的航程，在史书中是很常见的：阁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真腊国，“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sup>④</sup>说明当时泉州与东南亚这些国家之间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航线。东南亚向来是泉州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泉州

---

①《诸蕃志》卷上《倭国》。

②《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

③《文献通考》卷三三二《三佛齐》。

④以上参见《诸蕃志》各国传。

商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最为活跃，不仅常到各地做买卖，<sup>①</sup>而且，有的成了东南诸国对宋“朝贡”的媒介。<sup>②</sup>有的兼通番汉书，备受当地政府的重用；<sup>③</sup>有的甚至长期居留并“娶妻养子”。<sup>④</sup>这一特殊现象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亚：宋代称印度次大陆地区为“西天诸国”。通过海道与泉州往来的国家有南毗（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故临（印度西南岸奎隆）、胡茶辣（印度西北古吉拉特一带）、注犂（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鹏茄罗（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细兰（斯里兰卡）等。故临是泉州与阿拉伯等西方国家往来的中继站。自泉州至故临，一般于11、12月乘北风从泉州扬帆，出岱屿门，舟行40天到蓝无里过冬，第2年又启航，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顺风月余抵达故临。<sup>⑤</sup>有不少“西天诸国”的商人直接到泉州从事贸易，其“富者钜累贯万，列居即城南”，南毗人罗巴智力干父子便是来泉经商并在这里定居者之一。同时僧侣也相继来泉州活动。

西南亚：宋代把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诸国称为“大食”。比较著名的国家有麻嘉（沙特阿拉伯麦加）、瓮蛮（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阿曼）、记施（波斯海基什岛）、白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弼斯罗（波斯湾北岸巴士拉）、吉慈尼（阿富汗加兹尼）、勿斯离（伊拉克北境摩苏尔）等。从泉州到大食，沿南下航线先抵故临，在这里换乘小船继续航行，花1个月越过阿拉伯

①例见《夷坚甲志》卷第七《岛上妇人》：“泉州僧本称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莆田《祥应庙碑记》：“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等。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十九。

③《夷坚三志》己卷第六《王元恣巨恶》。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禁约》。

⑤《诸蕃志》卷上《故临国》。

海，便到达波斯湾沿岸之“大食诸国”。自泉州至大食，一次大概需要2年时间。而由大食东来，乘信风航行1月到故临，改大船续航，过马六甲海峡北上，自甲子门入泉州。虽然“大食在泉州之西北，去泉州最远”，<sup>①</sup>但是大食诸国的穆斯林商人沿着海路前来泉州的很多，而且输入物货的数量也很大。如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游客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抽解“直三十万缗”。<sup>②</sup>同时伊斯兰教传教士也纷至沓来，这些商人和传教士在泉州进行商业和宗教活动，并大批定居了下来，聚居于城南。大食商人施那帙便是他们当中较为著名的一位。<sup>③</sup>

非洲：位于北非的易斯里（埃及开罗）、邈根陀（埃及亚力山大港）、默伽猎（摩洛哥）和东非海岸的层拔（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罗（索马里柏培拉）、中理（索马里沿岸）、昆仑层期（马达加斯伽岛），甚至远在西欧的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国家和地区，也通过海道与泉州发生贸易关系。

### 三

海外贸易，是一种通过海运流通商品的经济活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满载着物货的“泉船”，由泉州港扬帆，经越南东海岸，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复穿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进入波斯湾；或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非洲东岸。而阿拉伯、波斯以及印度、东南亚诸国的使节、商人、僧侣、传教士等搭乘船舶，纷纷东来，蕃货远物在泉州源源登岸。宋代经由泉州输出的商品，既有当地的，也有

①③《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②《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如建州腊茶、龙泉青瓷器等国内不少州郡的土产；而输入的商品，则是来自海外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和阿拉伯地方的特产。进出口“舶货”，不仅数量浩瀚，而且种类繁多。

宋代泉州向海外诸国输出的货物，大致上可分为这么几类：

陶瓷器。中国以盛产瓷器而著称于世。泉州的制瓷业在宋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大批窑口的兴建，产品数量的激增，还是烧制工艺所达到的水平，都是以往朝代所不能比拟的。据近年来考古调查，泉州府各县已发现的宋代窑址达一百多外，其数量为历代窑址之冠。主要窑口有德化盖德窑、泉州东门窑、晋江磁灶窑、同安汀溪窑和安溪桂瑶窑等。从采集和发掘的标本看，有碗、瓶、盒、壶、杯、洗、盏、军持以及各种雕塑品。不惟种类繁多，造型优美，且釉彩丰富，光泽莹润，有青、影青、白、黑、绿、黄色等。瓷器装饰有卷草、莲瓣、折枝花、云龙、飞凤和几何图案，均美观雅致。由于泉州瓷器“甚饶足，並过洋”，大批出口，行销广泛，遂成为深受各国人民欢迎的主要对外贸易品。简直可以说，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几乎到处都能够寻见当年留下来的泉州瓷器的遗迹。在日本，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篋纹碗被称为“珠光青瓷”，<sup>①</sup>福岗、松川等地出土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白瓷盒子”，则分别是晋江磁灶窑与德化窑的产品；<sup>②</sup>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当地出土的泉州宋窑的军持、瓶、盘、盒等；<sup>③</sup>在斯里兰卡曾发现德化窑的“莲花瓣”；<sup>④</sup>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一万多件中国瓷器中，也有泉州的宋代青瓷器；<sup>⑤</sup>在肯尼亚，发现有安溪窑的宋代瓷瓶；<sup>⑥</sup>在埃及，早于十

①〔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

②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③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④⑤⑥许清泉：《宋元泉州陶瓷生产与外销》，《古陶瓷研究》第一辑。

一、二世纪的法帖梅时代就输入漂亮的德化瓷器了。<sup>①</sup>

纺织品。海外诸国向来喜爱中国的纺织品。纺织业的发展，在泉州亦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居于显著的地位。“女工织纴，冬锦夏葛”，成了泉州城乡一种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宋代泉州又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之一，曾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纺织品种类齐全，花纹美观，色彩绚丽，质地轻柔，织工精巧，北宋时已有“绮罗不减蜀吴春”<sup>②</sup>的美誉。其棉麻丝绸产品产量之多和质量之美，不仅被列为贡品，<sup>③</sup>而且大批投入市易，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宋代从泉州运销海外的主要货品有绢、生绢、白绢、缟绢、五色绢、五色纈绢、假锦、建阳锦、缎锦、锦绫、白绫、阜绫、丝帛、象眼（一种纺织品），还有白布、红吉贝、五色茸等。

金属及其制品。泉州的矿冶业以铁矿的开采和冶炼最称发达。宋时各县俱产铁砂，置冶煮炼，其中以安溪青阳冶铁场最为重要。据《宋史》记载，庆历五年（1045年），该处“铁冶大发”，迄今留下来的遗址范围很大，铁渣堆积层达数公尺。冶银主要集中在安溪的龙崇银场。熙宁间（1068~1077年）开始采炼，其规模也相当可观。治平中（1064~1067年）在泉州还设有“铜冶”。<sup>④</sup>与矿冶业有关的各种金属铸造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产品大量供给国内市场和远销海外，是泉州的重要利源之一。据《泉州府志》记载，宋时泉州“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sup>⑤</sup>可见坑冶铸造之盛和外销数量之巨。出口的主要金属与

①〔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

②苏颂：《苏魏公集》卷七《黄从政宰晋江》。

③《泉州府志》卷二十一《田赋》载：绍兴中规定上纳朝廷的贡品，仅棉布一项即达五千匹。

④《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⑤《泉州府志》卷二十一《田赋》。



各种金属制品是铜鼎、铜锅、铁鼎、铁锅、铁针、铅网坠和金银器皿、锡器，以及铁、铜、乌铅、白锡、赤铜、金、银等。

农副产品，糖、酒、盐、茶等在出口商品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货物主要畅销东南亚一带。10、11世纪，泉州成为全国甘蔗的生产中心之一，制糖业大兴，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宋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就特别指出泉州是砂糖的产地。《惠安县志》说，“宋时王孙走马埭及斗门诸村，皆种甘蔗煮糖，商贩辐辏”。制成的白砂糖、糖霜，大量“泛海售商”，官府还在这里“置监收其税”。<sup>①</sup>据《诸蕃志》记载，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等国都从泉州进口糖和酒。泉州制盐自宋以来即多于他郡，堪称发达。沿海一带，“民多业盐，以盐为籍”。<sup>②</sup>盐亭分布甚广，晋江县有161个，惠安县129个，南安、同安也有不少。当时泉州酿酒业与制盐业之兴盛，有“千家沽酒万户盐，酿溪煮海恩无极”<sup>③</sup>之称。产盐除供本地食用外，还运销内地，并输往单马令等东南亚一带。茶树的种植于北宋已普及泉州各县，从沿海丘陵到内陆山地，都有不少茶园，所产茶叶既多且佳。泉州清源洞和南安一片瓦的茶叶被推为上品。安溪是主要的产茶区，从宋初黄夷简的《山居诗》“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句子中可窥其盛貌。出于清水岩者，其味尤香，深受时人赞赏。最迟在北宋，泉州茶叶便已开始外销，如皇祐时（1049～1054年）晋江县南部的大宅诸村广植茶圃，产品曾运销两粤及交趾。<sup>④</sup>至南宋，泉州茶叶则与瓷器、酒等同为海外各国“皆所愿得”的重要出口商品。<sup>⑤</sup>

①②《惠安县志》卷五《物产》。

③《方輿胜览》卷十二。

④《西山杂志·大宅》。

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此外，漆梳、漆櫛、雨伞、凉伞、绢伞、草蓆、梳子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黄、黄连、川芎、白芷、樟脑、乾良姜、硼砂、砒霜等药材，纸、笔、建本文字（建州的书籍）、牙臂环、五色珠子、皮鼓等文化艺术品，胭脂、珠砂等化妆品和桐油等也运销海外诸国。各种物货大量出口，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进口商品——宋代从海外各国输入的货物达400百种以上，下面是常见于记载的品类。

宝货：象牙、犀角、真珠、珊瑚树、翠毛、龟筒、玳瑁、人参、麝香、龙涎、猫儿睛、砗磲、碾花琉璃等；

香料：乳香、金颜香、笃耨香、安息香、蔷薇水、沉香、笪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降真香、麝香木等；

药物：龙脑、没药、血竭、苏合香油、梔子花、肉豆蔻、没石子、苏木、木香、白豆蔻、胡椒、萆澄茄、阿魏、芦荟、脘肭脐、茯苓、白附子、石决明等；

布帛：善布、吉贝布、丝布、色丝布、毡毛布、织金软锦、兜罗锦、大小布等；

杂货：槟榔、槟榔酒椰子、椰子酒、波罗蜜、松板、罗板、杉板、乌楠木、镔铁、水晶、硫黄、黄脂、水银、鸚鵡、椰心簞、螺头等。

在这些进口货物中，为数最多的是香料和药物。市舶司也最重视这类商品的进口。1974年于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便是载着香药从东南亚回航而沉没的。出土的遗物以香料与药物最为大宗，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胡椒和龙涎香等达4700百斤。<sup>①</sup>香药的输入，虽然被统治者大量地作为奢侈品，也助长了

<sup>①</sup>《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十期。

社会上宗教迷信活动。但是，香药在医药卫生和饮食方面的应用，给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并丰富了食品的内容，这对于人民的社会生活无疑是有好处的。

#### 四

史实向人们展示了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局面，那么，促使这一时期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呢？当然不可忽视诸如农业、手工业之进步这样的经济条件，但在一定程度上说，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应该是最重要的。

第一，宋廷南迁的影响。泉州在发展道路上的大踏步前进，是从南宋时代开始的。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大幅度上升，甚至赶上广州，成了我国对外通商的主要口岸。它的崛起，与宋廷南迁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125年，女真人发动了对北宋的掠夺战争，战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而泉州却处于偏安一隅的和平环境里。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南外宗正司移置泉州，大批皇亲贵族定居了下来。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宋高宗即“命六官自温州泛海往泉州”，<sup>①</sup>许多士大夫也纷纷逃到这里，远离兵火的相对安定局面，使泉州成了宋朝统治者的避乱之所，而更为重要的是让“有船人户”“不失本业”，<sup>②</sup>中外商人可以从事正常的海上贸易往来。建炎四年（1130年），正当江浙诸港横遭战火破坏之时，泉州市舶司依然“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

---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十三。

斤有奇”。<sup>①</sup>在宋金战争中，泉州港不但没有受到战火的威胁，海外贸易反而持续发展。

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偏安江南，临安（杭州）成了南宋的都城。因此，这里不仅是封建官僚集团统治人民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是统治阶级大肆挥霍的所在地。宋代从国外舶来的贵重物货和奢侈品，主要是供宫廷和统治者的上层人物享用的。杭州，这南宋王公贵族、百官富豪聚集的地方，便是一个最大的消费场所。宋廷南迁后的这一变化，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于宋金对峙，两浙路各港口的海外贸易遭到严重的影响。从明州诸港进口那些专供上层统治者享用的舶来品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广州虽然在宋金战争中免遭兵燹，南宋时仍然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但是，在舶货“起发行在”方面则大大地不如泉州了。朝廷对纲运曾作过这样的规定：

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言，市舶司管押纲运官推赏，今措置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物货並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无欠损与比做押钱帛指挥推赏，如不及全纲以五斤为则作十分组计，亦依押钱帛纲地里格法等第推赏。从之。<sup>②</sup>

从广州到杭州纲运“六月程”比泉州“三月程”要困难的多，加之长途输送既有不少“欠损”，又往往是“枉费脚乘”、“亏损官钱”，<sup>③</sup>于是，泉州所处地理位置之优越，比广州更胜一畴。宋廷的南迁，泉州不象明州港那样遭受战乱的波及，海外贸易可以充分发展；又比广州靠近都城，物货搬运入京比较便利。这样

①《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香》。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十。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一。

一来，它作为杭州从海外输入香药宝货的最近便的口岸，受到了南宋统治者的倍加关注。

南宋时的杭州，亦是奇珍异宝“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的商业中心，是国外进口商品“从便货买”的最大销售市场。而这些舶来品主要是由泉州输入的。杭州商贾辐辏，“视京师（指汴梁）其过十倍”。闽商搬运大量海外物货至杭州交易，江浙商人从泉州转买胡椒、降真香、豆蔻等到这里贩卖的更多。<sup>①</sup>为了供给市场的需要，满足官舍富室豪华奢侈的消费，泉州不仅成了江浙海商转贩舶货的场所，而且是“泛往国外”出洋兴贩的主要港口，<sup>②</sup>泉州海外贸易因此而更加繁盛了。在宋廷南迁的影响下，泉州步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

第二，政府对外政策的作用。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在封建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的。统治者的态度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与海外贸易的盛衰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鼓励海外贸易，实行对外开放，是宋朝政府的一贯方针。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统治者更加积极提倡了。

宋廷南迁，丧失了半壁江山，踟躇于江南一隅。面临着军精民用“经费缺乏”的状况，宋高宗充分认识到展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曾谕及臣僚云：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sup>③</sup>

他还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

---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十四。

②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

贖”，<sup>①</sup>显示出对海外贸易的格外重视。当时的泉州既近临安，又不受兵火之扰，这对于把市舶之利作为重要财政来源之一的南宋统治者来说，其地位更显重要。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各方面扶持泉州市舶司，藉此进一步来发展海外贸易。

其一、加强市舶司职权。绍兴十二年（1142年），南宋政府罢止绍兴二年以来福建提举茶事司兼领提举市舶，而“令见任官专一提举”泉州市舶，<sup>②</sup>以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紧接着，朝廷又应市舶提举楼琦之请，增拨官钱犒设蕃商。《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琦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船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sup>③</sup>

南宋朝廷还多次拨款，增加市舶“本钱”。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十日“诏度牒师号一十万贯付福建”“专充市舶本钱”，<sup>④</sup>乾道三年（1167年）又特地“诏令福建市舶司，于泉、漳、福州、兴化军应合起赴左藏西库上供银内，不以是何窠名，截拨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sup>⑤</sup>南宋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泉州招徕海外商客，扩大贸易数额，广泛开展贸易活动，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

①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四。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三。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二。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九。

其二、弛禁舶货交易。对于进口货物的贩买，南宋政府也逐步放宽了运销范围的限制。按原来的规定，“蕃商止许于市舶置司所贸易，不得出境”。这样一来，造成进口商品不能正常运转行销，使海外商人“有失所之忧”。<sup>①</sup>为了让泉州的海外贸易不受影响，宋廷很快便于淳熙二年（1175年）取消了这道禁令，允许前来泉州的蕃船，其物货只要经过市舶司征榷之后，“疏其名件，给据付之”，便可以往“福建路州军兴贩”。<sup>②</sup>于是，开阔了输入货物的销售市场。为了适应这方面的需要，南宋政府于开禧三年（1207年）又一次放宽了政策，批准海外商船，除依市舶条法“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物品可以“从便货买”。<sup>③</sup>这一规定的实施，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的流通速度，扩大了运销范围，极大地便利了商人的买卖，进一步密切了泉州与国内诸市场的联系，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商船前来泉州贸易。

其三、申饬市舶治理。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广泛展开，进一步增加市舶收入，南宋政府规定了一系列加强市舶管理的办法和奖惩条例。对“招诱舶舟，抽解物货”作出贡献的蕃舶纲首和市舶务监官，分别以“补官有差”和“转一官”的奖赏。<sup>④</sup>如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故“特与补承信郎”。<sup>⑤</sup>而对“亏损番商物价”等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员，给予降低官职的处分。<sup>⑥</sup>并且，如果发现官司“巧作名色，违法抑买”的现象，“许蕃商越诉，犯

①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十一、三十一。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十三、三十四。

④《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五。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一十九。

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四、二十五。

者计赃坐罪”。<sup>①</sup>

同时，还注意到市舶提举的委任是否得当与海商即离，贸易消长的关系。宋高宗认为：

提举市舶官委奇（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sup>②</sup>

现实就是如此，经常出现那种“提举官往往非其人，致蕃商稀少”的状况。<sup>③</sup>因此，朝廷尽量起用执行和实施政策得力的官吏，以杜绝侵盗之弊和招徕外国商舶。在泉州，不乏有为改清廉，多有建树，深受蕃商和百姓拥戴的好市舶官。例如绍兴间（1131～1162年）“监泉市舶务，宿弊十去八九”的傅自修；<sup>④</sup>淳熙元年（1174年）任提舶“贾胡钦仰清节高”的虞仲房；<sup>⑤</sup>淳熙五年任提舶“严禁官吏向蕃商强买”，“蕃商闻风并集，舶计骤增”的刘克逊；<sup>⑥</sup>嘉定间（1208～1224年）任知州兼提舶和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的赵崇度；<sup>⑦</sup>淳祐间（1241～1252年）任知州兼提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的方澄孙，<sup>⑧</sup>等等，他们都为发展海外贸易做出了贡献。

第三，造船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兴盛是与造船业的发达分不开的。宋代，我国的主要造船基地，多集中在沿海的交通要冲明州、泉州、广州之大海港。然而，泉州造船技术之进步，则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十四。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五。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十七。

④《晋江县志》卷十一《人物志》。

⑤楼钥：《玫瑰集》卷一《送虞仲房赴潼川漕》。

⑥《福建通志》卷十四《列传》。

⑦《福建通志》卷一二五《宋宦绩》。

⑧《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



居于首屈一指的领先地位，曾得到“海舟以福建为上，广、西船次之，温、明又次之”<sup>①</sup>的高度评价。《太平寰宇记》还特别引人注目地把“海舶”一项，列为泉州土产之一。<sup>②</sup>正因为泉州建造的航海大船，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中外商客所乐用，故每因朝廷遣使，均先期来泉州雇募客舟，<sup>③</sup>并屡屡被宋朝政府诏令大批建造。<sup>④</sup>当时官营造船场并不兴隆，而民间造船业却兴旺发达起来。凡滨海之民，皆自备财力，建造舟船，兴贩牟利于海外。<sup>⑤</sup>可以认为当时在晋江边上的泉州以及惠安、南安、晋江沿海一带的许多地方，曾出现过一个个繁忙喧腾的造船工场。据考古调查，泉州城南门外辛公亭附近的厂铺，市东南郊的乌墨山澳和鸡母澳等地方，都发现有造船的遗迹。<sup>⑥</sup>

如此堪称发达的泉州造船业，不仅在史籍中留下了许多记载，更难能可贵的是，1974年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实物证据。<sup>⑦</sup>这艘被研究认为是宋末时代的海船，其出土时，虽然保存下来的只是一个残体，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尖底造型、三重壳板、多根桅杆、隔舱数多并采用水密舱制等特点，反映了其规模大结构坚固，容量多善于装载，稳性好抗风力强，吃水深适于远洋航行等技术成就，是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的重要物证。早在700百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对造船的许多科学原理已经

①吕颐浩：《忠穆集》二卷《论舟楫之利》。

②《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江南道·泉州》。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客舟》。

④参见《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之黄彦辉、林湜等各传之有关记载。

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七。

⑥泉州海交馆调查组：《泉州涂门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迹的调查》  
《考古》1959年第11期。

⑦《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有了足够的认识和比较成熟的掌握成度，这些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智慧的结晶，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乃至今天仍然有其深刻的影响。·考察陈列在泉州海交馆内的出土古船，低吟着宋人谢履“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②</sup>的诗句，不难令人想像到宋代泉州造船业和航海技术高度发达的情景，也不能不由此而认为这是当时海外贸易赖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对古船的研究和探讨，请参照1987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所载各论文。

②《舆地纪胜》卷一三四《福建路·泉州》。

## 编 后 语

本书系从提交“福建省安海港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选编的。陈国强、郑梦星、陈元煦、蔡尔鸿同志受大会委托组成编辑组负责该书的编辑工作。经编辑组反复研究和大会五个主办单位负责同志审定，拟出入选论文目录，然后向有关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教育出版社在审稿时，因几篇论文与统一要求未尽符合而被割爱，谨此向作者致歉。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庄景辉、丁炯淳同志也为此作了不少工作，特此志谢。

《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

1987年11月